社会史丛书

袍哥与土匪

赵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史丛书

袍哥与土匪

赵 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袍哥与土匪
赵 清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3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0629—0/K·90
定价：3.30元

前　言

秘密社会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并且日益引起学术界进行研讨的兴趣。其中一则是它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局外人不知其详；另外则是人们要求能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历史能得到更为完整的反映。

中国秘密社会在亚洲是很突出的，而且历史悠久，名目繁多。有清一代尤其是中叶以后，在民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它曾广泛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据档案和地方志及其他记载，名目大约有三、四百种。到了民国时期，以红帮、哥老会、青帮人数最多，他们活动面广，势力也大。

其中哥老会发源于四川，流传于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新疆等地。

本书将专门叙述和探讨四川的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为袍哥，也就是讲述袍哥的历史。包括袍哥的起源，他们如何开山立堂及其纪律、活动联络方式，历史上的发展变化过程、作用等全面情况。袍哥的发展后又与军队土匪联结在一起，由于四川的匪祸猖獗，对土匪的活动也作了较多的叙述，因此书书定为《袍哥与土匪》。

由于四川（包括西康）的袍哥、土匪颇具典型性，并在历

史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研究袍哥与土匪，是研究和了解清代特别是近代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旧中国的四川袍哥相当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无论城市或乡镇，广大农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据有关部门 1949 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占很大比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成都有袍哥公口、分社、支社一千多个，重庆有五百多个。重庆的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四川袍哥组织势力之大，人数之多，在全国秘密社会中是少有的。

四川的土匪是参加袍哥组织的，袍哥分清水和浑（混）水，只有浑（混）水袍哥才是土匪。土匪是指抢劫、绑票、坐地分赃等为生的，四川俗称"棒老二"的人。民国以后，袍哥渗入军队，相互勾结和利用，散兵游勇浪迹各地，扩大了土匪队伍。有记载说："四川匪祸之烈，为他省所不有，以军团数量特别发达，于是枪流入民间，遂为匪祸之源，且每次战争发生，士兵转变为匪者不在少数，由匪招安成军队者亦多，四川许多将官，出身固绿林豪杰也。"（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 560 页）有人统计，1927 年四川土匪数目在十万以上，以后又成倍成倍地增加，到 1949 年，四川袍哥土匪掌握的"枪有三百万支"。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值得注意的，在四川袍哥组织中还有"洋袍哥"。清末民初，重庆的外国洋行大班和其他外国人参加袍哥组织大有人在。例如：有个洋行推销员，希腊游民巴巴达，从袍哥三排超拔出山当大爷，重庆解放后 1951 年 5 月才携全家返回希腊，在四川袍哥中活动共达四十余年。

四川袍哥是军阀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在军阀混战中

起着推波助澜，制造社会混乱的作用。四川军事首脑大多是参加（或挂名参加）了袍哥组织的，都利用袍哥土匪争夺地盘，控制和兼并防区。四川军阀部队中袍哥土匪队伍占五分之一，袍哥土匪头子任军、师、旅长，还有不少袍哥土匪司令。军阀通过袍哥勾结洋行购买军火，由洋人袍哥从中牵线接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势力也控制和利用袍哥土匪，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也借袍哥的力量，以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开展抗日反蒋斗争。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由此可见，四川袍哥土匪的兴起、发展和消亡，是与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相联结的。

造成四川袍哥、土匪的恶性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第一、四川经济落后，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人口增长很快，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无地少地农民日益增多，大批破产农民成为游民。第二、民国成立以后，四川连年军阀混战，二十余年中，有四百多次战争，争夺地盘，实行防区制，把四川划成许多独立王国，军阀预征田赋几十年之久，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工商业凋敝，下层群众破产，扩大了土匪队伍。第三、四川革命力量弱小，革命政党屡遭破坏，反动势力相对强大，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无出路，生活上无保障。袍哥组织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提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参加的人进行保护和减少或免受欺压，正符合他们的需要。第四、1935 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四川、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陪都，对四川进行直接统治，采取利用袍哥土匪势力的办

法，以巩固其反动基础，尤其是为争取选票而发展袍哥组织。第五，成都是个消费城市，四川省会，鸦片集散地，袍哥、土匪、军阀头子集中的所在地，重庆是西南物资的集散地和主要港口，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这两个城市表面的繁荣吸引着大批游民流入和全国各地人的来往，所以袍哥组织在这两个城市发展很快。

四川袍哥、土匪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初到清末，是袍哥兴起、发展的时期。四川袍哥是清初兴起的一种民众组织，有清一代被称为“匪”或“会匪”，是秘密的非法的民间结社。清末袍哥势力逐渐扩大，从反清复明、兴汉灭满发展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是袍哥的极盛时期。四川袍哥在立宪派领导下参加了保路运动，在革命派领导下参加了全川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袍哥组织一度由秘密转向公开，由非法转向合法，获得大发展。后来虽遭镇压，但在护国战争中再起，为四川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

第三阶段，从护国战争以后到抗日战争前，是袍哥走向滑坡的时期。袍哥渗入军队，土匪恶性膨胀，四川军事首脑利用袍哥土匪争夺地盘。军阀混战二十余年，战乱频仍，人民深受兵匪之苦。

第四阶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袍哥土匪大分化、大瓦解的时期。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分子渗入袍哥组织，进行控制利用，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亦利用袍哥的力量，开展抗日反蒋。解放前夕，一部分袍哥弃暗投明，参加起义，一部分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后参加土匪暴动，自取灭亡。

解放战争的胜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妥善地解决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着的秘密社会问题，使人民过着安宁稳定的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早已在中国大地上被取缔了的封建性帮会组织竟沉渣泛起，危害社会治安，制造混乱，阻碍改革和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四川，如内江市一些封建帮会性的组织，发现在该市各个县（区）几乎都有。又据安岳县有关同志反映，该县的封建帮会性质组织不下五十个。安岳县公安局曾到石羊区调查，仅半个月时间就查实了十一个帮会组织。这些帮会组织标榜的宗旨，多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石羊“友谊帮”在成立时，就以此为誓词，宣了誓，念了帮规帮约，喝了生鸡血酒，排了座次。他们抬出袍哥组织的亡灵，客观上必然会起作破坏人民安定团结的作用。这种不利于广大群众的行为，所造成对青少年和学生的毒害是绝不能忽视也绝不可轻视的。

我们开展对这些秘密社会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秘密社会的存在，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如能洞悉其中奥秘及其来龙去脉，必然能大大增强人们的识别与抵制能力。

我们知道，秘密社会至今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各国或是发展中第三世界中很多国家仍是他们存在着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上的秘密社会已经被取缔，但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活动仍然猖獗，其中更有比秘密社会更为严重的应称之为黑社会的存在。

因此，开展对秘密社会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

的国情与民情，了解我们现今社会是如何艰难地发展过来的。能充分认识新旧社会的根本不同，将促使人们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社会变革。所有这些，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等方面，也都会是有益的。

迄今为止，秘密社会的研究仍属薄弱环节。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社会组织，是社会史必须重视的课题，这不仅要研究政党史、工会史、农会史，而且要研究民众组织史、会党史、土匪史，而后者往往受到忽视，但它的研究却更能反映出社会史的特色。由于长期被忽视，大量的史料任其散佚，原有的档案无人整理。这都为研究的开展造成了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用翔实可信的资料，尤其是档案，写出社会史的著作，以填补这一研究薄弱环节。

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本书仅是一部试作，不免挂漏讹误，恳求读者指正。

目　　录

一、源流和崛起……1
二、开山立堂和组织、纪律……9
三、袍哥组织的性质……17
四、反清反洋教的斗争……25
五、袍哥大显身手……35
六、同盟会联络袍哥……42
七、袍哥的巨大贡献……49
八、盛极一时的袍哥组织……60
九、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67
十、袍哥队伍的再起……76
十一、袍哥的滑坡……88
十二、袍哥渗入军队……95
十三、袍哥队伍的特点……103
十四、洋袍哥的活动……110
十五、大军阀多半是大袍哥……117
十六、土匪和袍哥的关系……124
十七、土匪活动的猖獗……130
十八、形形色色的匪头……138

（一）从土匪到地方官……138
（二）从滥兵、土匪到特务……143
（三）从土匪到军官……149
（四）从军官到匪霸……158
十九、匪头强占土地和投资企业……167
二十、土匪的火并……174
二十一、控制与反控制……181
二十二、共产党争取袍哥抗日……190
二十三、特务操纵的袍哥组织……205
二十四、袍哥组织愈来愈滥……215
二十五、剿灭土匪与取缔袍哥……226
后记……241

一、源流和崛起

袍哥，一般称为哥老会，早称汉流（留），到了晚清四川官方文件上称江湖会、孝义会。前者亦称“汉流”袍哥，后者称“西流”袍哥。其他还有袍儿哥、光棍、海皮、袍皮闹等社会上种种流行的称呼。

袍哥发源于四川。袍哥组织出现时，清朝政府就下令追查其发源地，当时许多地方官奏报，一致认为“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湖南，以及东南各省。”①

袍哥起源于何时，系何人建立，其目的何在，至今仍众说纷纭。一说是清康熙年间郑成功创立的“反清复明”组织，由郑成功派其部将陈近南到四川的雅州来开精忠山，创立汉流，是四川袍哥组织的开始。这是长期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四川袍哥历代相传。如王蕴滋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一》就持此说，强调陈近南开精忠山并“取诗经同袍同仇之意，称为袍哥，又为警惕同人勿忘根本，内部又互称汉流。”哥老会“凡入会者称哥老弟，以示平等合作之精神，”其宗旨为“反清复明”。指出在陈近南之后，首领天佑洪率会众攻重庆失败，四川袍哥失去中心领导，行动分歧，各行其是，而且“海

①刘昆：《请饬在籍大员带办团练折》，《刘中丞奏稿》卷 2。

底”辗转失真，开始了四川会党山堂林立，公口遍地的局面。[①]唐绍武、李祝三、蒋相臣在《解放前重庆的袍哥》一文中也持此说，强调袍哥的起源是郑成功创立的，这是“洪门前辈历代传下来的说法。”[②]乔曾希、熊倬云、徐伯威、康兆奎1982年写的《四川袍哥的概况》也坚持此说，认为是陈近南“开创‘精忠山’广结弟兄，待机共图大举。此后，四川颜鼎章、李云九、胡文汉、张连弟等人先后创立‘大峨山’、‘青城山’、‘九成山’、‘华阳山’等‘汉留’组织，暗中反满。自此，‘汉留’已在四川立住脚跟，逐步发展”。“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川南永宁，召部结伙，创立‘荩忠山’”，“又为四川的袍哥加强了实力，增辟了山头”。[③]最近我们曾经找过一批解放前是职业袍哥的老人访问，都不同意当今某些学者认为袍哥组织源于“反清复明”“是毫无根据”[④]的论断。另一种说法，哥老就是“啯噜”，哥老会就是“啯噜会”。[⑤]左宗棠奏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⑥]李榕也说：“窃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

①王蕴滋：《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一》，四川省政协稿本。

②唐绍武、李祝三、蒋相臣：《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③乔曾希、熊倬云、徐伯威、康兆奎、《四川袍哥的概况》，成都市政协稿本。

④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第203页。

⑤啯噜是四川的土语，啯噜会也叫啯噜党，清朝统治者称“啯匪”，最早出现在清朝雍正年间，活动于川陕鄂三省边界一带，其基本成员为无业流民，平时打富济贫为生，啯噜的首领称“老帽”、“帽顶”、“大五”、“大满”等，靠江湖义气作联系纽带，彼此团结互助，秘密发展成员，纪律约束严格，没有宗教迷信。啯噜的抗清斗争在四川有相当影响。

⑥《左文襄公奏稿》，卷31。

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即哥老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德顺堂诸名目”。[①]近年来胡珠生同志论证说明：“哥老会尽管推源于明末郑成功，但可靠史实只能证明它以哥老（嘓噜）形式起源于清初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移民）”。[②]近来有许多文章和著作不同意这种等同说法，却认为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嘓噜会，但不是嘓噜组织的简单重现，或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嘓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无业游民组织”。[③]“哥老会兴起后，嘓噜同样存在。咸、同时，配合农民起义军打击清统治，光绪时仍见成群的嘓噜活动。两个组织是并行发展的”。[④]总之，袍哥的起源有各种说法。

我们认为，四川袍哥的开山设堂，仪式，会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黑话暗语，是从郑成功创立“反清复明”组织，由陈近南开精忠山创立汉流相传而来或吸收融合了汉流的特点。在四川教（即白莲教）与会（即哥老会）历来分得很清楚，到 1935 年华同社报道宣称：“四川各地教匪蜂起”，在潼南、遂宁等县有“松杉教”，南充、绵阳等县有“红灯教”，古蔺有“灯花教”等等，都是属于白莲教系统。[⑤]有位作者在 1949 年写的《四川哥老会问题之研究》一文中说：“在

①李榕：《十三峰书屋文集》卷一。

②胡珠生：《青帮史初探》，《历史学》1979 年第三期。

③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 205 页。

④胡昭曦、霍大同、杨光：《“嘓噜”考析》，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66 页。

⑤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编：《四川农村崩溃实录》，1935 年，成都民间意识社，《四川各地教匪蜂起之概况》。

今日四川的下层社会中，应分为教（白莲教）与会（即哥老会）两大派，白莲教含有浓厚之宗教与保守色彩，在川南宜宾一带，与川北绵竹一带，时常兴兵动乱，出没无常，但其分子亦多为教中人物，其势力不如哥老会。”①而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哥老会不可能去吸收融合白莲教的设立山堂字号等特点，何况这些也不是白莲教的主要特点。袍哥以异姓相约为兄弟，头目称“帽顶”，有大爷、二爷、三爷、五爷之称，有上四排下四排之分，这些组织形式是吸收、融合了啯噜的特点。到清末民国初年，啯噜反依托于哥老会。宣统《成都通览》记载说：“袍哥即烧香结盟之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儿哥，又曰帽顶。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么等名目，独无老二、老四、老七等目。因忌四字，音同事字；忌二字，为鬼老二，忌七字，音同截字也。老么谓之么牌，老五谓之五牌。尚有坐堂大爷及红旗管事、黑旗管事等名目。成都只有两堂人名目。其结盟章程之书，名曰《海底》，书总以孝义仁敬四字为大纲。流为匪类者，多假托袍哥之名，因入会之流品太杂太滥，故多抢劫之匪类。抢劫人者，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者垣谓之棒客。”②民国《达县志》有《哥老之会，其头目曰帽顶，曰大爷、曰龙头，内以坐堂为首，外以新复为首”的记载。③

袍哥是在道光中叶崛起，咸、同年间兴盛。④道光二十年

①凌光甫：《四川哥老会问题研究》稿本。

②傅崇榘、樵春（�春）编：《成都通览》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石印本，第5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注：“老二”与二爷不同，许多堂口设二爷。）

③民国《达县志》卷九。

④刘师亮：《汉留史》。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巨额的战争赔款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旧捐税益加重又增加新税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四川袍哥正是在中国社会极度动荡中兴起的。卫聚贤在《中国的帮会》一书中说："道光十二年（1832 年）时已有哥老会了。"①但见于清朝史册，是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上谕提出严禁四川、湖北哥老会的活动。不能道人著《救世新论》，也提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四川会党内有"江湖烧会"。②实际上就是"烧香结盟"的袍哥活动。当时郭永泰在永宁开荩忠山时，"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此皆江湖豪杰，并州联县，聚众开山，远近景从，清廷愈禁止，发展愈扩大，以至分支流派，开山立堂，公口码头，不可胜数"。③

咸同年间，社会危机更为深刻，封建统治基础开始瓦解，大批袍哥混迹于清军之中，鲍超军营就是一个例证。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④左宗棠也说："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⑤就是左

①卫聚贤：《中国的帮会》第 5 页。

②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 216 页。

③侯少煊、雁秋：《哥老会的缘起与清王朝对它的镇压》，《四川保路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48 页。

④王闿运：《湘军志》（一）湘南防守篇，第 25。

⑤左宗棠：《附陈鲍提督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左恪靖伯奏稿》第 25。

宗棠的楚军中四川袍哥势力也不小。龚宝琛致盛宣怀函说："昔随左文襄公西征，见有部下蜀军十营，官弁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弁见营主，营主谒统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而不闻有称大人者。此蜀产之根〔深〕固蒂也。"[①]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自称大哥，江湖人称唐帽顶。后来被四川总督招安之后，为清室效忠，官拜提督之职。"[②]

同光年间，随着湘军及其他清军的遣撤，数十百万将士没有妥善安置，使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激增，袍哥势力迅速扩大，活动更加频繁。光绪五年（1879 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镇压"匪患"札文中说："军兴以后，又益以游勇散弁，从中勾结，匪踪横行，实遍全省。即以成都十六属而论，以前枪杀之案，年中具报者不下数百起，而隐匿者尚多。甚至还有一、二十里内亦劫案迭出，附省如此，外属可知。而其中尤有难言者，匪众日以劫杀为事，而官不能治，于是地方粮富，知官之不能卫民，遂不畏官而畏匪。始则畏匪，继乃通匪，迨日久习惯，而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有用钱捐当帽顶之事，于是匪势日盛，民气益蹙，几于不可收拾。"[③]到 1885 年，重庆彭立三又开回龙山，中江彭焕如再开飞龙山，1898 年李煜清大开巍峰山。据刘师亮统计，1898 年至 1911 年间，四川开设的山堂有八个。二十世纪初年，"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日不暇给，故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

---

①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16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傅渊希：《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75 页。

③ 《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53－54 页。

无倥子’之谣。”“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①]1911年，四川巡警道《通饬解散公口文》中说：“秘密结会，私设公口，川省各属均不免。”[②]说明袍哥组织已深入四川各府、州、县城镇乡村，其势力颇为雄厚。

辛亥革命前，四川袍哥已发展到名目繁多，人数既众，品类复杂。在成都，记载说：“清末光绪、宣统年间的码头，比较著名的有东门范云卿的文武公，南门卢华廷的崇汉公，西门周宝光的亲和公，北门卢怀三的庆福公，大城稽祖佑的二同公，少城旗人刘松如的三合公，皇城坝回人马尧峰的清圣公。此外，尚有曾茂九的久成公，白仲池的文武社，费春山的西和公”等[③]。在重庆，各堂公口，最老的仁字有“崇汉公”、“云龙公”，义字有“永和公”等，大约成立于清同治及光绪初年。公口数目仁字最多，名称也复杂，在重庆有十八道公口，各霸一方，不相统属。但也有老资格的大爷不属任何公口，或虽有公口而资望高，形成为仁字总“舵把子”的，如唐廉江、余仕高和后期的田得胜都是如此。义字组织开初全市只有一个“永和公”，各地区称某地“永和公”，都受总公口舵把子指挥。礼字的公口，全城只有一道“礼渝社”，各地区称“礼渝分社”，受总社“舵把子”指挥。智字的公口只有一道，称“智同社”。信字的公口一道称“五福堂”。智、信两堂没有分社。重庆五堂袍哥的总人数，根据辛亥后唐廉江办的袍哥报纸估计，连同江、巴两县共约三四万人。[④]成都附近的新繁县，

①刘师亮：《汉留史》。(“倥子”，指那些没有参加袍哥的人，又叫“白朋”。)

②《四川官报》第9号，宣统三年三月六日。

③《四川袍哥概况》之一，1949年印。

④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125页。

清末有五个码头，“西门和东门一带是唐和林、杜银洲的协和公，南门和北门一带是吴子俊、景上天的南集公，城内是刁则仙的天一公，禾登场是杨仲三、刘汝屏的两仪公，县衙门文武两班九房老典成立的九合公。”①

1909，四川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解散会党》，宣称。“本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又说：“会党之增加，党类必在开山结盟之时，开山一次，新入会者辄数十百人，如是不已，会党安往不多。其开山必在深宵僻地，又有衙蠹为之牒蒙，盖似不易察。然每开山少者人以百计，多以千计，来程至数百千里”②

四川袍哥势力的崛起，是清末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清朝严重的政治危机相联系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也分离出一批批终年流浪江湖的游民和出入营伍的游勇。他们在政治上都没有出路。湘军和地方军的遣散，更使无业游民队伍激增。这都是袍哥组织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由汉流（留）、啯噜变成哥老会、江湖会、孝义会，是袍哥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袍哥演变的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

①《新繁县袍哥概况》稿本。

②《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34 页，135 页。

二、开山立堂和组织、纪律

袍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产物，是在四川民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众组织。袍哥组织既是反清的秘密结社，又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政治和经济的互助团体。

“袍哥”之义，是取于《诗经·秦风·无衣》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哥组织据此而得名。意即“有衣（袍）同穿，有饭同吃，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哥弟”。“哥老会亦称哥弟会，以其组织中之称呼，皆为某哥某弟故也”。“哥老会亦称汉流”。“汉流”与“汉留”同音，其意义有两说：一指“排满兴汉”、“反清复明”，“大汉民族是黄帝子孙，渊远而流长，永世不绝”；二指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取汉时刘备、关羽、张飞结义之意。

袍哥在四川开始出现，即遭清朝政府的严禁。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长期存在，是与其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分不开的。

袍哥开山立堂的实际含义，是“据山落草，插旗造反”。郑成功派人回大陆发展组织，就是想用这种武装斗争的方式，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随着时代的演变，袍哥虽然也开山立堂，但已逐渐失去了武装斗争的实际含义。不过，袍哥从来都

是以举行开山立堂作为大典的。四川各地，从清末到民初，据闻永宁、洪雅、灌县、金堂、达县、梁山、丰都等地，都曾先后有过袍哥开立山堂。重庆北碚黄桷镇的仁字大爷王承武，在民国初年也曾开山立堂。[①]据曾参加过开山立堂典礼的袍哥所谈，情况大略如下。

原来袍哥开山立堂，是仿效梁山泊忠义堂聚义故事，选在僻静山区举行，时间多在夜里，以示秘密。事前密发通知，送达素有联系的码头、公口，后者有的送礼，有的派人来贺。交通接送、住宿饮食，都须预为准备。届期先行查山，派人密设哨卡，戒备意外，以防“白朋”、“侄子”闯入窥探。

大典前夕，先将香堂布置得严肃壮观，张灯结彩。门为“辕门”，堂为“忠义堂”，正中安置龙头宝座，两边设虎豹皮交椅。大哥、客位坐交椅，各级弟兄在两旁设长凳座位。开门、迎客、安座、敬茶、奉烟都要行令，说些“四言八句”。

时辰一到，红旗管事司仪，龙头大爷升坐主盟，音乐齐鸣，迎圣接驾；行拐子礼，说许多赞词，由两位二哥捧关羽牌位安放上面。接着就是安位、焚香、上祭、开光、点像等一套。

安圣完毕，主盟发开山堂结拜令，宣布山名、堂名，金牌挂出，又是一大套赞词。“开山令”相传由郑成功当年设立“明远堂”时主持起草的，其内容是：“明远堂愚兄大令下，满堂哥弟听根芽；令出开山非戏耍，犹如金殿领黄麻。只为满奴兴人马，无端抢我大中华。扬州十日遭残杀，嘉定三屠更可嗟！把我汉人当牛马，视同奴隶毫不差。马蹄大袖加马褂，凉帽缀成马缨花。本藩闻言喉气哑，率同豪杰奔天涯。权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且此山来扎下，金台山上浴风沙。今日结成香一把，胜似同胞共一家。万众一心往前来，声摇山岳起龙蛇。不怕满奴军威大，舍死忘生推倒他。还我河山才了罢，补天有术效神娲。人生总要归泉下，为国捐躯始足夸。战死沙场终有价，将军马上听琵琶。争回疆土功劳大，流芳千载永无涯。奋我精神秣我马，勇往直前莫差嗟。大众弟兄情不假，请进香堂把誓发”。

接着宣读山堂正副龙头、盟证、座堂、陪堂、正印、副印、礼堂、香长、监堂、原堂、新福各位大哥名单，又宣读圣贤、桓侯、管事六、八、九、十幺满各牌名单，依次入座，互相道喜。接着歃血盟誓，讲十条，讲三把半香，传三刀六眼，并当众宣布“镇山令”:“适才传过开山令，镇山大令说分明。开山无宝把山镇，恰似浮萍未定根。第一镇山孝为本，第二镇山弟是遵；第三镇山须忠信，第四镇山礼义兴；第五廉耻牢记定，第六做事要公平；第七修身重德行，第八同袍谊要真；第九“三纲”勤整顿。第十“五常”永保存。诸般至宝把山镇，愿众身体而力行。人生处事最要紧，常遵八德和五伦。唯善为宝古所训，我辈犹当效古人。大众兄弟遵此令，汉留身价重千金；倘有强顽违移令，荆条驱逐不留情，故为犯法不安分，军法相绳问斩刑。我今传出镇山令，满堂哥弟尽知闻”。然后开宝用印，龙头按名单点名盖章，大家道贺，龙头受贺，传赏、谢赏、送圣、送客，至此礼成。①

开山立堂大典，所需资金浩大，参加人既多且杂，容易招风惹事，而香规礼节繁复，所起作用不大，所以四川各地开山立堂之事，后来很少举行。

参加袍哥，要经“引、保、承、恩”四道手续。”“引”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是引进，即介绍人；“保”是保举，由管事担任；“承”是担承，由三牌当家担任；“恩”是恩准，由执事大爷决定。

手续齐全后，要趁旧历五月十三日单刀会，或七月十五日中元会时举行仪式，也有临时举行的。举行仪式时，要找一清净地方作为香堂，上供关羽牌位，引、保、承、恩者拜兄就位，焚点香烛。参加人盟誓，誓词大意是：“遵守一切香规，不准不孝父母，不准不认兄弟，不准丢人卖客，不准拉稀摆带，不准淫嫂戏妹。倘有违礼犯规，要手不敢拿脚，三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跳”。誓毕，向关羽牌位及大哥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大哥指定排行，大家贺喜。后来也有不盟誓，只叩头行礼，甚至只行三鞠躬礼的。加入袍哥的人，一般从“么大”干起，凭功劳才干资格提升。有钱有势者，经袍哥组织同意也可一步登天，称为“新福大爷”。

袍哥违反香规礼节，要依照香规，视情节轻重处理。情节轻者挨红棍，重者要被“吹灯”（挖眼）或“砍丫枝”（宰手脚）。十分严重者，那就是“三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跳”，当众自杀，不得拉稀摆带喊黄不干。行刑之际，也还有一些词令之类，等于宣布罪状，警告众人。①

袍哥组织结构，内部组织以兄弟结义的形式组成，分八个排行，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作为代号。

一排为大哥，又称大爷，比作刘备，是袍哥中顶荣誉的位置。升到这一步，称为“出山”。当大爷要入会时间长，一步一步升上去，如果有功劳、苦绩亦可越级上升。还有一种有权有势的“一步登天”大爷。大爷以资格而论，在一个公口内有多少定多少，不受数量的限制。公口大爷中，又互相推定“舵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131 页。

把子”（即“龙头大爷”）、“坐堂大爷”、“执法大爷”管理事务，其他不负执事责任的大爷，称为“闲大爷”，居于闲散地位。

袍哥《金台山实录》，即《海底》称：“嗨（音 hai，即参加、担任意思）大爷要效那昭列刘姓，汉天子拜皇叔认为宗亲。”

二排称圣贤二哥，比拟关羽。由于袍哥特别尊敬关羽义气，安排清高或僧道弟兄担任，否则宁缺毋滥。二爷是个受尊敬而闲散的位置，开会敬神时，二爷一定要穿长袍加马褂，文质彬彬的俨如圣贤。

《海底》称：“嗨二爷要效那圣贤一样，在曹营保皇嫂一片热肠。”

三排称三哥，比拟张飞，亦称“当家”，专管内部钱粮和人事。他上秉承“舵把子”的旨意，下督率管事办理事物。

《海底》称：“嗨三爷要效那翼德张姓，长坂坡吓退百万雄兵”。

五排称管事，有承行、执行、红旗、黑旗之分，负承上启下，训练兄弟，执法惩戒。对外交涉联系，对内处理纠纷，会场的招待，来宾的酬谢，都是他们一手经办。管事的名额不限，内中指出二人做首领，指挥一切，又叫大管事。袍哥中有：“内事不明问当家（三爷），外事不明问管事（五爷）”。

《海底》称：“嗨五爷要效单氏雄信，为朋友日黄金夜用斗银”。

六排称巡风、护律，又称蓝旗，掌握巡风放哨，察看官府行动，如有风声，即刻报信。

《海底》称:“嗨六排要效浪里白条张顺，在刘唐请医生四海标名”。

八排称纪纲，受大哥、管事之命执行纪律事宜。

《海底》称:“嗨八排莫学那罗成德性，不上三十二一命归阴”。

九排称挂牌，栽培新进，提升调补，登记弟兄排位，上四排挂金牌，下四排挂银牌，受处分挂黑牌。

《海底》称:“嗨九排要效那九寨巴姓，巴九寨咱弟兄讲过人情”。

十排称营门，传达报告一切事宜。

《海底》称:“嗨十排要效那石秀人品，翠屏山报兄仇才算有能。”

此外，还有大老么、小老么，随侍拜兄，服一切杂役。小老么年龄小，不称兄论弟，对拜兄应呼大伯，经过几年提升后才称兄弟。

袍哥没有四排、七排，据说因陈近南去雅州开精忠山，四七两兄向清兵告密出卖，近南几被杀害，认为是袍哥的奇耻大辱，便永远取消了这两个排行。还有一说是《成都通览》上字音的解释，“因忌四字，音同事字”，“忌七字，音同截字。”

《海底))称:“四排上到如今无人顶姓，亦要效保主的猛忠赵云。”“七排上到如今无人肯认，亦要效瓦岗寨程氏咬金”。

袍哥组织对外区分，据传《海底》原规定以“威德福智宣，松柏一枝梅”十字作旗号，可组成十堂人。但实际上只有五个旗号，五堂人，四川有些地方只有三旗或四旗，三、四堂

人，并且用“仁义礼智信”五字代替了“威德福智宣”五字。所以仁字旗又号威字，称一杆旗，义字旗又号德字，称二杆旗；礼字旗又号福字，称三杆旗，智字旗又号“方字旗”，第四杆旗之意；信字旗又号宣字，称五杆旗。[①]

仁义礼智信五旗堂口之下，又各自区分组织成若干公口，如仁字某某公、某某社之类。一个地方各堂袍哥公口合称为码头，各地袍哥码头平等互相联系。

各旗之间界限非常明显，你属于那一旗就打那一旗的旗号，乱打旗号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可以申请转旗，从二杆旗转到一杆旗的人是较多的。

袍哥出门跑江湖码头，见面对试，要摆姿态，宰言子（说隐言）、行拐子礼。正规的拜码头，先要找到辕门官执事九牌，转报红旗五哥接客，然后龙头大爷和全堂执事人员才出场接见。客人在向红旗五哥拿上服（即向外码头说明自己请求事由）时，要口齿清楚地说出以下条子：“我兄弟姓×字××，××小码头，久闻贵龙码头山头一缘哥弟，尤恐款式不合，掉红掉黑，卷边折角，言语不清，口齿不明，礼节不周，请候不到。我兄弟多在山冈，少在书房，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节，一切不周不到，还望大五哥高抬龙袖，谅个膀子，龙凤旗，日月旗，花花旗，给我兄弟打个好字旗”。说完条子，双手呈送公片宝礼，红旗五哥有时还要考问几句，然后才打发小老幺请各位大爷迎风接待。如果来客不经辕门官转报红旗大管事，就叫越城翻墙，这是严重违犯帮规的行为。

袍哥是秘密结社，非法的民间组织，所以他们有一套专用的隐语（袍哥话）。这种隐语一方面作秘密联络之暗号，另一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方面也加强其组织内部的向心力。他们树公口、立码头叫“插旗子”，召集哥弟共同会商事情叫“传堂”，向外码头本码头的哥弟说明事由叫“拿言语”，用本码头舵把子或头面人物的名片向外码头联系叫“走字样”，参加了袍哥的人叫“有点点”或“在园哥弟”，没有参加袍哥的人叫“白朋”或“倥子”，结仇叫“结梁子”，报仇叫“拿梁子”，调解仇怨叫“搭台子”，双方和解叫“捞梁子”，招了口供叫“拉稀”，酒叫“烧冲子”或“火灵子”或“黄汤子”，肉叫“片子”，鱼叫“摆尾子”，鸡叫“啄头子”，杀人放火闯下大祸叫“摆豪”，持强欺人、胡行乱为叫“撒豪”，闯祸或犯法后躲避起来，或逃跑外地叫“避豪”，流落江湖到各地码头谋取生计叫“跑滩”，向人请求周济叫“求张罗”，当众说明过错叫“报盘”，当众跪着承认错误叫“矮起”，吃饭叫“造粉子”，吸烟叫“薰条子”，打死人叫“丢翻”，内部处死叫“毛了”等等。其他隐语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经常出门跑码头，求张罗的袍哥，对这一套仪式和隐语要练得很熟，对考问要对答如流。这是防止敌人渗入的一种简易办法。对答不上者，轻则被清底细，重则被处死。民国以后，随着袍哥的公开化，对这一套隐语和仪式，就逐渐不兴了。

袍哥这种组织和纪律，正适合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无业游民的需要，因而使得他们纷纷参加袍哥组织。

三、袍哥组织的性质

袍哥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他们强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义气结合”，“豪侠仗义”，“弟兄相称，平等对待”，又是受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下层分子的互助团体。但是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样，袍哥组织充分表现出复杂性。

（1）袍哥组织是以封建宗法社会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它所维护的道德行为是封建的道德行为，保持的社会秩序是封建的社会秩序。孙中山曾经改“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民国以后袍哥奉为道德行为，但袍哥只是承认这为“外八字”。所以民国成立以后，袍哥的信条有“内八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外八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参加袍哥的人要绝对遵守，

违反者就要受到制裁。①

袍哥敬奉“三把半香”：一把香敬奉鲍叔牙与管仲的无私友情（另一说是敬奉舍命全交的羊角哀与左伯桃），二把香敬奉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把香敬奉瓦岗寨上众虎将。至于这“半把香”，则出于“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给水泊梁山的孙二娘、扈三娘奉上“半把香”。妇女原可以加入，但受歧视，所以参加者很少，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有了女袍哥。袍哥举行开山立堂大典和隆重的“单刀会”、“中元会”，都要由龙头大爷带着哥弟参拜“三把半香”，歃血盟誓：“愿众家哥弟不计生死，不怕困难，同心同德，光复汉业，显姓扬名”。②而这种歃血盟誓，实行异姓结为兄弟，显然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故事里摹拟而来的。

同时，有清一代袍哥的政治目标和口号是皇权主义。黄兴曾经指出：“洪会中人，尤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③四川袍哥“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都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④

（2）袍哥的组织结构和内部关系，实际上是封建等级制和家长制。袍哥发展成员，原是面向下层社会，即所谓三教九流，“惊、培、飘、猜、风、火、爵、耀、修、道、隶、卒、戏、解、幻、听”，对于清朝官吏、衙门皂隶、豪绅地主是不发展的。加入袍哥条件是：“身家清、己事明”、“不择襟襟

---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②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③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④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片片。”所谓“身家清，己事明”，原是指家庭、父母及自身是否投降清廷，曾作奸细，有无纠葛未办，下脚未清之事。“不择襟襟片片”，是不择贵贱贫富贤愚，一律平等对待的意思。[①]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人及其子女不得加入袍哥组织：

第一种，投降清廷，陷害汉族同胞的，不得加入；但作为清廷官吏、差役的却可以加入。

第二种，理发业清朝时称作“待诏”，执行清廷强迫汉人薙发蓄辫，不得加入。裁缝因执行满清当局改变汉人服装式样，不得加入。到清末放松宽了条件。

第三种，凡娼家人、龟公、鸨母等人，绝对不准加入。

第四种，戏剧艺员不得加入，清末才允许加入，但唱旦角的仍不得加入。

第五种，巫人、端公因跳坛须包头装女人，不得加入。

第六种，小偷，窃贼不得加入，但做抢劫的强盗、土匪可以加入。

但是，到了晚清许多豪绅、地主、文武官吏，衙门皂隶等乘机参加进来，情况就有了变化。

一种情况是：袍哥排行中原来“哥”的称呼，演变为称“爷”。大哥称大爷，二哥称二爷，五哥称五爷，五排以上均称爷。特别是行一，通常都称大爷。六排以下，则少有称爷的了。这体现封建等级的称呼，破坏了袍哥的平等精神。以后袍哥内部的封建等级极严，基本上摹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规定六排以下对五排以上无条件服从，不能有一点反抗。大爷一句话就是圣旨，下面人要他们谈话，这叫“请大爷开金口”，解决事情得用“请大爷赏示。”六排以下只有听五排以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 辑第 125 页。

上命令的义务，而没有发言权。有时老幺们对大爷的命令服从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地步。大爷或三爷杀了人犯罪，常常由老么去投案替死。袍哥入会要缴纳一定数目的会费或基金，除用于会期开支以外，差不多全被五排以上的拜兄分了去。除缴纳会费外，兄弟伙还要在大爷生日婚丧喜庆的时候送礼，并且义务帮做劳役。浑水袍哥（职业土匪）出去抢劫，也是小喽啰们去拼命，大爷们坐享其成，分赃物还要占大半。①

另一种情况是：五个堂口之间出现的不平等。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之间分成五班辈，仁字班辈最高，义字低一辈，义字袍哥见到仁字袍哥要喊伯叔。礼字低两辈，见到仁字袍哥得喊公公。以下智字低三辈，信字低四辈，原来各旗堂口之间的平等的弟兄关系，变成了尊卑关系。这到了民国以后才无形取消。②但形成不平等的尊卑关系，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分子渗入袍哥后的反映，是封建、半建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这就造成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参加不同的公口。四川流行的俗话：“仁号一绅二粮，义号买卖客商，礼号又偷又抢，智号尽是扯帮，信号擦背卖唱”。即是说，仁字号集中了豪绅地主、文武官吏、士大夫，社会上的上中层分子，义字号集中了商人（包括行商、坐贾、搞烟赌职业的人），礼字号集中了持霸逞强的地痞流氓、强盗土匪、“飞的跑的”分子、清军士兵，智字号集中了水旱两道的船帮工、力车夫、手工业者、贫苦农民；信字号集中了澡堂、旅馆的擦背、修脚、茶房，江湖说书、卖唱艺人，相命，卖草药，卖假药的人。后来又流行一句口头语：“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这句话概括

① 《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 辑，第 127 页。

了这三堂人的主要特征。在袍哥中，参加仁字号的最高级别，在社会上说话有人听，社会地位高，仁字号在城镇人数较多，有实力；礼字号浑水袍哥多，团结力强，不拉稀摆带喊黄，智字号农村贫苦农民占多数，信字号的人是五堂中最“吃不开”的，因属下九流，为袍哥所不齿。①袍哥中的等级差别关系，加入班辈低堂口的人就越来越少。成都、川西一带，仁字袍哥最多，义字、礼字人很少，智、信两堂在城市几乎无人参加。川东、川南仁、义字旗袍哥力量大，礼字旗也有相当力量，但智、信两堂在城市还是人很少。②

（3）袍哥活动方式的保守和反动色彩。袍哥每一个堂口有一个茶馆，就是袍哥们聚集的场所。这些茶馆前门有时挂上“某某公口”的牌子，会议有时在茶馆举行，有争讼也常在茶馆里调解，所以四川茶馆之多全国闻名。外地跑码头的袍哥，如要来找本地袍哥联络交际，即在某公口的茶馆里，向么大（茶房）做一定的姿态、动作，说几句黑话暗语，表明自己的身份，么大就去请五哥或三哥来接谈，然后就会受到接待。名位高的可以享受殷勤的款待，名位低的只能给吃两餐干饭，“告借”一些盘缠，然后走路。但无论如何，即使身无分文，只要不是冒充袍哥，都可以走遍全川不受冻饿。

袍哥中无固定职业和收入，全凭在码头上混饭吃的，称为“职业袍哥”。这种人，一般都属于社会上的游民阶层。这些人怎样度日谋生、码头如何筹集供给他们的费用呢？一般说来，除了开设本公口的茶馆、饭店赚钱供养外，主要靠开设赌场抽头钱，开设烟馆“摆红灯”，开设妓院等解决经济来源。有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 辑第 128 页。

的码头还组织得力人手，贩运枪支弹药、鸦片烟土，牟取厚利。浑水袍哥（职业土匪）主要靠抢劫、打家劫舍、“关圈拉肥”为经济来源。还有结成帮伙“保镖”，到山区私贩鸦片，成为“保烟帮”。凭他们的势力与沿途公口的交情，安全通过，按所“保”烟土交付给他们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保镖”费。还有的人找别人的岔子，打架斗殴，然后坐茶馆调解，敲一笔钱。这批人不从事生产，大部分时间都在赌场、烟灯房和妓院里混，过着腐朽寄生生活。

职业袍哥所讲的“义气”，无非是兄弟伙犯了不法行为，或给“拜兄”报仇，杀死人命，或因“摆豪”（杀人放火闯下大祸之意）犯案被官府缉拿追捕，码头上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千方百计地将这些人隐藏起来，甚至“拿言语”（向外码说情）、“走字样”（舵把子或头面人物的名片）尽量使他们解脱，或者让他们到外地去“避豪”（躲避起来之意）、“跑滩”（流落江湖谋取生计）。[①]所以后来袍哥组织就很容易变质，逐渐变为黑帮组织。

袍哥组织的特点是它只有横向的关系，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的矛盾对立，缺乏明确政治目标，容易被收买利用。

首先、袍哥是横向联系的民间团体，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各地各设山堂公口。这种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就出现公口码头林立，各自分峙，不相节制的局面。

袍哥组织名称各地不一，一般是称某“公”、某“公口”，某“堂”、某“堂口”。辛亥革命后，依据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结社之自由”权，许多袍哥组织改变了旧有名称，改“公”、“堂”为“社”，“公

① 《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口”、“公堂”为“公社”。“社”下面设立若干分社、支社。“龙头大爷”改称“社长”。在同一市、县、乡、镇，有若干“公社”、“分社”、“支社”，都是独立的组织。民国初年，成都单是仁字旗的分社、支社就有二百多个，各自独立活动，没有领导关系。各地之间也没有更高一级的组织。同一旗号的各社，如成都的仁字与重庆的仁字之间没有任何隶属或主从关系，更没有全川最高领导机关。

社与社之间有的地方联合组织一个总社，推其中一社中有权有势的人作总舵把子，有的县城几个社联合成一个总社，推其中一人作总舵把子，然而这种联合，只不过是为了缓冲袍哥内部矛盾，或为了一个共同的行动，但也没有对各社的强制性和约束性，更不能下命令使其服从。

袍哥组织的分散性，堂口林立，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凝聚力，因此，在历次斗争中都不能形成统一的强大的力量，也很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而被镇压下去。

袍哥组织的这种分散性与独立性，是与四川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孤立性相一致的。袍哥在农村中是以农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在一些乡镇几乎全是贫苦的农民群众，这又与四川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相符合的。

其次、袍哥组织的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是矛盾对立的。对内要求互助，对外却实行掠夺破坏；对袍哥进行袒护，对“倥子”（没有嗨袍哥的人）进行压抑，对本社利害一致，对外社寸步不让。职业袍哥脱离生产，没有正当谋生手段，靠做不正当的事，实行掠夺破坏。如果袍哥与没有嗨袍哥的“倥子”发生纠纷时，袍哥只能维护袍哥，压制“倥子”，也不管对方有理无理。袍哥内部有一句流行话：“只能兴袍灭倥，不能兴倥灭

袍”，否则还要当作“卖客”来处理。有时袍哥为了彼此争码头，抢地盘，袍哥同类相杀。他们的口头禅：“不打不出名，不打不相亲”。重庆仁字旗公社的袍哥李文治，因与“九龙山”袍哥发生冲突，李号召五千余人，进行械斗获胜，从此“威名大振”，封为“少壮大爷”。这种互为仇敌，大摆战场，袍哥械斗，到民国成立以后就更多。这深刻地反映了袍哥的流氓无产者的阶级特性。

第三、由于袍哥是封建的落后的组织，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远大的政治目的，行动有很大的破坏性，因此常常被地主豪绅政客愚弄，被军阀官僚利用，也很容易被官府招安，对上司“反水”。大袍哥范绍增说：“在四川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军事首脑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争夺地盘”。又说：“四川袍哥在助长军阀混战，特别是对巩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①

①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242 页。

四、反清反洋教的斗争

帝国主义在四川疯狂地进行侵略掠夺，清朝政府无止境地对四川人民的残酷盘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四川会党（以袍哥为主），从“反清复明”、“兴汉灭满”发展到参加清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是自发性的零星的群众斗争，但也曾汇集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其中较大的有：

（1）1859 年 10 月，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大关牛皮寨发动的反清起义。李、蓝起义是由以袍哥的前身啯噜联络烟帮、私盐贩为核心发动的。蓝大顺就是在川滇贩运私盐的有名的啯噜首领，人呼蓝帽顶。唐友耕也是云南大关的啯噜首领，人称唐帽顶，“绿林出身，早在川、滇边区拖匪棚，自称大哥”①起义军高举“顺天旗”，自称“顺天军”，推举李永和为“顺天王”，提出“不交租，不纳粮，不出苛捐杂税”和“打富济贫”的口号。起义爆发后，立即向四川进军。李、蓝起义军所以进军四川，是有原因的，因为四川“平日州县官吏以百姓为草芥，人人思乱。……啯匪、教匪无地无之，官兵差役向来通匪。平日官吏苟安粉饰，毫不觉察，一处有变，四处应

①傅渊希：《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75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之”。[①]事实上，咸丰、同治年间，啯噜在全川掀起大规模的抗捐活动，并参加各支农民起义军，联络私盐贩的武装力量，与清军对抗于全川各地。咸丰四年（1854 年），啯噜一支攻入绵竹县河坝场，遇数倍于己的清军的围攻，突围未果，最后全部战死。[②]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 年初），蒲江张老八响应太平军入川，啯噜首领杨明兴率众参加，他们一同割去辫发，以示反清决心。他们杀蒲江县令韩子贞，攻大邑，焚安仁，成都震动[③]。李、蓝起义军进入四川后，啯噜纷起响应。据《新繁县志》载：“咸丰庚申（1860 年），李永和、蓝朝鼎（蓝大顺之弟）分道上窜，……四乡啯噜应之”。邛州（今邛崃）有人聚众焚香，准备起事。崇庆有人与团练冲突，打伤团丁。甚至新都唐家寺“亦有啯噜，白日横行”。不少人声言要迎接蓝朝鼎部义军，共同攻打成都。[④]李蓝起义军入川后发展到三十万人，曾占领四川六十余州县，清朝连换了四个四川总督，最后派湖南巡抚骆秉章为四川总督，他率领湘军数千人，并招募川勇一万多人。他们针对起义军不善于打阵地战的情况，采用阵地战来镇压起义军，蓝朝鼎战死，李永和受伤被俘，就义于成都。起义军在四川血战三年多，后由蓝大顺率领入陕南活动，直到 1865 年 3 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它在近代中国第一次人民革命高潮中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但是，啯噜在李蓝起义中游民阶层的动摇性暴露得比较清

①《曾望颜奏稿》。
②民国《河清乡修志采访录》。
③汪灏：《青屏山房文集》。
④《曾望颜奏稿》。

楚，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唐友耕在叙府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投敌叛变，泄露攻城计划，叙府久攻不克。以后，唐又为清朝效忠，屠杀起义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并曾招降石达开。记载说：

> “唐友耕，云南大关厅人。咸丰中，滇匪起，陷贼，至四川叙州，自拔来归。从战有功，授千总，署通江营守备。贼扰盐进，屡以战击走之，擢守备。十年（1860 年），战峨眉索桥，受伤，破贼双福场，进平天全第山贼垒，擢都司，赐号额勒真克依巴图鲁。十一年（1861 年），援潼川，破贼解围，擢副将。骆秉章督师至蜀，檄友耕会诸军援绵州，令自石桥铺进攻，友耕观望不前，被劾，褫职留营。既而会援眉州，友耕军先至，战比有功，围解，复原官。战青神，阵斩贼目张兴，身被二伤，裹创力战，贼大败。同治元年（1862 年），破石达开党赖裕新于邓州。三月，达开围涪州，友耕驰援，解其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会诸军复长宁，贼引去。是年冬，达开屯叙州双龙场，分党屯横江，友耕攻破江岸贼垒。二年（1863 年）春，贼由横江窜新滩溪，与屏山隔一水，友耕虑贼乘间偷渡，乃济江设伏，诱贼深入，败之。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友耕擢云南提督，留屯川南。”①

不仅如此，后来“连他在川，滇边区所组织的袍哥也变了质。唐帽顶的袍哥组织名叫‘会事’，因为他投清之后，避免

① 《清史稿》，卷 430，第 12305 页至 12306 页，中华书局，第 40 册。

用‘汉流’二字，但仍与‘汉流’来往，专搞破坏活动。”①

（2）1875 年，四川东乡袁廷蛟率众抗粮，高举“粮清民安”的大旗，要求减少粮税，清算粮账。四乡群众同声响应，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就扩充到两三千人，声势浩大。在请愿队伍中，有马洪斋盐帮，还有川东著名哥老会首领吴奉山、王锡三、张志五等弟兄们。对于哥老会、盐帮，官府早已称为“会匪”。袁廷蛟开始不欢迎他们参加，但遭到清军前来镇压时，又请哥老会吴奉山等人来救。他们在深山山峒与清军对垒，影响很大。②到 1879 年 11 月，清廷不得不将捏造袁廷蛟聚众叛乱，请兵镇压的知县、纵兵殃民的提督，均着斩监候，秋后处决，劣绅发往充军，永不准释回。东乡的抗粮斗争，终于得到了胜利。

（3）1878 年，啯噜首领张伟堂率饥民在南江暴动。李、蓝起义失败后，啯噜在四川“气焰仍未少衰”。③四川总督丁宝桢遍布文告“一体严拿，并不时密派亲兵，设法擒拿”。1877 年丁宝桢到四川“下车伊始”，即获“各州、县陆续报获巨匪，委员讯实，就地正法者多至一百余名”的报告。1878 年至 1879 年“共十八个月，通计拿获要匪约五百数十名之多”。④但是，啯噜势力仍在发展，并且依托于哥老会名下活动。如四川出现了“啯匪千党”，四川按察使司镇压“啯匪、会匪、教匪”告示中说：“更有各种匪类，不法情同枭獍。啯匪、会匪、教匪、千党名色更甚”。⑤川东道的批文中称：“太平、

①傅渊希：《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
②民国《宜汉县志》卷 10。
③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
④四川总督（丁宝桢）镇压民间“匪患”札文。
⑤四川按察使司镇压“啯匪、会匪、教匪”之告示。

东乡等县，近年孝又会匪日炽，大则掳掠抢劫、习邪倡乱，小则诈搕扰舍、频年不靖，甚或波及邻封开县，近事可为明证”。[①]在此期间，通南巴一带啯噜首领张伟堂率领南江饥民举行暴动，是最大的一次起事。

1877年夏，南江县发生特大旱灾，地方官“积谷不事”，米商贪利向外地运谷，地方豪绅趁火打劫，造成贫苦农民大量死亡。[②]南江人民在啯噜首领张伟堂的率领下，于1878年3月16日举行暴动，远近“饥民闻风啸聚”，攻入镇子场，砸毁平粜局，杀死贪污中饱的首事，击毙击伤地主及团丁多人，并没收了他们的粮食、财物，赈济饥民。于当夜撤退到巴州所属的陈子寨据守。

四川总督丁宝桢闻变，急饬靖武全军、候补道周振琼、保宁府知府等，督带清军、团练数千人，将陈子寨围困，轮番攻打。后因寡不敌众，且官员采取分化瓦解阴谋，寨被攻破，张伟堂暨数十名啯噜子或被战死或被捕牺牲。[③]。

（4）1884年大邑哥老会首领杨洪中袭击县城，打毁衙门。大邑县知事王喆贪婪刻毒，人称“酷吏”。县民旦椿龄出面“控诸院司”，但王喆钻营于大吏之间，得以“三任县事”，且愤恨旦椿龄，置之以法。当地哥老会首领、监生杨洪中，对旦甚为钦佩，也被王喆禀请上宪革去功名，不得参加乡试。杨洪中遂约同邻近州县哥老会准备起事，得到新津、邛崃、崇庆等地袍哥赞同。杨洪中原计划先攻新津，因防守严密，乃“转计”攻大邑。[④]

---

①川东道批示。

②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

③《清档·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三月丁宝桢奏章。

④民国《大邑县志》，卷14，第13页。

1884年10月17日晨、杨洪中率众二、三百人，打开城门，沿途大呼："县官枉法，诬陷良民监生"，"此来但杀官报仇耳，与民无涉，勿得开门窥探，防误伤也"。①王喆闻变，惊慌缒城而出。杨洪中搜索知县无获，乃焚毁县衙，打开监狱，放出囚犯。但杨攻破大邑城后，各地袍哥未至，乃于当日午间撤出城垣，向邛崃转移。11月18日，攻占邛崃水口场后，一些哥老会成员因沿途抢得富室财物，离队回乡。这充分表明袍哥游民阶层的动摇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致使起事队伍锐减。此时，省城清军也已赶到，哥老会众不敌，战死或被俘四十余人，杨洪中不知所终。

（5）1891年陕西汉中府歉收，饥民相率入川就食，川北各州县官吏以武力阻拒，灾民饥饿待毙。啯噜首领陈坤山、周绵兆率众出川陕老林，在南郑、南江诸县率饥民"估食大户"。次年春，陈、周与清军鏖战数月，遍及川陕"四府十余州县"。②四川总督调大军围剿，陈坤山在巴中被捕牺牲，周绵兆在陕西紫阳县就义。

1896年，仪陇县连续两年旱灾，饥民袭击地主，吃大户。云阳县洪水成灾，数千饥民吃大户。崇庆县饥民掀起抢米风潮。在这些斗争中，哥老会极为活跃。"蜀中之盗匪，恐无一不属会中哥弟"。③

（6）1905年，成都群众反对清朝政府以"新政"为名征收房捐，相约罢市。同年冬，余切、杨均、汪泽、肖光前等人，联络哥老会起事于彭县石洞堰后山，称"大同军"，反对

①民国《邛崃县志》，《兵事志》，第14页。

②民国《万源县志》。

③《四川的哥老会》，《四川月报》第8卷，第5期。

清王朝的暴虐统治。余切任元帅，杨均任军师，“歃血誓师，为条令以诏群众”。起义军一千七百余人，与彭县、崇宁、什邡、新繁、崇庆各州县堂勇、团练四千余人进行多次战斗，毙伤练丁，焚毁教堂，附近的蒙阳场、海窝子等地群众纷起响应。彭县知县赵嘉蕙“视其势不可遏也”，乃采取分化起义军的政策，肖光前等人动摇，余切、汪泽见事不可为，乃“毁玺节符帜”走成都，这场起义半途而废。①

1909 年，清朝政府命令各省抽收门牌捐，威远哥老会首领刘香廷率众反抗，自称“天保元帅”，数月之间，焚毁教堂无算。11 月 20 日，刘率众二千余人至资州罗泉镇“掳掠”票厘局。②

（7）1860 年以后，外国宗教势力——主要是天主教势力深入四川，占买田地，修造教堂，为非作歹，会党的反对外国侵略，主要表现为反洋教斗争。记载说：哥老会“自耶教传播，遂生嫌恶洋人之情，成为激烈之排外党”。③从 1886 年到 1898 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领导的三次打教堂，两次反洋教武装起义，便是四川哥老会发动的有深远影响的著名的斗争。这场反洋教斗争中的主要领导人余栋臣、余翠屏、唐翠屏、张桂山等都是“哥老会魁杰。”④据调查，大足县“龙水镇的哥老会有四面公口、五堂人、即仁、义、礼、智四面公口（没有信字袍哥）。仁字两堂，义字、礼字、智字各一堂，共五堂人。”⑤按照袍哥的规矩，余栋臣等人是挑煤苦力出身，开始只能参

①肖仲仓遗稿：《乙巳彭县之役》，转引自《四川近代史》。

②《续修资州志》卷 10《杂编 · 兵燹》。

③平周山：《中国秘密社会史》第 77 页。

④《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仇教记。

⑤《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130 页。

加礼字、智字号袍哥，后来成了义军领人，社会地位提高了，才“转旗”为仁字号袍哥的。所以有人说：“按余栋臣他们在义军中领导地位估计，加入仁字是可能的”。余栋臣也被公认为大足县龙水镇袍哥的舵把子，当时义军内外都叫他为“余大哥”，即袍哥大爷。起义队伍最多时约一万人，基本队伍和骨干力量是哥老会成员。哥老会在发动起义和领导起义军进行战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哥老会还支持义军筹集钱粮，如张桂山在铜梁县三教场筹办的钱粮，就由该场的哥老会出面筹集。余翠屏在外县向绅士借钱，是由起义军派人向当地哥老会“拿言语”，托哥老会代借。哥老会的执事，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自己的身家，又能保障社会安宁，也乐意做这项工作，钱粮收到，就交给义军。

起义军活捉法国传教士华芳济，发出檄文，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提出“顺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说明他们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且他们在檄文中宣称：“但诛洋人，非叛国家”。

这场斗争，影响所及，四川“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教堂医馆二十余处”。①两湖、贵州有的会党“效川匪余栋臣智，以仇教为名”，开展反侵略斗争。

余栋臣在反洋教斗争中，也暴露了哥老会的动摇性和容易被清朝政府招抚的弱点。清朝政府对余栋臣领导的第二次反洋教武装起义，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在清朝政府的“抚”的政策召唤下，余栋臣最后以释放法国传教士华芳济作为见面礼，以缴械、解散“余党”作为换取身家性命的条件，携带家属自赴清营，向清朝政府“悔罪投诚”。历时半年多的起义失败了。清朝政府将余栋臣押于成都，“禁锢终身”。到

① 《张文襄公电稿》，王蕃台来电，《张文襄公全集》第 158 卷。

1912 年，余栋臣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获得释放回家，但却又打起“复清”旗号，进行复辟活动，最后被枪杀于永川县。[①] 对于余栋臣领导反洋教斗争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他进行的反洋教武装起义的功绩，我们应该给予肯定，但对他的投降和复辟活动，也应该给予谴责。

1902 年，四川爆发了红灯教为主的起义（一般称为四川义和团起义），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在数十州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次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支派红灯教，江湖会、孝义会等所谓被称为“会匪”的分子，纷起响应，汇合成为席卷全川的大起义。从山西调来镇压起义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说：“查此次匪徒，虽以邪拳为名，其实系向来会匪、啯匪之类，假名煽惑。……川省会匪、啯匪，所在皆有”。[②]群众的组合是：“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一”。[③]在起义高潮时期内，各地有组织的人数达三万多人，在三十余州县进行了上百次武装斗争，捣毁数十座教堂，处死十余名教士，打死了数十名清军武将，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的反动统治。

四川袍哥（包括它的前身啯噜）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仍旧处于自发斗争阶段。斗争是勇敢的，广泛而激烈的，许多袍哥在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生命。但它又是分散的，往往此伏彼起，旋起旋灭。由于游民阶层和袍哥组织的严重分散、缺乏政治远见等弱点，在斗争中突

①荣昌县政协：《余栋臣寄押荣昌监狱前后》（稿本）。

②四川大学原藏巴县档案《四川红灯教》资料，《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920 页。

③《高给谏奏牍》，《沥陈四川乱象更换川督折》。

出地暴露出动摇性，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甚至领导起义的头目也容易叛变，接受清朝政府招抚。尽管通过斗争，袍哥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四川社会上日益为人们所注意，但历史证明：封建落后的民间秘密团体袍哥组织是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

五、袍哥大显身手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农民领导的起义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力量了。在中国资产阶级引导下，在四川所进行的活动，一是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铁路主权的保路爱国运动；二是直接进行全川武装大起义，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统治，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反清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个正确的结论。

袍哥在保路运动和武装大起义中都大显身手，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时，袍哥的宗旨：在"兴汉灭满"的口号中，已经注入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要革清王朝的命。

在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先进的阶级，成了当时时代的中心。其他群众的自发的斗争，如袍哥的反抗斗争，只是起配合作用的。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已从旧式的骚动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革命和立宪运动的历史重任都落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肩上，由它充当政

①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402 页。

治的指导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它有两个政治派别——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实力都很软弱。因此，无论资产阶级立宪派或者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四川所从事的活动，都很注意利用和凭借袍哥组织的力量，联络袍哥做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工作。

1911 年 5 月至 9 月的四川保路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它加速了武昌起义的准备，为同盟会领导四川武装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川汉铁路公司在全省普遍按粮摊派，征收租股，这对下层群众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利害关系。所以在保路运动中，四川袍哥组织“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

1911 年 5 月，清朝政府宣布所谓“铁路国有”政策，接着又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川汉铁路拱手给帝国主义，引起四川人民全力反对，终于酿成了四川保路运动。

6 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在省股东和团体开会，不少群众也踊跃参加，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书》，号召四川人民起来“破约保路”。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到会约有二千余人，会后组织到四川总督衙门进行请愿。这在清朝统治四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随着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保路同志会不仅提出“破约保路”的斗争纲领，而且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四川保路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在同志会的号召下，群众立即“争起入会，恇扰若

狂”，“保路破约之声，波荡千里”。[①]“保路同志会成未数日，省中签名已逾十万”。[②]接着各州府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下层组织遍及乡镇街道和各行各业。发展之迅速远远超过“粤、湘诸省”，当时“真是攘臂一呼，全蜀响应”，[③]到夏秋间，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④]据不完全统计，自 6 月至 8 月两个月的时间，全川有六、七十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协会，至于各乡镇、街道、各行各业的保路同志协会，更是星罗棋布，难计其数。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使清朝政府惊恐不安。

这种形势的形成，是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联络袍哥组织，通过袍哥动员群众参加保路斗争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立宪党人罗纶等，就是袍界人士。据当事人回忆：“罗纶之父罗绍周，既是南充文生，又是川北一带多年的老舵把子……因而罗（纶）在川西南的同志会首领和哥老会舵把子中颇有号召力”。[⑤]保路同志会是群众性的爱国的合法的组织，袍哥也借参加同志会取得了公开或半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由于袍哥拥有广大的群众，又渗进军队、衙门、团练之中，由袍哥首领出面号召，因而各州县的保路同志协会迅猛发展，使得反动统治者为之胆战心惊。

1911 年 8 月 7 日（闰六月十五日）盛宣怀在成都的坐探周

---

①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

②《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05 页。

③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第 244 页。

④民国《资中县志》卷 10，《杂编：兵燹》。

⑤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第 109 页；佚名：《中国民族革命的先导人物罗梓卿纶先生》稿本。

祖佑报告说："伊等所立同志会，以保路破约为名，并逼令各州县设立协会。实则会党虽多，各存意见，遇事龃龉，常相反对，同志之说，良不足信。该会自五月成立，始则逐日开会，继则间日一集，近且十余日不闻举动矣。川人心志不坚，于此可见。前云书名者约二万余人，祖佑密加调查，缘每值开会时，凡一切来宾以及随行舆卒但至该会，咸令书名，固无怪书名如是其多也。况省中不乏正绅，鲜闻有涉其间者，其他小民方共额手欢呼，庆免租股，岂复有入会抗拒之理。即此书名一端，可见伊等张大其词，无非恫吓之伎俩而已。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会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众，贻患滋大，实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此皆同志会有以启之也，其罪何可胜言"。[①]8 月 30 日（七月初七日），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向盛宣怀密报也说："每次开会旁听居十之八九，而哥老会与余蛮子（即余栋臣）余党亦约窜入，大乱在此。大吏沽名自卫，不顾大局，任其猖獗，毫不设法弹压解散，错处在此。为今之计，非严办不可，只要拿为首诸人（另单密呈），立即解散。川民畏官畏事，秉性如此，不至虑有他变。苦匪类日聚而不过问，则祸将燎原矣。"[②]

从周祖佑、甘大璋致盛宣怀的密函内容得知，袍哥是保路同志会的主要参加者，所以还有记载说："同志会者，哥老会也。"[③]而权贵官僚们对形势的认识也显然是不足的。

---

①《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123 页。

②《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133 页。

③《民国重修名山县志》，第二卷，附论。

保路运动发生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同立宪派“明同暗斗”的策略，提出“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的方针，积极引导袍哥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具体步骤是1911年7月召开了“新津会议”和8月召开了“罗泉井会议”。

新津会议是由川西南著名袍哥首领侯宝斋出面召开的。侯宝斋，名邦富，四川新津人。“夙尚侠义，凡告贷者，无亲疏多倾囊相助，以是其声势相通，遍蜀西南一带；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者”。1904年，他召集九府袍哥数千人，秘密结成“九成团体”。又嘱同人撰《大同改良》一册，潜行四布，以申盟约。1906年秋，有人告发他谋反，川督派兵对他查办，但无实据，未被逮捕。1911年7月，侯假借六十寿筵之名，召集“九成团体”百余人，集会于新津。会上谋商起义，同盟会员、华阳袍哥首领秦载赓“主张甚烈”。“后决议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规进取。遂推载赓为川东一带主动，宝斋自任川南”。①这次会议，加强了同盟会员与袍哥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并为川东南的起义确定了战略方针。

8月，由同盟会员龙鸣剑、秦载赓发起，召集袍哥著名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参加人有王天杰、陈孔白、罗子舟、胡潭（即胡重义）、胡朗如、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有的首领派“管事”代表出席。会议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同志军，各地在阴历七月间或前后相继起义。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工作，川西北则由张达三、侯国治等人负责进行。会议还决定向各地团练局及富绅借用枪支以

① 《侯宝斋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二，见《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65页。

解决枪弹来源，向各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他公共财物以解决粮饷，并讨论了探查敌情、交换情报、严肃军纪等问题。①罗泉井会议统一了起义的部署，为全川同志军大起义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规模越来越大，从8月24日起，开展了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风潮，接着又掀起了抗捐抗粮的斗争，群众日益突破了“文明争路”的框框，走向捣毁经征局和厘金局的暴力行动。于是，清朝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切实镇压。9月7日，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彭兰村等人骗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消息传开，成都人民扶老携幼、号泣呼冤，奔赴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诸人。“屠户”赵尔丰竟然下令射杀无辜百姓，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血的惨案教育了群众，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宣告破产。

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人，当时曾派人去联络袍哥组织军队，但已失良机。据曾担任《蜀报》校对的蒲殿俊亲信的回忆：成都血案后，各路同志军蜂起，他为温江同志军购买子弹，由刘崇俊利用袍哥关系运出城外，组织军队。蒲殿俊释放后，嘱他与刘祟俊控制这支军队，后因局势好转，“才函促解散队伍”。②另一当事人回忆：罗纶也派人“鼓躁金堂、大邑等县民团、袍哥拿起羊角叉、梭镖、大刀、四板火到成都”。“消息传布，金（堂）、大（邑）、仁（寿）、简（阳）十多县的一齐来了十多万人，把赵尔丰所在的皇城团团围困，要他放出

①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43—144页。

②李明新：《立宪派与士兵运动和哥老会武装》，《四川保路风云录》第58—59页。

代表”。[①]可是没有几天纷纷被赵尔丰派军队驱逐。立宪派对保路运动的领导权，随着“成都血案”的枪声丧失了。至此，保路运动已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全川武装大起义，点燃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烽火，敲响了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丧钟。

①佚名:《中国民族革命的先导人物罗梓卿（纶）先生》稿本。

六、同盟会联络袍哥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他创立兴中会开始，就非常注意联络会党。同盟会成立之后，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且频繁地进行武装起义，于是要各地同盟会支部，分会更重视开展会党的工作。同盟会另一主要负责人黄兴，主张“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且以四川地险民富，足资割据，乃嘱李肇甫、谢持、张知竞、熊成章、尹骞、李为纶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苌臣（竟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势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①]熊克武回忆说：同盟会总部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所以把在四川发难的责任交给我们。四川同盟会员为了武装起义，把联合袍哥作为重要工作。熊克武认为：“四川帮会势很大，散布的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②]

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②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5、6页。

四川同盟会联合袍哥，是采取吸收袍哥参加同盟会和同盟会员参加袍哥组织的办法同时进行。吸收川南著名袍哥首领佘英、重庆袍哥首领张树三和川东北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张百祥加入同盟会，是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与会党联络的重要标志。

佘英字竟成，原名俊英，四川泸州小市人，二十岁入武庠，曾任泸州官卫队长。1897 年，他被推为袍哥组织的“舵把子”，掌握小市义字旗堂口。他在《自述》中写道：“因见巴县邹容作的《革命军》，湖南陈天华作的《警世钟》，才知道我们汉人被满清压迫二百多年。……甲午年中日战争，满清政府打败了，订的马关条约赔银子二万万两，又割台湾、澎湖与日本，并允许他在中国设工厂，才显露出满清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辛丑条约赔银子四万万两，拆毁了大沽口炮台，准备各国驻兵在北京使馆区城内，从此瓜分中国的话愈闹愈大。我们汉人如不起来革命，推倒满清无能为的政府，除去一般贪官污吏，恐怕不能救四百兆同胞出于水火，眼见我几千年来黄帝之子孙还有亡国灭种之惨”。[①]于是，他“日持两书在市井讲演，听者如堵，皆大感动。州牧示禁，复驰乡村讲演，不稍畏避，更益结客，四方有志之士均听号召”。[②]1906 年，佘英东游日本，谒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见其魁梧奇伟，言论风生，大为器重，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责，状委为西南大都督，派同井研熊克武、自贡谢奉琦回川，共策进行”。[③]此后，佘英奔走四川各地，带领袍哥参加同盟会在四

①《佘竟成自述》，《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二期。
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佘俊英传》。
③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2 期。

川策动成都、叙府、泸州、广安、嘉定等地多次起义，直到 1910 年英勇牺牲。

重庆仁字号袍哥大爷张树三，也曾应邀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先生，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张树三是仁字大爷，重庆有名的拳勇教师，力能一掌击碎 20 匹砖，从学门徒甚众。其人任侠好义，喜抑富济贫，在城内开设天泰旅店，广交朋友。袍哥中流传郑成功抗清故事，使其非常感奋，有浓厚的反清兴汉思想。在张树三所交朋友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朱之洪、吴骏英、董鸿词、杨庶堪、江潘、梅际郇等，都是革命党人。这些人在天泰旅店中密设“公书社”，收藏清廷禁书及海外寄回的有关革命书报，供党人阅读。1905 年，经童宪章介绍张树三读中国同盟会誓词，张树三决心参加革命。他借学习实业为名，前往日本谒见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次年回川，他一面筹资兴办实业，一面发展自己的力量，殊不知正进行中，突发恶症病死。辛亥年重庆反正，张树三部弟兄和门徒均参加起义。①

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张百祥参加同盟会，使同盟会又获得了孝义会（一般人称之为“西流”袍哥）势力的支持。

李绍伊字一斋，四川大竹县大寨坪人，“性情豪迈，胆力过人，弱冠游郡庠，即弃举业，从事于长枪大戟及行阵什伍部勒之术”。大竹孝义会成立，“群奉绍伊为之魁”，“绍伊则以此为子弟兵，谓平日既不糜饷，一朝有事则万众可以立集，有大寨形胜为根据，天下事不足为也”。②1906 年大竹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萧德明、陈凤石等回大竹组织“大竹书报社”，以经营书报、文具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联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第 136－137 页。

②《李绍伊传》，民国《大竹县志 · 忠义》卷九。

合李绍伊，争取李加入同盟会。[①]李绍伊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参加同盟会发动起义，如1909年广安起义，除佘英发动哥老会参加外，还有李绍伊领导的孝义会参加。李绍伊原来的宗旨是“兴汉排满”，加入同盟会后宣布的宗旨和目的是“推翻满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放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同盟会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孝义会接受。

张百祥，名启善，四川广安石笋河人，孝义会首领。“少任侠，喜代人抱不平。嗣为讼事，不容于吏，亡命他省”。1905年，“有某君资出洋”，抵东京，加入同盟会，“任联络部事”。[③]他在东京数年，极力主张联络四川会党，认为“蜀中有哥老会可以利用，苟受约束，天下事不难为”。[④]他提出利用哥老会时，必须对它改造，故“议设共进会以改良之，为同盟会外府”。[⑤]1907年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作为联络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的统一的组织，由张百祥任第一任会长。共进会通过张百祥、熊克武、佘英等人把四川哥老会、孝义会进一步团结了起来。

此外，先后参加同盟会的袍哥首领还有秦载赓、张捷先、张达三、刘天成、周鸿勋等著名人物。据记载：在川西，通过张捷先、张达三、高杏邨等“袍界巨子”、“运动有知识、有

①政协大竹县委员会：《大竹孝义会震撼川东北》，《四川保路风云录》第197页。

②四川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调查小组1977年调查记录。

③愤生：《张百祥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四，见《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388页。

④燕冀：《张烈士启善墓志铭》，《民国巴县志·金石下》，卷二十。

⑤愤生：《张百祥事略》。

豪侠气者，数月之间，收入同盟会员七百余人”。[①]在川东南，“先后加入同盟会数以百计，会党中人尤多”。[②]这些会党首领兼同盟会员的，都是同盟会在四川发动各次武装起义和辛亥四川同志军大起义的领导骨干。

同盟会员参加袍哥组织，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是四川同盟会联合袍哥组织的另一重要活动。如熊克武回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袍哥组织当大爷，石青阳、卢师谛、余际唐、黄复生、颜德基等人，加入袍哥、掌握其组织，以发展壮大同盟会力量。“石青阳后来当上仁字旗体安社的执事大爷，自立公口进行活动。同盟会员陈新孜、吴绍周，后来也当上仁字旗维新园的执事大爷”。[③]杨庶堪（沧白）、朱之洪（叔痴）、向楚（仙乔）都是仁字旗的袍哥。[④]杨靖中为联络川西袍哥，他介绍袍哥首领张捷先、张达三入同盟会，再由他们介绍他入袍哥。侯橘园“为了运用哥老会，本人特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组织，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和向阳乡龙头大爷张命三密切联系，并联络三水关龙头大爷向裕如等，对外地他又与孙泽沛等联系”。[⑤]古蔺县的同盟会员为联合袍哥和巡防营，“党人纷纷加入袍哥”。[⑥]王天杰、吴玉章都是身兼同盟会员和袍哥。喻培伦两个叔父——喻汉之、喻彤甫也是同盟会员兼袍哥舵把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同盟会员加入袍哥的为数不少。这样，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给袍哥灌输了新血液和新思

---

①《公孙靖中郎自述历史》。

②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2 期。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 辑 136 页。

④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⑤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稿本。

⑥萧若愚等：《古蔺县独立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73 页。

想，把袍哥并通过袍哥把群众引入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成为了同盟会在四川武装起义的社会力量。

四川袍哥山堂林立，各不相属，封建等级制严重等等，这都不利于统一发动举行武装起义。于是，佘英、熊克武、黄方等人在袍哥中倡导仁、义、礼、智、信，提倡各堂口不分上下高低。佘英自日本回川后，倡导仁、义不分上下，另创立“义会”，自为首领，声势日大。①后来又用“万国青年会”名义，合仁、义二旗为一。②意图是用资产阶级平等思想去淡化袍哥的等级制，把分散的袍哥组织团结起来，为适应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的需要。佘英利用自己在袍哥中的威望，调解各堂口矛盾，努力将川南一带的袍哥改组成立新组织，结果使川南地区的袍哥“仁义扯平，专讲会口”，而无“占左占右之分”。③在川西，同盟会设立“汉流改良自治会”，以罗致群众，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保路运动前，该会会员已达万人。④同盟会想以此来改造袍哥显然是不彻底的，成都仁义两堂相互争权仍未解决。但是通过以上措施，终于把袍哥的自发斗争开始纳入了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轨道，使四川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可以通过袍哥力量来进行。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四川酝酿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是同盟会与袍哥组织联合进行的。如1907年川东发生的刘天成起义，“党羽甚众且与革命勾结”。⑤刘天成，四川崇庆州人，川滇

---

①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页。

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四川诸役。

③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83页。

④《公孙靖中郎自述历史》。

⑤《赵季和电稿》稿本。

黔的著名袍哥首领，“自入同盟会，即以实行改革为己任，窜身滇黔之交，冀可乘间窃发”。1909 年，他响应谢奉琦、佘英发动的叙泸起义，失败后被清吏逮捕，1910 年就义。[①]1907 年，同盟会策划成都起义，“内则在成都结合新军弁目，外则招致民间会党”。[②]当时在成都集中各路袍哥达四千人左右。同年，江安、泸州、叙府起义，都是以佘英的袍哥力量为主力的。在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一个省发动袍哥进行武装起义，以四川为最多。但这些起义单靠袍哥力量，搞突然袭击，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结果未爆发即夭折，瞬间失败。然而，它却扩大了影响，为组织发动辛亥四川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①阙名：《刘天成事略》，《易中先烈备征录》卷一，见《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248 页。

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3 篇，四川诸役。

七、袍哥的巨大贡献

1911 年 9 月 7 日“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以时机成熟，遂于成都南门农事试验场发出“水电报”，上面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锦江顺流而下，迅速传遍川西南。于是，各地同志军揭竿而起，同盟会领导袍哥队伍举行的全川武装大起义爆发。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9 月 8 日，同盟会员、袍哥首领秦载赓在华阳中兴场起义，率同志军千余人抵达成都东门外牛市口，一面与清军交战，一面传檄四方。9 月to日，“四方应召者万余人”“连营四十余里”。9 月 11 日，秦载赓率大队攻打东门未克，退至仁寿县藉田铺，设立“东路民团总机关”，“日复夜函檄各属来会，未几众达二十余万”。①

龙鸣剑和王天杰发出“水电报”后，星夜赶回荣县，率同志军参加围攻成都。王天杰利用自己的袍哥首领地位，用鸡毛文书发出紧急号令，命各场袍哥立即组织同志军，自备武器、钱粮，在荣县双古场集中待命。应召而来的各场镇同志军五千余人在双古场训练三天后，在王天杰、龙鸣剑、范华斋率领

①阙名:《秦烈士载赓事略》,《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465 页。

下，手持大刀长矛、土枪、毛瑟枪等武器，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军。[①]同时“传檄近县，旬日之间，闻风汤景从者，如扶摇之博平沙也。因暨同党领义士二万趣成都”。[②]

荣县同志军经华阳，攻仁寿。在仁寿与秦载赓部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推选秦载赓、王天杰为全军正副统领，龙鸣剑任总参谋长，井研县陈孔白率八百余人，威远县胡御阶所部也来会合。在中兴场、中和场、煎茶溪一带与清军激战。接着在秦皇寺重创清军。但因装备悬殊，补给缺乏，东路军暂时放弃攻取成都的计划，分兵向州县发展。

（2）9月8日，侯宝斋在新津“发檄倡义”，进军成都。同盟会员向迪璋在双流联络各路袍哥起义，“不一二日同志军达双流者逾六千人”。[③]侯、向在成都南郊红牌楼会师，冒雨与清军交战。9月9日，又与清军在南郊交战，歼灭了武侯祠附近清军，“威名大震”。[④]与此同时，温江县罗守经召集民军，冒雨进至草堂寺与巡防军作战。后与温江“八保民军”会合，公推袍哥首领吴庆熙（“吴二大王”）为统领。9月17日，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又与清军在红牌楼激战，打退清军马队，迫使清军闭城顽抗。

温江同志军统领吴庆熙参加红牌楼战斗后，与巡防军在辜家碾交战六小时。后又会同崇庆州孙泽沛所部同志军在温江三渡水，伏击清军，清军投江和枝击毙者八九十人，缴获枪支百

①四川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史调查访问记录。

②杨亶撰：《王天杰传（碑文）》，《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206页。

③《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50页。

④《侯宝斋事略》，《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366页。

余支，子弹万余发，“革命声威从此大振”。[①]崇庆州在“成都血案”后组织的同志军为五军：中军统领马光耀，东军统领张仕义，南军统领黄树藩，北军统领黄步云，西军统领孙泽沛。其中孙泽沛所部“军令肃然”，战斗力最强。孙在三渡水战役后，联合各路民军，号称数万，围攻成都。

9月26日，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南郊回师，与在邛州发动巡防营兵变的周鸿勋在新津会师。周鸿勋，郫县人，曾在成都当过警察，后入巡防营第八营当兵，旋擢升录事。他以哥老会结约同营，“同营士兵固亦惟周马首是瞻矣”。[②]同志军起义后，他率士兵杀管带黄恩瀚，在邛州起义，改第八营为武字营，自任统领，占领新津。同时发出名片号召各地袍哥武装来新津汇合。新津一时成为同志军起义的又一中心。侯宝斋与周鸿勋会师后，侯任川南全军统领，周任副统须。赵尔丰命令四川新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和巡防营提督田镇邦全力向新津进攻。10月3日开始，同志军进行了激烈的新津保卫战，共激战十昼夜。由于侯、周采取单纯的防御战略，处于被动，至10月13日由于饷械缺乏而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

（3）同盟会员、袍哥首领张捷先、张达三组织西路同志军，声势浩大，分为五路：第一路统领张达三，第二路统领张捷先，第三路统领张熙（灌县袍哥首领），第四路统领刘荫西（袍哥首领），第五路统领姚宝珊（灌县同盟会员）。第三路七百余人由矿工组成，第五路由伐木工人组成。此外，成都及附近各州县青年学生组成学生大队五百余人，由同盟会员

①魏广侯：《川西崇宁革命起义经过》，《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27页。

②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72页。

蒋淳风任大队长。学生大队在犀浦与巡防军发生战斗，蒋淳风壮烈牺牲，后张达三巧设埋伏，将进攻崇宁的巡防营毙伤二百余人。张捷先又率军击败六十七标新军。此后，清军在西路处于畏缩不前的状况，只得龟缩死守省城。

在汉州，同盟会员、袍哥大爷侯橘园联络袍哥组织同志军，于 9 月 15 日阻击从德阳驰援成都的一队清军。汉州各乡镇同志军二三千人又开赴成都驷马桥一带，攻打成都北门。9 月 24 日，侯国治率领同志军与清军大战于新都、汉州交界的向阳城。9 月 28 日，董溪卿部同志军又同清军作战于郫县太平寺。新都唐家寺也发生了战斗。

这时，整个川西平原，燃遍了同志军起义的烽火。

川西北藏、羌族居住地区，张捷先等曾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起义。汶川瓦司二十三世土司索代赓是汶川、理县的袍哥首领，与灌县袍哥首领关系密切。同志军兴起，灌县同志军首领姚宝珊去汶川约索代赓起义，计划进攻威州、理番等地。索代赓率三百余藏、羌群众组成同志军，与张捷先统领的川西同志军联合，转战于灌县、郫县、崇宁等地。索代兴土司率部同灌县同志军又攻占灌茂通道上的重要关口娘子岭，进占威州，控制松潘、理番、懋功、汝川等地区。①

（4）同盟会员、袍哥首领罗子舟在同志军起义后，即在雅州建立同志军五营，进行响应。9 月 17 日，罗会合附近各县同志军围攻雅州城，发布告示，号召人民起义，“撞自由钟，竖独立旗”。②荥经同志军起义后，公举李永忠集民军编成荥

---

①索观瀛：《松·理·茂藏族人民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27 页。

②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78 页。

字营五大哨。雅州，荥经等地同志军；与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所率清军近一万人，展开了大相岭阻击战。傅所率重兵，企图越过清溪、荥经间著名天险大相岭，经荥经、雅州城趋成都救援赵尔丰。9 月 18 日，罗子舟率雅州城同志军在荥经同志军配合下，击败驻荥经的清巡防军二百余人，获快枪二百支，军威大振。罗子舟称“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调集各乡团勇分札要隘，利用地形，阻击大相岭清军。为了解除大相岭阻击的后顾之忧，罗子舟又回师雅州城，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罗子舟部围困雅州城月余，牵制了大批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大相岭阻击战。后傅部清军虽以大量伤亡，侥幸突破大相岭进至雅州城，但已不能挽救赵尔丰的灭亡。这支清军最后被同志军增援部队在雅州城歼灭，“傅华封押解成都处理”。①

西昌地区于 11 月 5 日举行起义，安宁河两岸彝、汉、回、藏各族群众加入，众至五千余人。提出“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的口号。冲进西昌县城，攻占县署，处决县令。②

道孚县数千群众一举焚毁法国天主教堂，杀死法国教士，攻占道孚县署，擒拿清朝的设治委员和法国教士谭司铎。巴塘藏、汉人民结集万人，两度围攻县城。川边藏区除巴塘、昌都以及北路的甘孜、炉霍等几个孤城外，群众的武装起义控制了广大地区。

（5）川西同志军起义后，大竹同盟会员、孝义会首领李

①吴光骏等：《大渡河，大相岭阻击清边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34 页。

②钱安靖等:《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反奴隶制的英勇斗争》，《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17 页。

绍伊，率领“孝义会”群众数千人起义响应，拿起春秋刀、牛角叉、盾牌、火药枪、罐儿炮各式各样武器，占领大竹县城，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檄文，宣称驱除鞑虏，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号召各地人民共同起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随即分兵四出，占垫江、邻水、广安、岳池、梁山，攻达县、开江、宣汉、通江、巴中、南部等地，所至势如破竹。数月之间，川东北十余县尽入李绍伊控制范围。各县均自行推举官吏，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独立。这支起义军纪律很好，严禁奸淫，抢劫，仇杀，所至各县杀官吏，开监狱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李绍伊等到处宣传革命思想，“说明革命的目的是打倒专制腐败的清王朝，恢复汉族自由，解除人民的痛苦，不是争城夺地，争帝争王。……使中国成为昌明强盛的国家，人民享自由幸福之生活”。“听众欢声雷动，皆呼李都督万岁”。①

东乡由王维舟联络当地哥老会分四路围攻县城，活捉知县，宣布独立，成立东乡军政府。后与李绍伊孝义会队伍联合围攻绥定，成立达县军政府。②

余栋臣旧部袍哥首领张桂山乘机再起，捣毁大足龙水镇警察分所，夺得枪支子弹。龙水镇袍哥首领举张为同志军首领，集余栋臣旧部为基本群众五千人，进占县城，转攻富顺，张打出“东亚义字全军水陆大统领兼富顺县军政府都督”的旗帜。③

岷江上游著名的袍哥首领胡潭，四川犍为人。他得知“水

①大竹政协：《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96至298页。

②王维舟：《回忆辛亥革命川东绥定东乡地区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87至188页。

③陈日刚：《大足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69页。

电报”后，立即号召当地群众起义，率领民军三千余人，围攻犍为县城达十余日，赶走清兵和知县，占领县城，由胡潭主持县政，采取“官法与袍哥礼法兼施并用，以维持地方秩序”。①

宜宾太平新场成立同志军，推李敬廷为队长，联络以彭九皋为首的绿林二百多人共同起义，两部人马都是平民与农民，都是袍哥，以袍哥的号令为号令，沿途粮宿由地方袍哥码头招待供应。后与胡潭的同志军会合，向成都进发。②

威远推义字旗袍哥大爷杨绍南为保路同志军首领，在瓦窑坪、牛王庙两败清军，与胡驭垓保路同志军会合，和义字旗袍哥首领甘东山、晏锡山、兰水三，仁字旗袍哥首领倪福兴等率领的同志军攻占威远城，杀死知县。③

古蔺由同盟会派张仲华等人，在保路运动后回县联络袍哥组织同志会，准备武装起义。当时驻防古蔺的巡防军管带李晓清的部属全系袍哥，为联系李反清，革命党人纷纷加入袍哥和巡防军。11 月 27 日，革命党人见时机成熟，发动反正，宣布古蔺独立，推李晓清为革命政府都督。④

（6）重庆同盟会支部在保路运动中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成都血案”后，朱之洪、朱必谦利用袍哥身份，联络福寿场仁字旗堂口大爷冉炳之，负责巴县暴动。11 月 19 日，冉炳之派人命圆明场李心田立即组织队伍。次日，李拉队伍至老关口，

---

①宁芷树：《犍为同志军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56 页。

②李乐伦：《大关河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第 315 页。

③威远政协：《辛亥威远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48 至 152 页。

④肖若愚等：《古蔺县独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72、273 页。

大摆疑阵，掩护重庆独立。[①]同盟会员、袍哥大爷陈新孜、吴绍周发动袍哥祝春发参加起义。[②]况春发劝说川东道朱有基心腹、炮队营教练邓昆山拆缴炮针机柄支援革命，并“纠合果敢士三百人”组成“义勇队”。[③]重庆袍哥参加反正的有名人物，还有石青阳、田德胜、卢汉臣、蓝秉成、邱绍芝、赵国清、林振国等。还有从成都龙泉驿起义，带来一部新军，当了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的夏之时也是袍哥。[④]重庆反正那天早晨，况春发佩大刀、持丈八蛇矛，与田德胜等率敢死队，受张培爵指挥包围朝天观，勒令清廷知府钮传善缴印投降，况春发大呼“中华民国万岁”。田德胜持黄缎大旗走在队伍前头，受降之际，他一剪刀将钮传善的辫子剪掉。蜀军政府成立后，况春发坚持不受官职，仍操鞋匠旧业；田德胜讨还他为革命齐集队伍的垫款二万银元，成了“袍哥败类”，为正派者所鄙视。至于蓝秉成、邱绍芝、赵国清、林振国等，都曾率领仁义两堂袍哥队伍接受同盟会革命党人指挥，奋勇出力，占领要冲，接收衙门机关。卢汉臣等则在南岸组织敢死队，受石青阳指挥，占领南岸各要地。未能参加重庆起义的唐廉江甚为懊悔，过了几天，他偕同李绪也、杨汝襄、徐绪五到璧山策动袍哥起义成功，蜀军政府便请其返渝担任革命宣传员工作。

广安是四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的一个主要基地。辛亥十月，曾省斋化名吴从周组织孝义会数百人攻占垫江、广安，

---

①傅渊希：《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77 至 180 页。

②陈攸序：《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反正’》《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 353 页。

③《况春发传》，民国《巴县志》卷十下。

④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 辑，第 137 页。

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吴为都督。随即招募孝义会、哥老会人士入伍，扩编军队，三路出征。东北一路五百人取道达县、宣汉边境，攻占巴中，后失败；正北一路出兵后也失败。西北一路千余人围攻顺庆不利，绕道而下蓬溪、射洪。起义军虽然先后攻下十余座城镇，但皆或得或失，有的人对蜀北军政政令阳奉阴违，真正听指挥的仅有广安、营山、岳池等地。①

綦江立宪党人池幼骞，在保路运动兴起后，回县向哥老会首领共进会员池列五宣传保路权和反清廷。时入共进会的袍哥首领尚有多人也参加反清活动，派兄弟伙打入盐防军、巡防营，于辛亥冬组织同志军三百余人，攻占县城，迎同盟会员杨锦云为都督，建立军政府。②

各地同志军的起义，汇成排山倒海的反清革命洪流。同盟会的政纲、《革命方略》为多数同志军所接受，“各军皆树旗四面，文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之旗帜”。③如周鸿勋在向名山进军途中，加入同盟会，并在名山“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旁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于士兵肩章上写‘中华国民军’，周则用中华国民军武字营统领头衔”。④后与秦载赓会合，被推为川东南同盟军统领，联合进军攻占自贡。

同志军一般是同盟会通过袍哥组织而成立的，广大农民和

①南充师院：《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辛亥命回忆录》（三）第 291 页。

②綦江政协：《綦江县辛亥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82 页。

③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382 页。

④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78 页。

其他下层群众是以袍哥组织为渠道加入的。不少地方同志军的领导人都有袍哥首领的身份，其成员亦多是袍哥，所以记载说：“四川之独立，哥老与有力焉”。[①]“川乱多系哥会、革党勾结起事”，[②]是符合事实的。

各地同志军的武装起义，造成了推翻清政权，实现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在王天杰率师回荣县后，清朝的荣县知县仓慌逃走，吴玉章与王天杰主张独立，自理县政。9 月 25 日，召集各界开会，由吴王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这比武昌起义要早十多天。“首义实先天下”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③]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

在广安成立的以吴从周为都督的大汉蜀北军政府，是全川用都督名义建立的第一个军政府，它的“重要职员皆为同盟会员”。[④]

11 月 5 日，同盟会员、新军排长、袍哥夏之时，策动新军于成都附近龙泉驿起义，11 月 23 日进入重庆，清朝官吏见势非逃即降，重庆同盟会员、袍哥和夏之时新军于当天成立由同盟会领导的蜀军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随后，“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皆闻风反正”，[⑤]宣布接受其领导。蜀军政府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旗帜。

9 月 2 日，清廷任命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

①《重修彭山县志》卷二，“附论四”。
②《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 162 页。
③《王天杰传（碑文)》《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206 页。
④白在中：《辛亥革命广安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 310 页。
⑤《蜀军革命始末》，《巴县志》卷 22。

二千人入川镇压保路运动，11 月 27 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资州斩杀端方及其弟端锦，并通电响应武昌起义，旋即回师武汉。

11 月 14 日，赵尔丰不得不将被囚禁的蒲殿俊等人释放，蒲殿俊等人随即发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文，要求同志军停止战斗，“息事归农，力挽和平”。他们进而同赵尔丰订立密约三十条，允许在保存赵的军事力量和权力的前提下，将政权交给立宪派。11 月 27 日，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担任都督，新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不久，赵尔丰利用旧有军事力量，在 12 月 8 日发动成都兵变，叛军大肆焚掠成都，蒲殿俊被吓跑。兵变发生后，同盟会员尹昌衡率陆军小学校学生和新军六十三标等士兵，入城镇压叛军。成都附近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率队进入成都维持治安，“所在屯驻皆满”。[①]12 月 9 日，新军将领周骏、彭光烈等约集士绅张澜、邵从恩、徐炯和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董修武等人开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建大汉四川军政府。12 月 22 日，尹昌衡将赵尔丰“明正典刑”，枭首示众，大得人心。

在四川独立的过程中，后来逐步形成成都大汉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① 《四川辛亥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62 页。

八、盛极一时的袍哥组织

袍哥在保路运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资产阶级以袍哥组织为纽带同农民群众、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结成同盟，使自己取得了领导权，建立了四川军政府。

袍哥在军政府成立后，从清朝统治下的“会匪”，变成为革命的“功臣”，从非法的民间秘密结社，变成为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于是各地袍哥“公口”挂牌公开活动，盛极一时。

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在蒲殿俊任都督时，“这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他们又无法律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非凡，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①]12月8日“成都兵变”后，尹昌衡、罗纶任都督时，“此时仓卒间，欲约束各方面来省之数万同志军，及胁迫散走四方之巡防

①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37页。

军、新军，使之慑服归队，或缴还武器，政治权力及军事纪律既一时无法树立，只有赖各地哥老会能听命军政府，发挥其潜力，利用其帮规”。[①]于是军政府请袍哥来维持成都秩序。尹昌衡、罗纶设宴邀请袍哥首领及其他重要人物，“席间、副都督罗纶谓：诸君为革命苦战、牺牲，忠勇可嘉。前次决心抵抗赵尔丰，将吾等性命保全，若无君等任侠之行，则吾等被捕囚之九人早惨毙矣。兹新政府成立伊始，而人民即遭此抢劫之灾，现政府已经改组，于当前任务，尤为重大。设此次无成效，则吾辈耻莫大焉。即承君等设立‘公口’，助维秩序，甚盼能尽量捍卫人民，鄙人代表民众预为致谢，语毕即向哥老会人等敬礼。彼等亦允力事维持”。[②]此后，成都“各街所借以维持号召者，惟袍哥（即哥弟会）之公口而已”，出现了“皮管街”的局面（所谓“皮”即是袍哥，“皮管街”即是袍哥管制城市）“皮管街即袍哥管制城市，以致演成为‘人对事对’，袍哥关系支配了公事，码头的权威超于地方下级政权机构的权威，袍哥大爷的权威超于下级政权人员的权威”。[③]

尹昌衡，周骏等军政府首脑，为了利用袍哥的力量，还亲自成立码头，外出拜码头公口。“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后，即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好几天内，天天都到成都各街口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的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亟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骏

①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08 页。
②杨少荃：《四川革命小史》，《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22 页。
③《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 年印。

就任军政部长后，在军政部亦挂出了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①]另据人回忆：“参谋部也不甘落后，即起效尤，相继成立了‘大参公’”。[②]军事巡警总监杨维，“亦由义字旗换仁字旗，组织‘汉兴会’”。[③]“大汉公”以尹昌衡、罗纶为正副社长。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首脑，成立码头“公口”，推波助澜，成都和川西各地袍哥组织此兴彼起，参加人成倍或几十倍增加。据不完全的统计，成都附近几县的袍哥“公口”，骤然增加了三百多个。[④]成都新设立的比较有名的“公口”，尚有“汉军公”、“福汉公”、“从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福禄公”、“云龙公”、“同庆会”等。[⑤]清末袍哥不吸收妇女，辛亥革命后妇女也起来组织“公口”，记载说：成都“东门外，成立女公口二十余处，其首领进城拜客，各公口赠花红，巡警总监禁止之，政府欲撤街坊公口不敢发，迻已照会总公口改从新名词，称某某公社，遵改者寥寥”。[⑥]成都如此，其他各地纷纷效尤。如广汉，“这时袍哥真是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因为清朝禁止袍哥，那时是秘密活动，而民国则是提倡哥老的，哥老组织合法了。在这种势头下，于是人人都想当袍

①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672 页。

②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③《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 年印。

④《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

⑤《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 年）。

⑥秦枏：《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58 页。

哥，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①]甚至一个乡镇的哥老会组织，也纷纷扩大，开“山堂”。如崇庆县元通场，这时袍哥就劝导流氓地痞、地主纨裤及大小商人加入哥老，“元通国”里的黄霸天“泽寰（三子）弟兄经人介绍，做了元通场的‘坐堂大爷’黄心斋的拜弟”。从此给黄匪帮危害人民扎下了“元通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窝子。[②]

重庆蜀军政府的军政首脑也倡导利用袍哥的力量，亲自成立码头。张培爵、夏之时同尹昌衡、罗纶一样，在重庆也成立了“大汉公”公口。在张培爵、夏之时的倡导下，重庆袍哥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当时重庆仁字旗大爷唐廉江还乘机策划联合全城袍哥公口组织“重庆袍哥联合会”，在梅坡萃芳茶园开袍哥代表大会。“但夏之时领导的公口‘大汉公’的代表，提出要让夏之时任总龙头，遭到唐廉江激烈反对，使夏之时未能入选。”[③]会后曾经刊出一种小型四开报纸《国是报》，是重庆袍哥办的报纸，虽然两三个月后就停了，但却是前所未有的。

在广安州城成立的蜀北军政府，是依靠袍哥的力量成立的，并且依靠袍哥来管理地方事务。“清朝反动官府爪牙乡绅垮台之后，各自隐蔽，哥老会自动的起而掌握地方事务。哥老会把各公口公开了，不像从前的半秘密形式，都将公口字样上，嵌着一个汉字，如广安城区有‘关汉公’，其字为张观风（蜀北军政府副都督）所书，其他公口，亦央请有名人士书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6辑，第79页。

②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四川文史资料选辑》25辑第159页。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31辑，第139页。

写，并言哥老会为‘社会’，这在广安风行一时。乡绅粮户亦有海袍哥（下袍哥之海，又曰海皮，人称之曰泡皮）的，则哥老会进部规矩——身家要清，己事要明，则不如以前之严格。而哥老会已成形式，则与民军分不开，且具有革命意识。孝义会虽有参加民军的，然在地方的事务上消沉了”。①

袍哥在辛亥革命中红极一时，但它固有的弱点暴露得也更为充分。有的袍哥根本不了解革命意义与目的，“以为保路之举，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逐杀官吏，以此龃龉”。②广汉同盟会员、袍哥大爷侯橘园组织同志军打算开到成都围堵北门，但为其他袍哥大爷反对，认为侯是一个留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同盟会员，不是真正的袍哥。当侯讲述反清革命的道理，连山的大爷秦老皮深怕众人被侯说服，“在侯刚一开腔，就带头大闹，猛一枪，将侯打死”。③有的被敌人收买，杀害领导人。如赵尔丰厚贿收买侯宝斋部军需长杨虎臣，在侯宝斋经过新津保卫战后，率部向洪雅方向转移时，被杨刺杀，死于古松庵。④袍哥头目邓大兴杀秦载赓于井研，也有类似之处。记载说：秦领兵“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内江、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十余州县。后至荣县、闻井研虽经收复，一切新政多为官绅把持，致未举行，乃单骑驰往调查。至则果然，前所颁各项，并未启用，其主政者仍为该县旧令，施行文书盖用清印如故，烈士大

①白任中：《辛亥革命广安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 309 页。

②《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51 页。

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16 辑，第 78 页。

④《侯宝斋事略》，《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366 页。

怒，立令呈缴。奸党咸怨，念非毙烈士不能夺回此印，乃嗾其党邓大兴于九月十九日（11 月 9 日）伏甲北门，俟烈士出，从马后击毙之”[①]。袍哥内部这个码头与那个码头之间、哥老会与孝义会之间也常常发生械斗。如川东北，哥老会与孝义会经常互相冲突，大竹县李绍伊率孝义会在大寨坪起义，随即分兵四出，进攻占领邻近各县。大竹各乡镇哥老会聚众二千余人，于 9 月 25 日去攻占孝义会占领的大竹县城，“李绍伊得到这个消息，9 月 26 日即率所部返回大竹，向已攻占大竹县城的哥老会武装进攻。激战一夜，未决胜负。乃佯作败退，邀请哥老会派代表谈判，但突于 9 月 27 日夜猛扑县城北门，破关直入。哥老会固无戒备，大败。自此大竹就纯为孝义会势力范围，李绍伊乃召集会议，推本县举人吕廷桢为县知事，同盟会员邹畏之为副知事。吕廷桢、邹畏之出面调停江湖哥老会和孝义会之间的冲突，两派斗争暂时缓和”。[②]川西袍哥与川南袍哥内部仁、义两旗号之间也经常发生暗斗。“哥老内部，则成都上方队伍多是仁义两辈，互相争权，下方早由佘鼎（竟）成先烈将仁义扯平，专讲会口，亦见不惯上方哥老占左占右之分，暗中不免许多误会”。[③]至于“皮管街”，即袍哥管制城市，其恶果只能使城市为“江湖好汉”所控制。在旧中国城市盘踞着官僚、地主、商人，成都是消费城市和鸦片的集散地，重庆是西南物资的集散地和主要港口，城市的表面繁荣使得劳动人民和流氓无产者向往，袍哥管制这样的城市，只能是流氓无产者破坏意识的恶性膨胀，恶棍和流氓沉渣泛起。“于是袍哥就其本质，发

①阙名：《秦烈士载赓事略》，《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466 页。
②大竹政协：《大竹孝义会震撼川东北》，《四川保路风云录》，第 198 页。
③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83 页。

展为专作勾结匪类，贩运枪毒，聚赌抽头，招摇关火，危害善良人民。袍哥码头亦发展成为烟贩、盗匪、恶棍、流氓、土豪、恶霸的罪恶集团”。[①]当时成都，“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情况如此，而军政府当局置若罔闻。民间已有兵变抢劫之谣言，以至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②]总之，袍哥管制城市，只能是越来越混乱，破坏有余而缺乏应有秩序，更无任何建设可言。

---

① 《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年印。

②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08页。

九、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反清朝政府的革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种两重性，在它的政党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中就表现了出来。这种情形，特别是在对待民众组织袍哥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他们感到力量弱小，必须依靠袍哥力量和袍哥组织同农民、劳动群众、流氓无产者结成同盟，就去联络袍哥，利用袍哥，使自己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军政府。在革命过程中，遇着反革命“兵变”，进行复辟，政治权力及军事组织无法树立，政局不稳定的时候，就不得不依靠袍哥的力量来稳定局面。但是，当军政府建立，革命党掌握了政权，政局得到稳定的时候，对袍哥的态度就急剧地逆转，由联合袍哥和依靠袍哥迅速转为取缔袍哥乃至武力镇压不放下武器的袍哥队伍，他们一脚踢开了袍哥。他们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民国初年的报纸，不管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喉舌，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都大声疾呼要剿办“会匪”。四川袍哥被镇压，也正是受国内局势的影响而形成的。

充当镇压四川袍哥的急先锋，是云南都督蔡锷所派入川的滇军。成都四川大汉军政府重建后，蔡锷就诋毁它是“哥老

会政府”，成都发生“匪乱”，并通电“渝、鄂军政府，谓成都系哥老会政府，将荡平匪乱”。①蔡锷派谢汝翼梯团、李鸿祥梯团及黄毓成支队，进军四川，“欲树蜀军声援，进窥成都”。②谢汝翼等入川后，即推进川南叙州府、泸州府一线，主力向资州、自流井、犍为推进。

成都军政府“闻滇军将进入川西，趋向成都，诚恐贵阳惨祸再见于四川，各界惶恐，军政府遂以第一镇宋学皋部，推进至资州、自流井、犍为设防，与滇军在陈家场、界牌一线对峙，形成一触即发之势”。③

重庆蜀军政府不赞成“蜀军进窥成都”，“轻启兵端”，④但反对尹昌衡提倡设立公口，催促成都军政府解散袍哥队伍。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说：“‘会党诚足诟病，然吾人以大局为重’岂为位置而革命者，如此必大扰乱，复电力止之”。⑤使滇军借口声援重庆蜀军政府进窥成都的企图，并没有能达到目的。

但是，入川滇军对同志军袍哥队伍，却进行了武装镇压。滇军谢汝翼梯团在叙府，李鸿祥梯团在泸州，张开儒支队在犍为，黄毓成支队在自流井，都对袍哥队伍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记载说：“川南未散之同志军与援川之滇军留叙府及自流井者不相能，滇军以匪目之”。⑥滇军“冒称奉中央政府命令，

---

①蔡锷致尹昌衡电，见《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09页。
②《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66页。
③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09页。
④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95页。
⑤《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66页。
⑥秦枬：《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58页。

尽遣散同志军，并戕贼其首长”。川南总司令黄方及所部百余人在合江被滇军惨杀，黄方甚至被“烹其肝而食之”[①]，“百余人悉被剖腹挖心，极其残酷”，对蜀军政府震动很大。[②]罗子舟（罗八千岁）在嘉定，以同志军二千人防御滇军，被滇军攻打，“败遁仅存数百人。”[③]

周鸿勋在自流井，滇军“竟诡称奉新政府命令，收束周部，将鸿勋诱杀”。[④]周鸿勋“临决时仰天长啸曰：‘勋之首难，以庇护我汉族同胞，今不死于满，而死于汉，岂首难者应蹈陈吴之故辙乎’？”[⑤]张桂山在富顺，参加富顺司令范华斋宴会，“宴会正酣，大部滇军突然开来，占领富顺县城，包围范的司令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张的几个卫士武装，同时出其不意，将桂山反缚，分别禁闭。张部只陈玉廷一营系由靖远营改编，稍习军事，其余多系新兵。滇军又在城外架大炮轰击威胁。战事一开始，陈玉廷阵亡，全军遂告溃散。事后，范亦被滇军杀害”。[⑥]张桂山当晚挣断绳索逃跑，找到一小船，回到大足，但他率领的大足同志军遂归于瓦解。

滇军入川镇压袍哥队伍，在革命党人中就如何处置袍哥队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记载说：“民国元年一月，党人张知竞主公开哥老会，谢持力言军府不可与其事。因开同盟会议之，争辩甚烈，几酿变乱，然后乃定”。[⑦]经此会议，四川资

---

①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84 页。
②向楚：《重庆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93 页。
③秦枬：《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59 页。
④周开庆：《记周鸿勋烈士》，《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433 页。
⑤《周鸿勋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二。
⑥王凤：《张桂山与大足保路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13 页。
⑦《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465 页。

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袍哥的态度就来了一个逆转，由联合和依靠袍哥转为镇压袍哥。

四川军政府对袍哥的取缔镇压，有几种方式：

（1）成都军政府下令，限日取消袍哥“公口”，由军事巡警总监杨维发布告示执行。杨维字莘友，四川叙永人，同盟会员。他任巡警总监后，成立了三千人的武装警察队。他发布过“三杀令”：“敢有扰乱治安者斩，敢有造谣生事者斩，敢有言亡清尚存者斩”。还颁布《军事巡警总厅警令》七十四条。他“勇敢有为，戡定暴乱，恢复市井，厥功最多，尚得人民爱戴”。[①]成都军政府由杨维执行，限日撤去袍哥公口之后，他下令将成都二百多公口的招牌一律取消。后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结社之自由”，都督尹昌衡“又令杨维查会党汉流悉撤之，有改社会团体者”。[②]因此，民国时期的四川袍哥有的改了旧的组织名称，“公口改为公社，正副龙头大爷改为正副社长”，[③]变成了社会团体。后在军队中也下令“取消第二镇（师），第三镇（师）中原有之公口组织”。[④]

（2）遣散同志军，要参加同志军的袍哥“释兵归农”。尹昌衡采取拉拢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的办法，由他们鼓吹“释兵归农”。记载说：“同志军入城以后，收一二万人成军。张达三和张捷先对川西同志军发出‘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的号召，其他各路同志军，亦闻风响应，政府未费一

①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140 页。

②幼铭撰：《尹方昭小传》，《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下册，第 231 页。

③《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 年印。

④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10 页。

钱，数十万同志军，均克日散归田里，而绝无哗变之事”。[1]当时也有答应发遣散费后解散，如孙泽沛率领的未收编的同志军队伍，军政府答应“一律发遣散费遣散，也有连遣散费都没有领自动解散的”[2]这数十万被遣散的袍哥队伍，有的将弄到的“打起发”（即抢来的、诈来的）的钱财回家买田，有的回家做生意，有的仍干老本行，但许多生活无着，成了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成为民国时期四川严重的社会问题。

（3）革命党人和旧势力妥协合作，武装镇压袍哥队伍。据但懋辛回忆，1912 年 3 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以后，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张培爵调他担任成都府知事兼四川团务督办，对他说：成都“已令巡警总监杨维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如有不遵者严行拿办。但城外各县，袍哥土匪，确是颇为猖獗。因为你在泸州（指但任川南总司令）的短短时间内，扑灭了二十多股大匪，所以要你任成都府知事兼四川团务督办，先行率团队清乡，并督同各县知事严行会剿大股土匪。如县知事有不称职者，立即报请革职”。但懋辛接任后，“派员到各县会同县知事及有关团绅，分别调查匪情及其往来的地形和随时出入的孔道，……扩充警备队一千人，自行剿办”。后调了两连陆军和他的警备队，会同“团绅”到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崇宁等县清了一次乡，对“袍哥土匪”进行剿办。但是，一批一批未安置的同志军袍哥队伍遣散回乡，成了“袍哥土匪”，剿是剿不完的。所以但懋辛说：“川西坝内虽已略为安定，而飘忽不定的股匪仍时有所闻。我已知我的三个月计划不能实现，募

①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22 页。
②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15 页。

集散兵岂短时间所能办到，于是就提出辞职”。①

革命党镇压袍哥最突出的是派熊克武率领的第五师等军队，去大竹消灭李绍伊孝义会（“西流”袍哥）。记载说：“为了消灭李绍伊的革命势力，派蜀军总司令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军到大竹解决李绍伊武装，又派新军第二师第七标标统侯国治率全标人马到大竹，又派川北观察使张澜率团队到大竹协助。侯国治力攻大寨坪，李绍伊据险坚守。当时李绍伊武器落后，敌军皆洋枪大炮，起义军失败。熊克武派人劝李绍伊下寨。……李绍伊到大竹之次日晨被杀于南门较场”。“李绍伊被杀后，陈嗣煌为大竹知事，江湖（“汉流”袍哥）首领王福山等与之勾结，四出搜杀孝义会群众，凡曾参加孝义会者，几无一幸免”。②这种残酷屠杀孝义会群众首领，固然是有“西流”袍哥与“汉流”袍哥的长期矛盾交织在一起，有袍哥组织之间的斗争，但身为同盟会四川负责人的熊克武率领军队去大竹镇压是有不能推脱的责任，并可以从中找到熊克武以后变成四川军阀的根源。

熊克武率领第五师，参加镇压了大竹孝义会群众和首领李绍伊后，接着第五师龙光旅又参加了杀害大足同志军袍哥首领张桂山、李华臣。记载说：1912年冬，张桂山、李华臣遭熊克武的第五师疑忌，加以部分封建地主对张、李不满，与县知事勾结，进行诬控，经胡景伊批准，由军队将其逮捕，二人同时被杀于县衙前鼓楼坝石狮子侧。桂山临刑连呼：“到民国才

①但懋辛：《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37、38页。

②大竹政协：《李绍伊领导大竹农民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99页。

死，死得不值”！神色自若。①

在民国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滇军和四川革命党人到处取缔和镇压袍哥队伍，使得以袍哥为纽带同农民、劳动群众、流氓无产者结成的同盟破裂，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在四川迅速归于失败。1912 年，西藏农奴主叛国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策划脱离祖国的武装叛乱，派兵进攻川边，逼进打箭炉，攻陷理塘，围攻巴塘，川西震动，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被袁世凯任命为征藏军总司令。7 月 12 日袁世凯任命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辛亥革命成果从此就被袁世凯的爪牙胡景伊篡夺。

1913 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企图挽救辛亥革命的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响应，熊克武、杨庶堪等于 8 月 4 日在重庆宣告独立，进行讨袁、讨胡的战争，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于重庆。“军置支队凡四，一支队司令龙光，率前卫司令吕超、团长方化南、营长周官和、李遐章等，由中路永（川）、荣（昌）、隆（昌）进窥泸州。二支队司令范榛率团长周国琛、营长李尊、易存明等守御北路。三支队司令兼安抚使李树勋。四支队刘植藩率所部及石青阳部屯防南路，分拒滇黔两军。以余际唐为水师司令，团长有邹有章、营长李天钧等归其指挥。以学生军为炸弹队，曾宝森、颜德基皆队长。川东宣抚使黄金鳌，护水道交通。团长卢师谛、营长张威及张民立部驻夔、万”。②

袁世凯亦于 8 月 12 日宣布，说熊克武“附和乱党”，“图谋背叛”，褫夺熊的军职，命胡景伊严拿惩办，并命湖北、陕

①王凤：《张桂山与大足保路同志军》，《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15 页。

②《四川癸丑讨袁之役》，《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34－35 页。

西、云南、贵州四省都督派兵围剿。胡景伊统率的周骏第一师、彭光烈第二师，孙兆鸾第三师、刘存厚第四师及王陵基模范团等部，兵力超过讨袁军两倍以上。

此时革命党人又想到要联合袍哥队伍，派人去做联络工作，但袍哥参加者寥寥。据记载：各地如西阳邹杰、开江颜德基、保宁孙洪震、张百祥、龚焕然、庄逸侠、孔宝庆、母剑魂等（孙、龚、庄、孔都遇害），绵阳张天宝、张品三，荣县的王天杰、赵叔尧等，中江谢伯诚、汪蜀宇、余龙等，均去联络袍哥举义，但是，“仅遥为讨袁军声援，时起时蹶，力不能胜其志”。①

辛亥革命时，川西同志军袍哥队伍有数十万人参加大起义，此时仅广汉、安县、什邡、金堂、绵阳等地少数袍哥参加，并很快就溃败。“1913 年熊克武在重庆起兵讨袁，广汉张品三起来响应，成立川北讨袁军，自任司令，以张明之、张菊东两大袍哥及三水关的袍哥大爷兼团总向玉如等分任支队长；集合他们的力量开赴绵阳闹独立。这时各县的哥老大头目如安县的何鼎臣，什邡的李润生，金堂的李华山、李连州等都集合队伍前往绵阳参加，分任支队长或团长”。②张百祥统率各县参加的袍哥队伍，占据绵阳县城，成立西北军总司令部于县衙门内，自任总司令，通电讨袁伐胡。③但绵阳的讨袁军迅速被胡景伊所派的川军，从潼川到达绵阳围剿击败，“张百祥见大势已去，在城墙鸣土炮数响，即率兵慌忙逃出县城。到绵阳城

---

①《四川癸丑讨袁之役》，《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35 页。

②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79 至 80 页。

③濮实：《张百祥率师讨袁独立老绵州》，《编阳市文史资料选刊》第二辑，第 119 页。

北西山观时，见无追兵，遂徐徐向彰明、江油等县退去”。[①]广汉的张品三、张菊东逃走；张明之率队伍同何鼎臣退据安县，被追兵用炮轰垮楼房压死，其部下的哥老土匪，大多仍散归广汉，继续当匪抢人。[②]

著名的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王天杰，在荣县召集辛亥革命时的旧部约二千人参加讨袁战争，败后率残部八百人赴渝助战。行至永川，闻义师已败，周骏部已先入永川城，道路梗塞。既不能战，又不愿降，只身亡命，又对不起八百子弟兵，徘徊考虑很久，乃单骑往见周骏，意在要求所部收容资遣回籍，一切责任由他承担。周拒不见面，将王扣留，次晨杀害，陈尸广场数日。

其他著名的原同志军首领并未起来召集旧部。川西同志军袍哥队伍被收编为第二师，反而成了镇压反袁义军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第二师共十二团，大都是原保路同志军编成的，是胡景伊率领的主力。

到 9 月 12 日重庆失陷，四川“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讨袁军失败后，骨干或逃亡或被杀、自杀，大部被打散流落各地，只留下零散的武装，过着似匪非匪的抢劫生活。

毛泽东在论述会党时有句名言：“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③]民国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对袍哥的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是处置不了这一批人，也解决不了这个中国的困难问题。

---

①同上第 120 页。

②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80 页。

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9 页。

十、袍哥队伍的再起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他要以民国总统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当他当上了终身总统之后，还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站在大地主、大野心家的立场上，要求传子传孙，建立“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

袁世凯在四川先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后又任命陈宧（音夷）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取代胡景伊掌握四川军政大权，加强对西南的统治，以为采取这个步骤可以解除复辟帝制的后顾之忧。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四川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未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在这种情景下，被取缔和镇压的袍哥队伍又在各地活跃起来。1914 年出版的《四川政报》发出哀叹道：“伸张民气即长匪风，扩张民权即滋匪焰。官威不振，民不畏官，官困于绅，绅困于匪”。[①]这里所指的“匪”，是指袍哥队伍和散兵游勇，说明他们在各州县城乡已纷纷起来与官僚和地主作斗争，使得官僚和地主深感畏惧。

胡景伊镇压“二次革命”后，改编了川军，借口“彭光烈

①《四川政报》第二年第 8 期，1914 年 8 月 30 日。

部以通熊（克武）问题，全师解散，孙兆鸾师亦以态度暧昧被并编。遂改第四师番号为第二师，刘存厚为第二师长”。[①]川军此后仅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对胡景伊忠诚拥护，胡景伊也日益充实这两个师的装备，健全其组织，为后来川军的两大体系发展之基础。

胡景伊解散彭光烈第二师，并编孙兆鸾第三师，实际上是进一步镇压袍哥队伍的另一种方式。因为第二师大都是由原同志军袍哥队伍组成的，第三师中袍哥力量也强。这样，由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担任这二个师的团长孙泽沛、吴庆熙、张达三（尊)、胡重义（潭)、罗子舟等也被解职或退职。

与此同时，胡景伊还下令解散地方保安队（或保安营)，担任队长或营长的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也被解职或辞职。

无论是被解散的川军，或者是被解散的地方保安队，胡景伊都没有作安抚处置的善后工作，因此这一批人以后就集聚在各地为匪，日夜进行抢劫的活动，弄得四川各地很不安宁。

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中山以为讨袁，四川革命为急。三年秋，以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吕超为川南区司令，石青阳为川东区司令。师谛受命，并以范毅任上川南，丁泽煦任川西，刘国佐任川北”。[②]他们在各地活动，联络参加“二次革命”失败的士兵。在永川、荣昌的东、西山，合川、武胜附近的华蓥山聚集的一支队伍，就是由散兵组成的。他们没有粮饷，就动手抢劫，打家劫舍，过着似匪非匪的生活。

---

①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15 页。

②《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74 页。

熊克武等人参加了与孙中山有分歧的欧事研究会，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 1915 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才投入护国战争的活动。

1916 年 2 月，陈宧率领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祯、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等入川。陈宧升任后，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替袁世凯复辟帝制铺平道路。他对袍哥大爷、原同志军首领进一步压迫，使他们都栗栗自危，但是，这些袍哥首领由于参加过辛亥四川同志军武装起义，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因此反对袁世凯称帝，如孙泽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逐渐浸入他的脑中，他多少知道了一点‘民主共和’的道理。所以当反对袁世凯帝制的运动兴起时，他就积极参加了”。[①]对两个师的川军也图谋削弱，对第一师进行压缩编制，特派跟随来川的熊祥生插入第一师任旅长。[②]对第二师，特派跟随来川的雷飙插入任旅长。特别是派刘存厚师长为叙泸清乡司令，“率兵二团南行，余部留驻成都，不准移动。致使刘惴惴不安，心怀疑虑，对陈宧产生惧恨之心”。[③]因此，在护国战争中他在纳溪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是有缘由的。

陈宧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进行全川“大清乡”，妄图消灭“乱党”与“匪患”。1915 年冬，他将川军分派到川东、川南地区，跟随来川的北洋军派赴川西、川北和下川东水

①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16 页。

②刘石渠：《袁世凯在川爪牙周骏的覆灭》，《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65、67 页。

③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116 页。

道沿线地区，进行围剿屠杀群众。这样大规模兴师动众的“清乡”，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在“清乡”中杀害人民最多的地方，是华蓥山地区、永川、荣昌东、西山地区，双流、温江、崇庆间刘家濠地区。华蓥山位于合川、铜梁、大足、武胜、岳池、广安、邻水等几县交界的地方。清乡开始后，陈宧就派遣了大批川军，在合川、铜梁、大足、武胜这几县连结包围起来。在岳池、广安、邻水那一面，则另以北军冯玉祥旅担任。只要清乡队伍认为“形迹可疑”的，语言不合的，都拉去关起拷打，甚至有立即枪毙的。仅在华蓥山附近的草街子，烈面溪，正式杀害的就有四百多人。黑办的、饿死的、闭死在山谷里的，还难以计数。①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陈宧“大清乡”的血腥政策，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但人民的反袁斗争怒火并没有为陈宧的屠杀所扑灭，反而烧得更为炽烈。在护国战争爆发后，不但陈宧“清乡”政策破产，而且一些被剿者，都一起参加了起义倒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袍哥队伍再起。被解职的袍哥大爷又利用其势力，率领队伍，参加反对洪宪帝制的武装斗争。较有影响的有下列几支：

（1）是被迫害的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退职的团长吴庆熙、孙泽沛、胡重义、张达三、罗子舟等，在护国起义的号召下，各自在温江、崇庆、犍为、郫县、雅安等县，“啸聚徒众，揭举义旗，各自拥有数百或千余人不等，一致讨袁。”②

①张仲雷：《陈宧在四川的“大清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 80 页。

②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118 页。

吴庆熙、孙泽沛、张达三等在双流、温江、崇庆间刘家濠树起义旗，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

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起兵，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川西区司令丁泽煦到温江、崇庆、郫县等地活动，邀约吴庆熙、孙泽沛、张达三等人招集旧部反对洪宪帝制。他们在布经寺举行会议，密商了起义步骤。事后，为负责监视孙泽沛的崇庆县知事所洞知，孙不断遭到清乡的警备队和北洋军迫害。“川督陈宧派北洋军指挥黄树成带一营人来捕孙泽沛，把石观音场（孙住地）一带，大大骚扰一通，烧了孙的房子。人民对北洋军痛恨已极，不仅盼望孙、吴、丁、张（他们的告示上列衔次序）的队伍打胜仗，消灭北洋军，而且纷纷组织队伍，响应他们的号召”。①

1916 年 3 月初，他们在避居的刘家濠打出四川护国军的旗帜，吴庆熙任司令，孙泽沛任副司令。北洋军从双流、温江两路夹击，打了两天两夜，双方才各自后撤。他们的起义，虽然军事上处于相持形势，但对川西北其他袍哥的影响却很大。在他们的号召下，川西北袍哥队伍纷纷再起，参加反袁战争。

（2）是国民党人王蕴滋（靖澄）发动广汉、金堂、什邡、安岳、渔南袍哥队伍讨袁，在潼川（今三台）成立四川讨逆军总司令部。“1916 年护国之役，国民党人王蕴滋时任川军第六混成旅张成孝的连长，奉旅长钟道体的命令，同旅部参谋李挽澜到成都领运枪弹。王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事先托原同盟会员郑宇熙通过侯棠的介绍，与侯罈子（名永成，广汉袍哥土匪）联络，叫侯率队在预定的途中进行拦劫。侯罈子即率

①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17 页。

自己的全部匪徒连同巫人杰（外号巫鸡儿，广汉袍哥土匪）的部分匪徒约800人，在金堂赵家渡前方约50华里的风洞子潜伏，结果陈宧所派护送械弹的技术营全部在此被侯骈子缴械，虏获了运送钟旅的步枪500支，子弹50万发。风洞子袭击胜利后，侯骈子、巫人杰率队随王蕴滋到三台，打出四川讨袁（逆）军总司令的旗号，王任总司令，委侯任先遣支队长（同旅长），巫任别动第一支队长。还有其他县份的著名哥老匪头如什邡的张升廷，安岳的李布客，渔南的段老和尚等，也都是王委的别动支队长”。①后王蕴滋归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领导。后来第八旅旅长周炯伯，十三团汤有光，十四团刘主青，十五团罗象昭，十六团张尊（达三），游击司令任子昂。其余孙泽沛、丁泽煦、吴庆熙诸部皆属焉”。②

（3）是在华蓥山活动的郑启和率众独立于广安，成立川北护国军司令部。郑启和，广安县代市镇人，其祖父、父亲都是袍哥，1911年考入广安州团练传习所作学员，辛亥革命中参加同盟会，入蜀北军政府任小队长。清末广安“汉流”袍哥盛行，“孝义会”称“西流”袍哥在广安也有组织。“汉流”与“西流”都竞相发展，形成对立，斗争激烈。郑启和原为“汉流”袍哥继又参加“西流”袍哥。1912年，“汉流”袍哥首领要郑启和杀“西流”袍哥首领，如不执行，即要杀他。当时郑暗中点水，“西流”首领被杀害。“西流”袍哥知道后，认为郑出卖拜兄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即派人捉捕他。郑走投无路的时候，遂投奔华蓥山土匪头子谢华生为匪。1915年广安县知事出

---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1至82页。

②《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76页。

动大量军队围剿，谢华生被捕杀后，这支土匪队伍由郑启和统率，离开广安，占领营山县东北各乡。冯玉祥在营山“大清乡”，郑又统率队伍到广安、邻水山区活动。

郑启和统率土匪队伍，很有帮规，不许调戏良家妇女。当时流行这样的话：“早晨起来抹面子（洗脸），抹了面子造粉子（吃饭），造了粉子牵线子（走路出动）到了人家不许弄花猫子（调戏妇女）”，所以人称郑启和为“文匪”。①冯玉祥当时“大清乡”残杀营山人民，围剿郑启和队伍，但承认“这一带土匪很讲匪规，组织也相当严密。……他们身为土匪，尚且这样讲纪律，绑了人家妇女，犯了教条，就义所不容地出而惩讨，……并不文饰自己，这比官好”。②

在护国战争爆发后，熊克武随蔡锷入川，发动各地响应，此时，郑启和正活跃于邻水、广安山区。邻水县知事慑于郑启和的威胁，甚为恐惧，乞援于广安县知事派兵联合镇压，广安县知事派团练局长潭诗领兵往援。郑启和在护国讨袁的形势影响下，即派人与潭诗联系，得到潭诗同意响应护国讨袁。郑启和与潭诗联合攻占了邻水县城，撵走了袁世凯政权的县知事，举起了讨袁旗帜，并结集兵力攻占了广安县城，宣布独立，称川北护国军，郑启和为司令，潭诗为副司令。

（4）是石青阳发动酉（阳）、秀（山）、永川、荣昌的袍哥和散兵队伍，成立川东区总司令部。石青阳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川东区总司令后，即在川东地区活动，在永川荣昌东西山隐蔽的队伍中进行工作。袁世凯称帝后，石青阳入酉阳、秀山组织讨袁队伍。“入酉阳时，李善波与酉阳王子

①《郑启和传》稿本，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

②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02—203页。

履、王子骝方起义龚滩，号复兴中华革命军。初，北军一营，由鄂至者，极精锐，子履等奋勇击之，北军不支，遂克酉阳及秀山等县。青阳至，善波因属焉”。[①]同时，在永川、荣昌东、西山活动的汤子模部，也起义讨袁。汤子模是袍哥大爷，四川袍哥中的出色人物。[②]他利用袍哥势力，组织武装队伍。护国战争爆发后，汤子模率部响应护国反袁，与石青阳取得联系后，石将汤子模部编为川东中华革命军第一支队，汤任支队长。后石青阳“复集汤子模部，并收编唐鹏程各部数千人，出黔江、石柱、涪陵，以逼重庆”[③]。

（5）是中华革命党员刘明昭（伯承）、康云程、李越生从上海回到四川，在川东组织起义，以王伯常领导负责任。“船抵奉节，刘、康登岸，运动哥老张春林起义，张允诺。刘、康又赴万县，运动哥老陈大爷（忘其名），陈允许。刘、康又赴涪陵新庙场，运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杨拥有俄式枪120支，亦慨然承认，班长李次舟尤为激昂。同时，又获得当地士绅李次安、李实帆、王贡三、冈泽孚等的协助。又有张子昭者，拥有人枪数十，自称义勇军，亦来大顺场集合。大顺场、新庙场相距十余里，于是在新庙场就地起义，称为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以王伯常任支队长，刘伯承负指挥军事责任，康云程负联络责任。官方传言，‘匪军’在万人左右。风声所播，东川震惊，人心归向致使北洋逆军不敢越出各县一步”。[④]后

①《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82页。

②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第241页。

③《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82页。

④康云程：《护国战役中川东起义，刘伯承元帅光荣失去右眼换取革命胜利》，《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72页。

刘伯承率队攻长寿，与敌激战两小时。接着，进攻丰都城，激战三小时，刘亲临指挥，是役夺获逆军快枪 600 余支。“刘于进攻城门时，遭右侧面射击，负重伤。弹从右太阳穴入，右眼珠已被击出，血流不止，疼痛至不可忍。激战中，暂息邮局内，既决定退却，乃用箩筐抬走”，后匿农民家月余，体力稍复，由康护送，潜赴重庆就医。[①]刘伯承留渝治眼时，康受刘指导，即复返下东，在长寿拖得十余支枪，到开江红市铺集合，隶王伯常护国军第四支队麾下，合颜德基军，由肖德明指挥，攻下梁、万、两开（开县、开江），及下东各县。

（6）是肖德明在大竹宣布独立，公推为护国军总司令。“五年春，护国军起，滇军入蜀，德明返大竹，遂宣布独立，有众万余人。时曹锟在渝，势方张。川南虽有滇军，不易夺敌军川东、川北之势。德明于是分其所部为六支队：一支队颜德基，取道梁山攻万县，以绝北军之源，二支队郭少华，攻开江、宣汉、城口、万源，以杀川军之势；三支队江筱臣，攻忠县；四支队王维纲，攻丰都，北军之水道交通阻矣；五支队熊湘，于邻水、垫江之间，以侧击之；六支队张春霖，攻开县，以牵制之。故尔控驭川东北，与钟体道战于渠县，会有潼川之逼，体道亦不得不宣布独立乃罢”。[②]

此外，后来成为四川袍哥队伍中的著名人物范绍增，当时也带了兄弟伙参加护国战争。范绍增，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从小喜欢赌博，从不读书，还学江胡豪杰，聚众闹事。他的祖父认为败坏了家风，是个不肖子孙，在气愤中将他抓来活埋，

①康云程：《护国战役中川东起义，刘伯承元帅光荣失去右眼换取革命胜利》，《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 73 页。

②《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80 页。

后被伯父救出，堂嫂资助他逃走。他逃到达县百灵口投同盟会员、袍哥张作林，被收留当小兄弟，十三岁即参加了袍哥组织。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四川都督胡景伊在全川搜捕革命党人。张作林为避锋芒，将兄弟伙暂时遣散，范绍增回到大竹，召集少年朋友为伍，四出抢切富户，并购买武器，成立队伍。1915 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张作林召回范绍增等参加反袁战争。“张大爷编为支队长，我当排长”。①

（7）是灌县（今都江堰市）袍哥首领申介屏、宋辅卿等与革命党人杨维在灌县独立。申介屏、宋辅卿与刁青云是灌县著名的袍哥，黑社会称之为灌县“三杰”。“刁青云操袍哥三排时，便引荐申介屏为华西公社管事，当同志军兴起，便偕刁等一同参加，为推翻清廷攻打成都而效命。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又梦想当皇帝，激起了全国的反袁怒潮，这时年轻的申介屏毅然投入讨袁护国之役”。②“宋辅卿，绰号宋空子，出身土匪世家，在青年时即拖棚子搞抢劫。辛亥革命时期，同志会到处兴起，袍哥盛行，这时宋辅卿被刁青云拉入灌县同志会，并参加了灌县袍哥组织。刁青云当管事时，宋辅卿是刁的帮办管事。讨袁护国之役，他投身于反袁战争”。③“杨维者，民国初年，曾任四川省会警察总监，颇有声。护国军兴，维与杨兆蓉、黄仲宣、张致祥等在成都谋起义，陈宧防之严，不果。乃阴与宋辅卿、白润之、周星五谋，先取灌县。时维在

①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84 辑，第 244 页。

②曾成志、戴文鼎：《袍哥议长申介屏》稿本，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

③曾成志、戴文鼎：《土匪起家的司令官宋辅卿》稿本，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

北署袜街，宦先有密令城守，禁维出城，维宅比邻邮局，遂以邮役衣装出，人弗觉也。次日，率队攻灌县，县知事杨宙平方出城迎战，而内已响应，径入城，建招讨军司令部于水利厅，委宋辅卿、白润之、周星五为团长，布告民众，将练兵筹饷，准备进攻。时云南义军已攻克叙、泸，两广及长江各省，已先后独立。宦以为袁氏败殂，己身孤立，虽与党人委蛇，党人未必戴之，固当去，名城大都，不能弃之而遁也，因函催维到省图善后。维归，委为第一师师长，收集川军之败退散亡者。于是，设招讨军部于古天府，并设第一师师部于东门外兵工厂”。①当时成都袍哥队伍也兴起，各地护国军招兵买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扩充实力。“一时成都市面上到处插起什么××游击司令部、××支队部、××纵队司令部旗子。街头巷尾，烟馆赌场，三五成群的人穿去穿来”。②

（8）是熊克武、吕超在川南收编袍哥土匪队伍，配合蔡锷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等地作战。“吕超既以中华革命军川南区司令号召民军，三日内即获水警及干柏树、蕨溪镇团练军械，于蕨溪编制成军，侧击敌军。滇军得宜宾，熊克武时在滇军中，虽未有兵，传闻有兵若干，超与师谛皆其旧部，阴相与谋，以超部属之，安众心也。克武既得超军，义军又多归之，遂为护国军四川招讨使，以卢师谛为参谋长，郭昌明为副官长；李郁生为秘书长；井勿幕、彭远跃、何大衡、刘积，李心怡、向传义、邹有章、刘光烈为参谋；余际唐为军需处长兼参谋长；吴世钧为筹饷处长；周官和为第一支队长；吕超为第二支队长。超以彭远耀、余痴虎赞军幕。二月，川军朱登五、张

---

①《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78－79页。

②善成：《我的土匪罪恶生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14页。

占鸿由犍为、屏山分道攻宜宾，其一部沿江而下，超拒之于牛喜场之西北，超部皆其土人，熟习形势，乃分兵伏山谷，敌军已过牛喜场，与滇军战于麻糖坝，始于两岸夹击，大破之，获其船舶辎重。未几，冯玉祥率一旅及伍祥祯余部攻宗场、光斗山、催科山。超援光斗山，战数日，以滇军援泸，兵少，不能守叙府，克武乃令超收叙南。于是，超部集横江。三月，攻筠连，克之，叙南六县向风景附。遂由庆符、高县、长宁以达南溪之牟家坪，渡江进窥观音铺”。[①]后熊克武得到蔡锷下的总攻令，进窥富顺，由向传义往督战。向传义复与但懋辛进窥荣县，以三百人击溃混成旅陈洪范八营于文峰场。吕超入富顺，进驻自流井、贡井。6 月，传袁世凯已死，士气大振。

在这过程中，郑经武（英）在隆昌组织了五、六百袍哥土匪队伍，出任民军司令，配合熊克武、但懋辛、吕超攻占隆昌，击溃川军第一师周骏阻兵，于是滇军及熊克武军遂向内江、资中、简阳、仁寿进军，所向无敌。周骏既溃，冯玉祥所部消遁，陈宧弃成都北去，蔡锷奉命督川，遂入成都。

在革命党人的发动下，袍哥队伍在各地再起，参加武装斗争，为四川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配合蔡锷在川南交战，促进了刘存厚倒戈反袁和钟体道通电独立，到 5 月逼迫袁世凯亲信爪牙陈宧正式宣布四川独立。至此，袁世凯彻底孤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从此病倒在床，6 月 6 日结束了丑恶的一生。

① 《四川护国之役纪实》，《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76 页。

十一、袍哥的滑坡

袁世凯死后，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护国战争就不了了之而结束。人民付出了无数的鲜血、生命和财产，却并未丝毫改善自己的处境。

四川的护国战争，对摧毁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也使参加护国战争的军事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人增强了政治和军事力量，按捺不住他们的野心，想利用护国的声威，在四川建立新的独裁统治，逐渐变成了四川军阀。

刘存厚已从护国战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参谋长林爽、汪可权。第三旅旅长舒云衢，五团邓锡侯，六团廖谦。第四旅旅长陈洪范，七团万成，八团黄泽溥。炮兵赖心辉，骑兵团田颂尧，工兵营龚襄，辎重营陈国栋。直属混成旅刘成勋（驻新津），一团曹文龙，二团袁昌晙（雩风，开县人，保定生，原任二师营长）。四旅陈洪范（驻乐山、眉山）。三旅舒云衢（驻成都外北凤凰山）。骑、炮、工、辎各部驻成都城内西北两较场。共一万三千余人，械弹充足。”[①]其中邓锡侯、陈

①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122 页。

洪范、赖心辉、田颂尧、陈国栋、刘成勋以后和刘存厚一道，都成为四川的第一流军阀。

熊克武也从护国战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16年9月率招讨军回到川东，进入重庆，宣布就任四川陆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职。“第五师参谋长傅常（国民党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镇署参谋长李郁生（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日本东斌学校〔学生〕），师副官长张冲（国民党员，日本海军学校〔学生〕），镇署副官长朱华经（国民党员，日本海军学校〔学生〕），军法处长童显汉（国民党员，日本留学生），军需处长吴秉钧（国民党员，日本海军学校〔学生〕），军械处长喻培棣（国民党员，日本东斌学校〔学生〕）。”①熊克武还对川东“民军”全部编遣，把三万余的民军，编入第五师的只有两营人。原有招讨军共编了八营，连同编入“民军”两营，共十营。

“第九旅长但懋辛。

第十旅长（缺）

第十七团团长向传义（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实业团成员，保定军官学校〔学生〕）配兵力两营。

第十八团团长吕超（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实业团成员，保定军官学校〔学生〕）配兵力三营。

第十九团团长喻培棣（国民党员，日本东斌学校〔学生〕）配兵力三营。

第二十团团长王维纲（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实业团成员，保定军官学校〔学生〕）配兵力两营。

①李乐伦：《护国之役后四川的动乱局面》，《四川军阀史资料》第一辑，第93页。

喻培棣调任团长后，师军械事务初用梁绪代管，后调升刘棱为军械处长”。[①]

其中但懋辛、向传义、傅常、吕超以后也和熊克武一道，成为四川军阀。

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到成都后，因喉结核病势严重，但仍带病处理军政事务，并提前召开军政会议，对复员善后工作及全省人事作了妥善安排。他对四川各军，包括在川的滇、黔军，编制和驻戍地区规定如下：以周道刚继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刘湘为第一旅旅长，王奇昌为第二旅旅长，招安的袍哥土匪魏虎臣、任俊杰为游击支队大队长，移驻合川。刘存厚升任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驻戍成都。钟体道任第三师师长，龙光任五旅旅长，陈经为六旅旅长，驻戍川西北。陈泽霈任第四师师长，由陈泽霈、卢师谛率领的护国起义军胡重义、吴庆熙、张尊（达三）、丁泽煦、郑英等袍哥队伍改编而成，驻戍川西。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兼任重庆镇守使，驻扎重庆。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梯团，改编为滇军第一、第二两师，后又分别改为四川陆军第六、第七师，驻扎上下川南及川东一带。入川黔军驻扎渝、万等地。杨维就任警察厅长。蔡锷病势日益严重，于 8 月 9 日离开成都东去，赴日本就医，结果一去不返，死于日本。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后又任命戴戡会办四川军务。罗、戴疯狂贯彻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四川的军阀割据政策，遭到川系军阀的反抗。原来在护国旗帜下的滇、黔、川三省军事首脑开始互相争夺、互相残杀，1917 年发生了罗佩金与刘存厚、戴戡与刘存厚的所谓“刘

①李乐伦：《护国之役后四川的动乱局面》，《四川军阀史资料》第一辑，第 94 页。

罗”、“刘戴”两次在四川的混战，这就成了西南军事将领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

与四川军事将领堕落为封建军阀同步而行的，是四川袍哥也开始向下滑坡。护国战争以后，由袍哥首领率领的几支护国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有的被军阀利用，编入军阀部队，袍哥首领当上军官，或者当了军官又当土匪，当了土匪又再当军官。如“调胡重义为督署咨议，吴庆熙为理懋垦务总办，张尊为松茂垦务总办，解除袍哥武装”。①“罗佩金继蔡锷任四川督军，改编各路护国军，孙泽沛和宿靖南都被委任团长，孙泽沛的队伍驻扎灌县城”。②后刘存厚联合川军五师长联名发出控诉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的通电。“罗佩金恨陈泽霈背己，列名通电，派向海青（湘籍，滇军战将）旅驰赴绵阳、安县等地，将四师大部包围缴械，勒令解散。(1917 年）四月十三日，将师长陈泽霈扣留，并集合四师留驻省城部队于督署广场，将其全部缴械。刘存厚深感祸将及己，遂把四师被裁士兵收容起来，以充实自己的实力”。③后来陈泽霈参加“刘罗”之战，吴庆熙、张尊等袍哥武装参加了这场军阀混战。只有孙泽霈“不愿参加，又缺乏准备，就被刘存厚的队伍缴了械。孙泽霈第二次退职回石观音，后病死在家中”。④灌县的

①吴光骏：《刘存厚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120 页。

②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17 页。

③吴光骏：《刘存厚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125 页。

④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217 页。

申介屏，“在川军刘存厚第二师五团（邓锡侯团长）任连长”，为刘存厚的军阀混战效劳。①宋辅卿护国战争后由团长逐步升到旅长，在军阀混战中被击败，“旅长垮台，回到灌县当了团练局局长”，继续坐地分赃当土匪。②

（2）有的被军阀围剿，杀死首领，但随即又产生一批一批继承者，发展土匪势力。“护国战役结束后，王蕴滋取消讨袁军总司令旗号，令巫（人杰）、侯（永成）、张（升廷）等各率所部匪徒回川西一带占据地盘。巫人杰遂率队占领绵竹，委官收税，形同割据。侯跞子与巫一伙，亦率队驻绵竹城外。数月后，川督罗佩金因巫、侯两部拒绝移地改编，派滇军24团团长李直生率部攻打绵竹，巫人杰被击毙。侯跞子率队退逃广汉，在滇军尾追中亦被击毙。……广汉匪头在侯、巫被击毙后，就又产生了一批一批的继承者。他们在军阀的扶植下，都由匪头而当上军官，或者是当了军官又当匪，当了匪又再当军官。虽然他们有的在成军以后，人枪被军阀吃了；他们在当匪时间，也曾吃过军队；但土匪与军队之间，并无根本矛盾，他们一面互相吞噬，一面又互相补充。吃甲补乙，或先吃甲而后又补甲，都无人感到奇怪。在这种军匪不分，今天是匪，明天是军，后天又是匪的环境下，广汉土匪势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③

（3）有的带领队伍在一县或几县割据，占山为王。川北护国军司令郑启和和副司令谭诗率领的护国军，护国战争结束，熊克武在川东收编时，郑启和与谭诗和发生矛盾，谭诗离开

---

①曾成志等《袍哥议长申介屏》稿本。

②曾成志等：《土匪起家的司令官宋辅卿》稿本。

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2、83、84页。

广安前往顺庆联合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进逼，郑启和退出广安，’继续在华蓥山山区割据。1917 年，郑启和率部到潼川投靠熊克武所属的靖国军第七师师长颜德基，被委派为纵队长，带兵进攻成都，战败退至苍溪、巴中一带，在巴中驻防达四年之久。①张作林、范绍增的反袁队伍，熊克武改编民军时，将张作林杀害，部队遣散。张部拥范绍增为首领，纠集袍哥兄弟伙二、三百人，占领达县、渠县、大竹交界处，就地筹款，扩充势力，占山为王。“其筹款办法如下：1. 收货物税。对往来船只，按其所载货物多少、贵贱不同抽税，保障船货安全；2. 摆赌场；3. 包绅粮收租子。那时绅粮都逃到城里，不敢回家收租，我派人同他们商议，包他们收租，抽五分之一的包收费；4. “抢人”。不到两、三年，扩充到七、八百人和四、五百支枪。②

总之，护国战争是四川袍哥向下滑坡的转折点。四川一个大袍哥回忆袍哥变质的过程，是以护国战争前后为界标的。他说：“民国五年，护国之时，袁逆世凯称帝，各县袍哥纷纷组织‘护国军’，如石青阳、颜德基、吴庆熙、孙泽沛、张达三等人成为首领，将北洋军阀陈尔庵（宧）、冯焕章（玉祥）、伍祥祯、曹锟、张敬尧等驱逐出川”。又说：“民国五年以后，军阀割据四川，各县袍哥即依附军阀，由此逐渐地变质，渐次地把袍哥们变成土豪、劣绅、恶霸、土匪、霸占乡镇，欺压人民，擅杀无辜，军阀官吏参加袍哥组织相依为命，上下其手，从事害人杀人的罪恶。……在十几年军阀残酷的割据时期中，

①《郑启和传》稿本。

②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84 辑，第 244—245 页。

善良的人民都饱受着变了质的袍哥们的迫害，从此袍哥也就失掉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本质。”[1]这种意见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1]《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年印。

十二、袍哥渗入军队

护国战争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夕，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之中。四川军阀防区割据，是地方军阀中具有特点的现象之一。所谓防区割据，即“防区制”，就是军阀凭借武装，霸占一定的地盘，在割据地区掌管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形成军阀、官僚、地主的统治，他们在防区内建立起自己的政府——政务委员会或政务处，擅自任命官吏，发布政令；设有独立的警察和司法机关，任意关押和处理群众；军阀还自行加捐加税，预征田赋，发行货币，建立造币厂，开设银行和钱庄，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他们随意停办学校、文化机关，查封报刊，钳制言论。防区成了四川独立王国中的小国，军阀则成为防区内主宰一切，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并且他们的排外性很强，对外省军队来川进行抵制，常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来联络四川军阀，共同排斥外省军队，如对滇黔军，对北洋军，以及后来对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如此。①

四川军阀在形成防区割据后，拥兵称雄，以家族、同乡、部属、同学等，结成各派系。有的军阀同时跨几个派系。主要有：以刘存厚为首的武备系，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以刘文

①王斌：《四川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2 页。

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以李家钰、罗泽州为首的军官系，以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一军系和以刘湘、杨森为首的二军系等。他们在结派系时打着各种招牌，但实质上都是封建的武装政治集团，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扩充实力而结合的。尽管他们表面上请吃请喝，打牌送礼，互结姻亲，但暗地里勾心斗角，互相提防，一旦发生利害冲突，便兵戎相见。

从 1917 年刘存厚与罗佩金、刘存厚与戴戡之战开始，到 1933 年刘湘、刘文辉大战结束，军阀之间的大小战争有四百多次，其中大的战争有:

（1）1917 年刘存厚与罗佩金、刘存厚与戴戡争夺四川军政大权的战争，罗佩金战败，戴戡自戕。

（2）1918 年滇、川、黔三省靖国联军讨伐刘存厚的战争，刘存厚败退至陕南。

（3）1920 年熊克武联合川军逐滇、黔军的战争，滇黔军败退回云南、贵州。

（4）1922 年熊克武、但懋辛一军系与刘湘、杨森二军系的“一、二军之战”，二军系战败，刘湘护送回原籍，杨森逃至湖北宜昌投靠吴佩孚。

（5）1923－1924 年熊克武、但懋辛与杨森、刘湘进行“讨贼”战争，“讨贼军”战败，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吕超等被驱逐出四川。

（6）1925 年杨森发动兼并各军的“统一之战”，杨森战败，乘轮东下汉口，再次投靠吴佩孚。次年杨森回川收集旧部，被刘湘拉拢，共同进攻驻重庆的袁祖铭黔军，将其驱逐回贵州。

（7）1928－1929 年刘湘、刘文辉与杨森、罗泽洲、李家

钰、赖心辉的下川东之战和上川东之战，杨森战败，下川东地盘为刘湘占据，罗泽洲、李家钰战败，上川东地盘为刘文辉占据，赖心辉战败，退到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已无地盘。

（8）1932－1933 年刘湘与刘文辉的“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西康。

二刘大战结束，也是四川军阀混战结束。随后是国民党蒋介石势力伸入四川。

四川军阀混战的特征之一，是军队愈打愈多。刘文辉回忆说：“我懂得武力是扩大个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资本，故升至旅长时即开始扩军。而扩军又是和内战联系在一起的，每打一次内战就要扩编一次队伍”。①

民国初年，四川军队不过五个师，周骏为第一师师长，彭光烈为第二师师长，孙兆鸾为第三师师长，刘存厚为第四师师长，熊克武为第五师师长。②1918 年四川督军熊克武召开全川整军会议，川军扩编成八个师又两个旅，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刘湘为第二师师长，向传义为第三师师长，刘成勋为第四师师长，吕超为第五师师长，石青阳为第六师师长，颜德基为第七师师长，陈洪范为第八师师长，二个旅长是黄复生、卢师谛。此外，还有在陕南的刘存厚师。③1920 年川滇黔大战后，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对川军整编，川军扩编成三个军十二个师，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十二个师的师长是：喻培棣、唐式遵、邓锡侯、田颂尧、潘文华、唐廷牧、何光烈、余际唐、陈国栋、陈

①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第 5 页。

②《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军政演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 32 页。

③吴光骏：《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形成》，《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

洪范、刘斌、杨森（兼）。[①]到 1926 年北伐战争期中川军易帜时，全川军队共有八个军，三十个师，三十三个混成旅。[②]总计川军约二十多万。[③]八个军长是二十军军长杨森、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以及“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在“二刘大战”前夕，“川中现役军额已达三十万以上，在全国中为军队最多的省份。[④]

军阀防区割据，连年混战，在防区内扩充部队，使得袍哥也从多方面渗入军队中。

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改编川军的过程中，由袍哥队伍组成的同志军渗入军队，开了民国时期袍哥、军人相互勾结利用之先河。在川军五个师中，第二师是收编袍哥队伍组成的。“同志军约有十多个部队均编入第二师，归彭光烈指挥，原有同志军的首领都改了旅团营长等名义”。[⑤]这支军队“官兵皆哥老会中人”。[⑥]开始，这些袍哥首领没有军务知识，职务也弄不清楚。记载说：“关于改编孙泽沛同志军的事，流传过一个笑话。据说军政府震惊于孙统领的好名声和人马众多（许多人估计有三四万人）初拟将他的军队缩编为一个协（旅），委他任协统（旅长），参谋部派人和他洽商。他问：‘协统带多少匹粮子’？（旧军队的一个基层编制单位，一般叫一匹粮子，

①黄应乾：《一九二二年四川一二军之战》，《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②《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409—410 页。

③王斌：《四川现代史》，第 93 页。

④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第 824 页。

⑤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 140 页。

⑥杨少荃：《四川革命小史》，《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23 页。

即吃粮的意思）他了解要管辖几个标时，连声说：‘不干，不干！我管不到那样多人。标把人还差不多’。后来果然委他为川军第二师（镇）一个标统（团长），他表示非常满意。在凤凰山成军的那天，都督府给他送标统关防来，并按编制表发表军官和军佐名单，全标官兵都赏一个‘沛’字银牌。①其他袍哥首领吴庆熙、张达三、侯国治等人也接受分任标统（团长）职务，张捷先任第二师参谋长。②后来彭光烈也把胡潭所统率的犍为袍哥队伍“改编为一标（一团），以胡潭为标统（团长）。胡大爷做了军官，才改名胡重义”。③罗子舟所率的队伍，曾到成都，“罗八千岁（子舟）先已归省受职，还驻嘉”。④除第二师，其他各师都有袍哥渗入。第一师长周骏就是“大陆公”的舵把子。第三师渗入袍哥较多，内有袍哥公口。⑤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系同盟会会员，当初为了革命，曾在川南参加袍哥，第五师官兵大多由起义的袍哥队伍改编而成”。“第五师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袍哥，班长、士兵中袍哥更多，甚至部队内也有袍哥组织”。⑥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除扩编川军五个师，袍哥队伍一部分渗入军队外，还将大部分编为地方保安队。成都四川军政府成立，同志军纷纷进入成都，要求收编。于是，军政府“谕截同

---

①陈师雄：《记崇庆一支同志军的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14至215页。

②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223页。

③宁芷邨：《犍为同志军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56至257页。

④秦枬：《蜀辛》，《四川辛亥史料》上册，第559页。

⑤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10页。

⑥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第141页。

志军进省，已至者量为资给遣回，由地方官编作保安义勇队，此专为成、嘉、邛、雅同志会未得编列省军而设，余不得援以为例者也”。[①]其实此例一开，各地纷纷效尤，袍哥队伍大部编为地方团队。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地州县响应参加同志军的袍哥队伍，又渗入地方保安队。有的保安队参加维持州县治安，有的反而把州县弄得乌烟瘴气，开始军匪互相勾结利用。如广汉，记载说：“成都独立了，赵尔丰交出政权，参加包围成都的各路同志‘大王’，都由革命的都督府委以军职。于是广汉袍哥又眼红了，深悔当时不该打死侯橘园，应该到成都参加革命。幸而不久尹昌衡继任四川都督。他想利用袍哥势力作为自己政权的支柱，除在成都成立‘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外，还通令各县哥老头子，率领兄弟伙到成都点验成军。这时广汉向阳场的大袍哥张明之、邓永文两人就统率了几百个队伍，人人带红花，缠套头，腰悬各式刀剑，携带明火枪、马炮等等，扬威耀武地开到成都成军。尹都督把张、邓二人委为广安县保安营的正副营长，叫他们回县，维持广汉的治安”。“张、邓回县后，营部驻扎城内考棚。他们统率的兄弟伙，除少数流氓痞子外，原本多是青年农民，这时就脱离了生产，失去农民本色。他们住在县城东街的韦驮堂、北街的广东馆、西街的火神庙等处，摆设牌九和大宝赌场，日夜聚赌，包庇烟馆，在县城的带头下，乡场的袍哥也公开摆赌场、开烟馆，与城内看齐。每逢赶场日期，集队你来我往、都是各带刀矛枪支，赌博酗酒，把全县搞得乌烟瘴气。张明之、邓永文的保安营，是由县官拨给粮饷的。但他们纠集的哥老人数越来越多，粮饷渐感不够。于是就自动去挑绅粮（地主）的谷子。大

---

①秦枬：《蜀辛》，《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52页。

绅粮的谷子不敢担，中小绅粮乃至只有自己口粮的农民，谷子都被他们强迫担走。后来张、邓二营长在城绅（地主）和县官的要求下，下令禁止担谷子，于是就干脆动手抢劫，打家劫舍。广汉全县，开始成为匪世界了”。①

护国战争中，熊克武在川南、川东收编袍哥队伍，组成招讨军。后该部改编仍为川军第五师，熊克武任师长兼重庆镇守使。新编的第五师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袍哥，班长、士兵中袍哥更多，部队内也有袍哥组织。重庆著名的袍哥唐绍武曾在该师九旅十八团卢师谛团二营八连二排当兵，全团军官都是袍哥。唐绍武原来在袍哥内嗨九牌，后在部队袍哥组织内提升为行六。②

熊克武做了四川督军后，第五师系统扩编为川军第一军，其中第六师余际唐部系由全川江防军改编而成。江防军四个区司令杨春芳、陈兰亭、范吉祥、刘鹏程，都是川东袍哥队伍，后编为第六师的四个团。第一军第八混成旅郑英部和独立师周燮卿部，亦系袍哥队伍。

第一军系统的师长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都是在护国、靖国各役，收编袍哥队伍成军，由袍哥队伍起家的。

经过多年内战，熊克武的第一军中的袍哥队伍，先后被刘湘、杨森、刘成勋所吞并。

川军刘湘、杨森第二军系统、刘成勋第三军系统及其他川军部队，也有很多师、旅是袍哥队伍。杨森部有杨春芳、范绍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78—79 页。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增、乔得寿、曾子唯等师。刘成勋部有何鼎、郑慕周等旅。此外邓锡侯部有魏甫臣师、邓国璋、龚渭清旅。刘文辉部有覃筱楼、羊仁安、石肇武、邹善成等旅。赖心辉部有张升廷、马昆山等旅。后来归入刘湘部的有范绍增、陈兰亭、穆瀛洲、包平章等师旅。刘存厚部有申介屏、王光宗、张熙民、吴建臣等旅。其余各部内，还有不少袍哥组成游击军、江防军、边防军，袍哥大爷任司令、旅长，难以枚举。

总之，在四川军阀割据与纷争时期，袍哥在军阀部队中渗入的情况发展了。此一时期，川军部队人数最多时达三十多万，而其中袍哥队伍就占五分之一。[①]据 1949 年调查，川军总数中，参加袍哥的占百分之六十。[②]个别军所占比例更大。如邓锡侯部九十五军的记载，“袍哥则公开在全军合法存在，仅军直及一二六师袍哥成分约占百分之九十，六七三团五连 114 人中袍哥有 90 人，全军七个团长，袍哥大爷即有六人。在全军占统治地位的袍哥势力、袍哥组织成为统治部队的有力工具。”[③]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③斐田夫：《对九十五军的改造工作》，稿本。

十三、袍哥队伍的特点

袍哥招安成军，是四川军阀割据混战时期的产物。各派军阀都借助袍哥关系招募游民当兵，落草抢劫的袍哥受招安时，则依其人枪多少，大则司令，小则队长。打仗时更是不择手段，吸收“边棚”（小股土匪）发展队伍。这样，利用袍哥扩充军队，已成为四川军阀壮大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军阀之所以看中袍哥队伍，是因为他们有如下特点：

第一、袍哥队伍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特性，这一批人很能勇敢作战，打仗不怕死，能一鼓作气的打拼命仗。如范绍增部，据杨森说：“他的部队全部袍哥化，不分阶级，一概兄弟相称，打起仗来到骁勇得很”。[①]军阀混战时，多利用袍哥队伍担任临时冲锋的敢死队，或担任抄袭侧背的别动队。在一、二军泸州之战中，范绍增部渡河出击，自断浮桥，拼死冲锋，将数倍于己之敌击溃，范被杨森擢升为其部第九混成旅旅长，颇受器重。其他袍哥队伍，如邓国璋、龚渭清部，“随邓锡侯军转战四川，以善战著称”。[②]

第二、容易扩充兵源枪械。袍哥队伍是军阀的补给来源，

①杨森：《滇风蜀雨》，（台）传记精华，第 183 页。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军阀部队急需扩编时，利用袍哥收编地方零散股匪，很快可以壮大势力。如荣昌是有名的“匪县”，1917 年熊克武部有三个招抚司令：黄汉溪、郑经武、陈超骧在隆昌招安土匪成军。这三位司令在隆昌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动以名利，诱以官职，土匪终于接受招安。黄汉溪招安土匪黄宝书，委为团长，约有七八百人，还招安了彭耀武、蔡北平数百人，开往重庆交由黄复生改编。郑经武招安土匪王全之，亦委为团长，约有五六百人，开往顺庆交由石青阳改编，陈超骧则招得土匪谢荣章、曹占云等约四五百人，开往成都交由但懋辛所属邹有章改编。[①]这种较之自己招兵买马购枪炮，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而且很快就能投入战斗。

第三，袍哥队伍是以兄弟结义形式组成的，有帮规帮约，对舵把子要绝对服从，因而在作战失利或被改编遣散以后，也容易再集中，并且可以找当地袍哥支持重拉队伍。范绍增就是这样几起几落。他先在达县、大竹交界处占山为王，后被颜德基收编任营长，1918 年靖国之役，因作战勇敢，升团长。他驻夔府，被滇军黎天才、王天纵两部突袭包围缴械。范绍增藏于天花板上数日，因黎部副官邢洪猷与他交好，设法掩护其化装逃出。他至云阳，得到袍哥大力支持，出名片通知邻近码头，募集股匪人枪两千余，进行反攻。恰值川军第二混成旅进攻夔府，范部乘机夹攻，卒将黎、王等部客军驱逐出川，范部开回绥定、宣汉等地驻防。1920 年，颜德基部参加滇、黔军的“倒熊”之战失败，范绍增在云阳被熊军第六师向康衢旅收编，范任团长。向康衢宰割袍哥队伍，范团被改编去职。范遂收集流散弟兄数百人，拖至万县，吸收绿林参加。向康衢派人抓他，他得到消息，早有防范，才免遭杀害。1921 年，范绍增率弟兄

①吴荫秋：《1917 年隆昌兵匪交织惨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

伙乘夜夺了四百枝步枪、七挺轻机枪，到酉阳、秀山石青阳部防地暂驻。后向袍哥师长魏甫臣“拿言语”（即讲明事由），又得到人枪数百，投到川军第六师袍哥旅长杨春芳部任团长。1923 年，范绍增随杨春芳投靠第二军杨森部。又如邓国璋，1931 年邓锡侯向甘肃扩张，黄隐任总指挥，率邓国璋等部向陇南进军，占领文县、武都，进攻天水。因部队纪律太差，指挥不灵，被甘肃击败，退回川北江油整顿，将邓等一并调职，部队改编。邓国璋失意返回成都，正遇刘文辉在成都扩军备战，委邓为独立旅长，并送巨款，令回永川家乡组织部队。邓国璋回到永川，得到邻近各地码头协助，招集旧属，并收编团防土匪，组成三个团。①

但是，袍哥队伍也有以下的严重问题：

一、军纪很差，明兵暗匪，有的无粮无饷，全靠搂抢维持生活。如善成口述《我的土匪罪恶生活》记载：“那时候一般无赖之徒，总想当兵吃粮，趁浑水把鱼摸，我也希望将来有个发迹，于是就应召入伍，编在吴二大王（庆熙，外号吴二大王）的侄子吴国栋连长手下当兵，从此就开始明兵暗匪的生活。民国六年（1917 年），吴二大王受编在二师师长刘存厚的部队里。刘存厚打戴戡，我们转战于仁寿、威远一带，为刘师长卖命。那时的军队，无饷无粮，几乎全靠搂抢维持生活。仁寿县出棉花，农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卖了，换得少数的钱来苟延他们微弱的生命。我们先在街上的茶馆酒店里和棉花市上把钱钓好，跟在他们背后，在僻静的地方声称检查，说他是土匪、侦探，借此把钱搂抢，照例把人绑在树旁，用衣服塞住嘴巴而去。记得我第一次抢人是民国七年的夏天。我们的部队住在仁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寿麻柳场，我同彭吉安（彭二麻子）钓到一个老妇人卖棉花回家，在隔场五里的凉水井地方，用菜刀威吓，抢走四十吊钱（铜元折合数）。当时我仅廿一岁，感到这种事很杷和，不费力，做这种生意，不要一点儿本钱，认为这是发财的好门路，以后经常做这个‘无本通商’的买卖。因为队伍不关饷，弟兄伙又要烧烟，有的还要供家养口，‘长官’没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这个‘台子’。面子上说查出抢人要枪毙，事实上是鬼哄鬼，从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我们的连长，连长也喜欢，我的胆子就愈来愈大，缺钱用的时候，几个兄弟伙就出去走动走动，每次走动总有一些收获”。①善成这个口述，清楚地说明了明兵暗匪的状况，是有典型性的。

二、容易为敌方利诱，策动倒戈。袍哥军官，反复无常，时常被敌方诱以金钱，许以官职，进行倒戈。如杨森部师长杨春芳，一年不到，三次倒戈，②使“杨森出兵湖北失败回川，杀杨春芳。”③其后杨森整编部队，实行所谓系统化，宰割袍哥队伍，扣魏甫臣、逼走陈兰亭。范绍增恐祸将及己，乃与郭汝栋、吴行光等联合赖心辉的第二十二军，举兵反杨。范部进攻万县不利，退至巴县木洞，投归刘湘。1932 年“二刘大战”的过程中，刘文辉、刘湘都利用袍哥关系去策动倒戈。刘湘获胜的原因虽多，但其中一条就是他多次挖对方的墙脚很见效，而刘文辉挖对方墙脚却没有成功。如 1932 年，刘湘在万县扣留刘文辉新购的一批军火，刘文辉亲自到重庆索还不遂，忿极暗以金钱收买刘湘部师长范绍增、蓝文彬附己。此事很快被刘湘

---

①《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第 214—215 页。

②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查悉，范绍增主动向刘湘告密说：“刘么爸[1]送了我三十万，我交给督办”。刘湘阴险地说：“算了吧，送你的你就用嘛，你可以到上海去耍一趟，把局面先打开，我们以后好去！”于是，范腰缠累万，到上海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并在重庆建造了别墅“范庄”。刘湘将范暂时解决之后，接着就将蓝文彬扣留，改编蓝的部队。刘文辉挖对方墙角遭到失败。与此同时，刘湘派袍哥唐绍武前往诱劝刘文辉独立旅长邓国璋倒戈，却见成效。邓国璋驻永川前线，受彭诚孚指挥。邓部人枪均强，对地形熟悉，刘湘想硬攻大有困难。刘湘前敌总指挥是潘文华，一天，他到重庆太平门补一药房与补一先生密谈，无意中透露出想争取邓国璋反攻的心事。补一知道唐绍武同邓国璋交情甚厚，便向潘文华建议，请唐绍武去劝说邓部投归刘湘。潘文华当即向刘湘报告，刘湘很高兴，并吩咐唐绍武说：“你可以向邓保证，过来之后，完全保存他的原有地位”。唐绍武随后赶到永川会见邓国璋，向他转达了刘湘的意思，并向他说明，重庆方面的范绍增、陈兰亭等都很关心他。用这些话打动邓国璋。邓反复思考，当天晚上在司令部内召开军官会议，大家认为投靠刘湘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打通重庆到上海的通道，便于经营鸦片、吗啡，容易发财升官，一致表示赞同。最后商量，当刘湘部队前进到警戒线时，邓部不放一枪而向后撤，同时派得力人员到重庆面见潘文华，接受其指挥。刘文辉部驻永川的彭诚孚见邓国璋撤离，以为情况紧急，也仓皇撤退。当两部退到隆昌再向自流井撤退时，邓部即离开彭诚孚夺路而去。从此，邓国璋部即编入刘湘序列，掉转枪口去打刘文辉。以后岷江战役，又由邓国璋出面运动，把彭诚孚也拉到刘湘一边，刘文辉部队全

---

[1]刘文辉是刘湘的堂叔，刘湘喊么爸，所以刘湘部下都喊刘文辉为么爸。

线动摇。此外，泸州之战时，刘文辉以杨尚周、田冠五两旅坚守泸城，刘湘以水陆空三路进攻不克，乃由潘文华派其副官处长、礼字袍哥周瑞麟赴泸城，运动杨旅袍哥团长江杰反戈，作为内应，顺利攻占了泸州。①

因此，军阀既要利用袍哥土匪队伍，又要对它存有戒心，需要时便笼络，不需要时便将其分割改编，甚至缴械遣散。

袍哥军官还有另一些共同点：

一是广交朋友，讲江湖义气。如范绍增在上海，广交朋友，结识了青帮杜月笙、黄金荣、洪门杨虎等，挥金如土，故示豪奢。以后在上海成立袍哥组织“益社”与青帮、洪门鼎足而立。陈兰亭在重庆，常参加义字袍哥组织活动，很讲江湖义气，门前常有不少穷困弟兄候其进出时要求周济，在中下层社会中颇有声名。②

二是统驭部下，不按军纪，而靠个人关系。范绍增不准手下官兵喊他“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要亲亲热热地喊他“大哥”，似乎才有哥兄老弟的味道。③他在军队中推行袍哥化，以袍哥大哥来统驭部下。

三是留恋四川，不愿远离拖滩根据之地。陈兰亭常因奉命调出四川，不愿远离就另投军阀。陈兰亭早年投靠第一军第六师任团长，后升旅长。第一军战败，全军由贵州退湘西转广州，他不愿离川，改投赖心辉的边防军，仍任旅长。1929 年，陈兰亭投向郭汝栋的新二十军，编为第三师。1931 年郭军奉调湖北，他又不愿出川，另投刘湘编为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司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③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令。[1]

四是卸职回家后，仍嗨袍哥。如灌县的申介屏、刁青云、宋辅卿，卸职回家“又雄踞富乡，广结宾朋，‘搭台子’、‘捞梁子’，仍然出人头地，名播山原”。[2]

其他师旅长如李宗煌、田泽孚、邓和、刘肇乾、杨显名、彭焕章、乔仲泉、马昆山、黄鳌等，都是卸职之后继续嗨袍哥，参加组织公社码头的著名人物。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②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十四、洋袍哥的活动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逐渐深入四川。1890 年（光绪十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设领事。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又开重庆为商埠，日、美、法、德均设领事，日本并在王家沱开辟租界。英商太古、怡和、立德、卜内门，美商大美、捷江、美孚，法商异新、利源，日商新利、大阪、日清、友邻、东华，德商礼和、元亨等洋行公司，先后在重庆设立分公司。帝国主义列强，都垂涎四川丰富的资源和广大市场，实行经济侵略。英、美、法、日兵舰，横行川江，经常停泊在重庆南岸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王家沱等江面。他们设立的布道教堂，遍于各地。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四川人民的反抗。辛亥革命前，袍哥憎恨洋教，参加反洋教斗争。如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重庆袍哥大爷唐廉江率领袍哥兄弟打了洋司铎，闹成教案，被巴县衙门通缉，迫使他跑滩到日本留学。这个时期，袍哥还没有与帝国主义分子勾搭上关系。

但是，清末四川各地普遍存在袍哥组织，已引起帝国主义分子重视。为了便于活动，法商异新洋行大班斐洋人（重庆人呼为“老洋人”）大肆联络袍哥码头，包席请客。其子斐利比

蒂、孙河斯达，都曾与袍哥往来。洋行推销员希腊人巴巴达，还嗨袍哥，正式加入公口，到处拜码头。

民国初年，洋行大班和其他外国人参加袍哥组织更多，如美商永明保险公司大班开普，经过翻译胡文钦引进，也嗨仁字袍哥，见人称兄道弟。①有自号“浪迹天涯客”的西人，曾在民国初年在四川参加袍哥组织，并累升至大爷。他对袍哥的入会仪式、名刺用途及执行纪律等情况亲眼目睹，了解甚详。认为袍哥宗旨在于互相扶持，同会有行辈，分仁义礼智信五门，仁门参加者是文士、官吏、富室和军人。上述情况均与欧美的工人团体“规矩会”相似。袍哥势力很大，其机关遍设于蜀、滇、黔、鄂、湘、桂、粤、秦、陇等省，其他省亦有。“会众入会有的是求庇以免扰攘者，有的为假势焰以报睚眦，有的为应援以雪覆盆者。而盗贼攘劫之行，大抵末流为害，本非袍哥所赞同。其对于辛亥革命、倒袁运动等均有大功。”②说明这位洋袍哥大爷对袍哥的历史进行过一番研究，作出的评论大多是符合事实的。这反映了不少袍哥已逐渐与洋人搭上关系，是袍哥势力与来华的洋人勾结的表现。

军阀混战时期，重庆袍哥与帝国主义洋行的勾结关系愈加广泛。帝国主义洋行经常运来各种武器弹药在上海秘密销售，甚至将手枪和子弹运到汉口、宜昌出售。重庆袍哥中搞运出烟土吗啡，买进枪支弹药的人，逐渐增加。他们要和洋行挂钩做买卖，需要外国商轮兵舰运输。他们要逃避关卡检查，需要借帝国主义洋人势力庇护。同时，袍哥也与军阀勾结起来，为军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

②甘作霖：《西人所述哥老会之历史》，《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一号，1917年11月。

阀销售鸦片吗啡，购买枪支弹药。

袍哥与洋行、兵轮的洋人勾结，最初多靠洋袍哥牵线接头。其中巴巴达在这方面的活动，时间最长。

巴巴达是希腊游民，少年时游荡海外。法帝国主义侵入云南后，他就在滇越铁路活动走私，深入内地州县。因此得知四川袍哥势力大，为了便于活动，在夔府经湘军将领鲍超之孙鲍某引进，参加仁字“进同社”三排。回重庆后，他又经重庆仁字大爷邱绍芝超拔出山当大爷。巴巴达最初是推销洋货，主要有钟表、日用百货、装饰品等，聘袍哥弟兄李炳南为其助手。后来牵线接头买军火，销售鸦片、吗啡。上沿东大路直到成都，下沿长江直到夔府、宜昌，沿途县镇，均出公片拜码头，送礼应酬。借袍哥势力协助，销售货物极为迅速，获利极丰。一次，巴巴达在内江，打麻将被人弄假，一夜输银千余元，翌晨抬几箱时钟去偿赌债，李炳南认为此行必然亏本，殊不知返渝结算，仍有盈余，可见其利润之大。

1909 年（宣统元年）巴巴达在重庆开始以小型电影机流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推销洋货，为四川有电影的起始。以后他又在重庆设电影院，以李炳南任经理，放映外国影片。刘湘驻军重庆时，巴巴达与袍哥师长范绍增、陈兰亭等结识，往返密切，又在重庆千厮门城墙边开设华洋旅馆、西餐厅。以后又在南岸龙门浩开设华洋旅馆、酒吧餐厅，招待外国兵舰船员水手，并为他们接洽走私买卖，介绍妓女玩乐。当时华洋旅馆成为军阀、买办、袍哥与帝国主义洋员水兵进行勾结的场所，许多罪恶交易都在其中进行。

巴巴达性喜活动，中国话讲得极好，熟悉中国生活方式，嗜赌博，尤爱打麻将。平时与袍哥商人等往返，调笑戏谑，毫

无拘束。其妻为重庆人，系李炳南的姨妹，生二子五女。重庆解放后，于 1951 年 5 月，携全家返回希腊。巴巴达在四川活动共达四十余年。[①]

在四川与洋袍哥勾结，通过洋行买进枪支弹药的人，以袍哥大爷唐绍武最为出名。

唐绍武，重庆人，自幼参加袍哥，曾在熊克武第五师当过兵，后来专门贩卖军火，往来于重庆、宜昌、上海。他开始靠洋袍哥巴巴达牵线接头，以后搞熟了，就直接往来。从一次购买几支枪起，跑短途，在宜昌买进，运重庆卖出。后逐步发展到藉洋行和军阀关系，正式取得政府护照，一次购运步枪、手枪五六百支以上。太古、怡和、日清各公司轮船，英法兵舰都曾替他代运。当时的手枪有两种牌子，一种是长管十发，称为毛瑟，一种是短一寸，称为花旗，两种货价钱差不多。从宜昌进货，每支配子弹一百发，大洋一百元。运到重庆可卖二百五十元，除去沿途明暗开销，也有一倍之利。武器生意的对象，一是袍哥舵把子，二是大小土匪头目，三是大小军阀。

1920 年秋天，唐绍武结识了邓国璋，然后通过他又结识了邓锡侯部下黄逸民、龚渭清、谢德堪和很多川西袍哥，军火生意的销路就更广。邓国璋一次就付给唐绍武大洋四万元，由唐到上海去打开直接从外国洋行进货的路子。唐结交了德商礼和洋行驻上海的代买曼格勒，一次便可购进手枪一二百支，最多一次达五百支，每支配弹五百发，大洋一百元。运到重庆每支配弹一百发，售价二百五十元，其余子弹另卖，每一百发五十至一百元。

唐绍武卖给邓国璋的枪弹大半是先交款，后交货，所以总

---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是尽量先满足邓部需要。在川军中，除刘湘把持四川门户，自己通过冷开泰勾结上海、汉口帮会，大批向外购买军火外，其余各军购买枪支弹药，大多是唐绍武经手，因而获利甚多。唐绍武从上海回四川时，送给邓国璋的礼物，就是一部价值五千大洋的流线型小汽车。

唐绍武替邓国璋出售吗啡，为他“滚”过吗啡大案。1932 年邓国璋倒戈，被刘湘委为第二十一军边防军第三路司令，移驻白市驿一带，邓设厂制造吗啡，除在本地销售外，于 1935 年 7 月由其军需处长罗明良利用法国兵舰“白林”号开赴上海检修之便，向舰上翻译余方体交涉托运吗啡一千斤到上海。罗未与货物同行，等电报称货物已安抵沪后，即亲到上海提货。余方体想独吞这笔运费，没让舰上人员知道。船到上海后，又想偷点吗啡，打开包裹匀装，被法军军官发觉。经盘问余方体道出实情，法军官因未得到贿赂，心怀不满，即向上海缉毒机关报告，将余拿获审讯。余方体全盘道出情况，警方又在吗啡箱中查出一张二十余名分货人名单。当即电重庆蒋介石参谋团，下令警察局将罗明良逮捕，并将罗与余方体一道送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处理。当时蒋介石正想控制四川，但又担心“四川王”刘湘反对，这件吗啡案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向刘湘和四川军阀施加压力，因此蒋对此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严令查办，成了轰动渝、汉、沪毒品走私大案。

案发时，邓国璋正在峨眉军官训练团受训，急派副官杨国昌连夜赶往重庆，并写信给唐绍武，嘱其代为斡旋。唐绍武也认为事情严重，但袍哥规矩要为弟兄分忧解愁，于是接受邓的拜托，先向各有关方面拿言语，探知押解罗明良到武汉的是警察局密探长贺德荣，贺也是袍哥。唐绍武先买一替身，想把罗

换下来，贺德荣未同意。唐绍武送了五百块大洋给贺德荣，托其沿途照顾罗明良。唐绍武本人也借口到汉口办理接收重庆冠生园事宜，一同乘船同行。唐上船后，又多次游说贺德荣，希望他帮罗明良逃走，并表示今后一切用度，概由邓国璋完全负责。贺德荣则提出另一办法：找一个和罗明良身材大小相仿的物品，在船靠码头时，乘客下船拥挤，出其不意将它抛入江中，可以诡称罗明良已跳水，然后将人放走。贺德荣说归说，就是不动手。唐绍武眼看游说不成，只得告诉罗明良不当软骨头，千万不能招供。还警告罗说："你全家都在永川，招认了不仅你本人难于活命，你全家都保不住"。唐还拿了一包水银，要罗到了行营时见机行事。如不严重，能混就混过去，如情况严重，就服毒自杀，身后一切由邓国璋负责。罗明良一面抱怨说：升官发财是他们，搞出事来就该我去送命；一面无可奈何，还是把水银用胶布贴在自己的胯间。船抵汉口码头已是深夜，武汉行营派有卫兵守候，当即将罗明良送行营看守，加上了镣铐刑具。罗明良见事不妙，认为已到绝望时刻，乃乘入厕之机，服下水银自杀。第二天行营将押送人犯的贺德荣逮捕审讯，他供出唐绍武同船及沿途运动情况。下午唐绍武亦被捕，交行营军法处审讯。唐进门便加脚镣手铐，意欲苦打成招。唐绍武被收监一年多，审讯不下二十多次，羁押地点由看守所转到监狱，又从监狱转到警司令部。唐绍武始终说与罗明良同船是偶然，罗明良是袍哥，过去也认识，袍哥重义气，在船上多花一点茶饭钱，请贺德荣给些方便，是袍哥中常有的事。他一直用这些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唐绍武知道在名单上占有吗啡最多的是邓国璋，如果招认就出卖了袍哥弟兄，邓国璋不会放过自己，家属儿女也难逃。只要他坚不认账，没有口供，警方办

不了人。不如当个硬汉，能滚出来在长江流域的袍哥中就吃得开。因此，唐绍武一直硬挺着，虽然经过刑讯，他吃了不少苦头。而看守所的老犯人、看守中的许多人，不是袍哥便是洪门中人，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加上在汉口的四川袍哥蒋相臣等在外奔走营救，最后只得以“帮助杀人”为罪名，判唐有期徒刑五年。后唐仅被关押三年，于 1938 年被释放。①唐绍武替邓国璋“滚”过吗啡大案，没有“拉稀摆带”，为拜兄们硬挺坐监，被袍哥兄弟赏识称赞，出狱后即由行六擢升为大爷。②

抗日战争时期，唐绍武继任重庆仁字袍哥公口之一三省公执事大爷，专搞江湖活动，经营“沙利文”饭店，非常豪华，以后开大华饭店、盟友舞厅、冠生园餐馆等企业，用袍哥一套进行经营，业务很盛。他手下弟兄很多，有工商界人士，公教人员，也有贩运毒品的烟客。唐绍武为重庆袍哥实力派之一。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十五、大军阀多半是大袍哥

四川军阀大多是参加（或挂名参加）了袍哥组织的，“军阀头子，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①

辛亥革命前，熊克武原系同盟会员，为了做袍哥的工作，从日本回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袍哥当大爷。②石青阳也是原系同盟会员加入袍哥的。③

据记载：“邓锡侯是四川最大的袍哥。其次是王陵基、王缵绪、杨森、唐式遵等大军阀。这些袍哥组织了一个‘川康大同公社’，这是一个全川性的袍哥组织，但并不是各地袍哥的领导机构。它只是一个政治性比较浓厚的，不限于某一地但各地都有分社的高级袍哥组织。是一个封建的大规模剥削的托拉斯，势力最雄厚，操纵全川政治经济。但他们内部亦由于‘亲中央’与‘地方派’的区别而存在若干矛盾”。④另一记载也说：“邓氏（锡侯）也是四川的大袍哥，曾和川军头子王缵绪、王陵基、杨森、唐式遵等组织了一个‘川康大同公社’，

---

①《研究四川军阀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

②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④《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是一个政治性较浓厚的，各地均有分社的高级袍哥组织”。①

刘文辉也是大袍哥头子。②“刘氏在川西南的袍哥中，也有一定的威望，能掌握一部分袍哥武装。四川的袍哥势力是很雄厚的，西康紧邻的川西彭山、新津、温江、邛崃、眉山一带，农民百分之七十都是参加袍哥组织的，同时西康的袍哥（主要在宁、雅两属）都兼种鸦片和贩卖鸦片，而且都拥有武装，据说每个社（袍哥组织）有五、六百到千多条枪。替刘文辉和袍哥之间来拉拢的是刘氏的老部下，西康田粮处处长陈仲光。陈氏是西康荥经人，家住雅安，在西康袍哥中势力很大，在雅属六县中最负声望，又是雅安的总舵把子。他在政治上的资本即是袍哥”。③

刘文辉还叫他五哥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组织“公益协进社”，“着意招纳邛崃、蒲江、大邑、新津、温江、双流等地的大土匪郭保之、袁树江、陈福安、周联五等人，为其主要成员”。④

刘文辉之侄刘树成，组织“至诚社”，自任社长，分社二百余处，分布川西及西康雅属各地。他是川军中的师长。⑤这个袍哥组织的后台是刘文辉。

刘文辉的师长邓和，组织灵羽社，自任社长，支社二十余，分布于成都、邛崃、蒲江、大邑、洪雅等地，社员十余万，为失意军人政客的组织。刘文辉另一师长李宗煌，是礼字旗舵把子，“各方面弟兄极多，其弟兄中有很多是学生，为少

---

①《川康地方派系概况》，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印，1947 年 9 月出版。
②《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③《川康地方派系概况》，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印，1949 年 9 月出版。
④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⑤《川康地方派系概况》，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印，1949 年 9 月出版。

壮派中号召力最大者”。[①]

此外，刘文辉与其他军阀袍哥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原刘湘旅长、后任雷马屏司令穆瀛洲，是义字旗舵把子，拥有武装三四万人，“自立为王”，与刘文辉、刘树成有密切的关系。[②]合叙同社，社长彭焕章是潘文华的师长，但只是挂名，真正的社长是周桂三。周是刘文辉部在职团长。[③]

大军阀刘存厚、田颂尧也是大袍哥头子，充当袍哥组织的后台。田颂尧之弟田泽孚，曾任廿九军旅长和宪兵司令，1933年在川北与红军作战时，田项尧叫他组织三台、盐亭、阆中、苍溪、巴中、通江、绵阳等七县的袍哥组织“武德总社”。田颂尧被红军打败，蒋介石下令撤职，田泽孚也随之下台。下台返籍，即以“武德总社”号召东山五场的袍哥，称霸一方。[④]后在刘存厚、田颂尧的支持下，成立“民总社”的袍哥组织，田泽孚任社长，刘肇乾（曾任廿三军师长）任副社长，“总社在成都，支社三十余，社员十万人。该社与四川老军阀刘存厚、用颂尧关系很深”。[⑤]刘、田是该社后台。

刘湘驻军重庆最久，重庆袍哥与其下属官兵的关系尤为密切。著名的重庆袍哥大爷冯什竹、唐绍武、李祝三等，不仅与该部袍哥出身的师、旅长范绍增、陈兰亭、邓国璋称兄道弟，并与其他军官也有来往。[⑥]

大军阀成立的袍哥组织，不仅在社会上发展弟兄，而且吸

---

①《四川帮会调查》，1949年印。
②《四川省哥老会概况》之一，1949年油印本。
③《四川省哥老会概况》之二，1949年油印本。
④《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年印。
⑤《四川帮会调查》1949年印。
⑥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收部属官兵参加，把袍哥组织扩展到部队中。如潘文华任刘湘师长时，驻防乐山，在乐山成立“正心社”袍哥组织，“他不仅在民间广纳弟兄，并号召部属官兵踊跃参加”。[①]王缵绪组织“怜民社”，自任社长，要求全师军官一律参加，并发展他的同乡西充县其他营以上军官，凡路过他防区，都邀请入社。四川陆军第十师师长鲜英和该师十九旅长李射斗，因系西充人，都被邀请入了社。参加“怜民社”的人，都在左手指戴上银丝戒指作标志，一律以“社友”相称。[②]

大军阀还企图将不同旗号的袍哥联合起来，成立联合组织，以充实力量。如重庆的孝义会属于这一类袍哥组织，“范绍增、陈兰亭、潘文华都是发起人”。[③]

军阀虽已军权在握，但要巩固其实力，仍然需要凭借袍哥为其效劳。如范绍增，原为袍哥土匪，被招安后，任旅长、师长、军长，但他懂得还要据立“公口”才有作为，“他高竖‘益社’，更见威风”。[④]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都很注意利用袍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记载说：“民国十六年（1927 年），刘文辉时任四川帮办，为要巩固他在成都、在川西的统治地位，进而统治全川，千方百计地笼络各地既有声望，又有势力的地方实力派袍哥巨头，作为他的社会基础。趁是年办花会的机会，开筵大宴全川各县在蓉的袍哥首领，目的在策动袍哥力量拥护刘帮办。由大邑袍哥陈华斋（24 军旅长陈献洲的父亲）、覃筱楼（24 军旅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②李仲华：《川军将领王缵绪》，《西充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

③《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④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长)、刘文彩（刘文辉五哥）等出面，请牛乾初（成都正府街袍哥舵把子、四川省公路局长牛范九之父），灌县袍哥刁青云、申介屏、宋辅卿，彭县袍哥刘岳仙（曾任汉军统领），双流袍哥李安邦、王锡之，崇宁袍哥李怀清、张绍泉，广汉袍哥侯少煊等一百多个舵把子及其兄弟伙。还有很多因路远来不及赶到的。在花会竞成园坐了六十三桌。席间主人致词后，群推侯少煊代表大家致答词，略谓：‘袍哥同仁，自辛亥革命以来，对时局极为赞助。当今刘帮办扶持袍界，不遗余力。吾人感谢主人厚意，殷切招待。今后能为四川建设出力之处，应当尽力为之……’。当天的聚会刘文辉甚觉满意”。①抗日战争后，蒋介石在成都设立中央军校，与刘文辉等川康地方实力派矛盾日益尖锐化，刘文辉曾经计划“在必要时动员帮会袍哥，将关麟征主持的中央军校予以解决，俾达到其统一全川的目的”。②

在大军阀成立袍哥组织和利用袍哥的激励下，四川袍哥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四川连年内战，田赋预征达几十年之久，破产农民流入城市。而苛捐杂税，兵匪劫掠，工商业凋敝，使失业者增多。战争频仍，散兵游勇浪迹城市，扩大了游民队伍。这都使得袍哥的社会基础日益扩大，组织迅速发展。由于袍哥公开活动，各公口逐年改变帮规，对有钱有势的人放松限制，为军阀、官僚、地主大开绿灯。在军阀割据时期，重庆袍哥的发展较之省内其他各地尤为迅速。据记载：“重庆五堂袍哥共有三百多道公口，分设在城区及江北、南岸等处的各个街道，设置的地点一般都开设茶馆”。“截止抗日战争前，

①侯少煊、邹善成：《袍界的“三开”人物李安邦》稿本。
②《川康地方派系概况》，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印。1949 年 9 月出版。

全市约有袍哥六七万人”。①

在成都，1925——1933 年，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合驻成都地区，那时三军长下面一些对外交际、支应宾客、负责保卫工作以及侦捕匪盗，担任成都治安工作的人员，几乎大半是袍哥，甚至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和绝大多数将领本身的安全，都由袍哥来保障。②

袍哥是军阀割据政权的组织基础，还操纵着县以下的行政单位。据调查，在一地则有地位的士绅是袍哥头子，保甲长也都是袍哥，袍哥掌握了行政大权。他们的决议可以通过参议会（议长们大都是袍哥）以使之变成地方的决议。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可以直接交给保甲长去执行。县政府要指派某人为乡镇长时，首先得看他和当地袍哥有无关系。如果不是袍哥的同道，那么一切政令的推行一定要受到阻碍，甚至袍哥会联合一批流氓专门和乡公所捣乱。常常为了竞争乡镇长数个社互相争吵，甚至械斗。他们所以能掌握下层地方行政，除了通过乡保长的关系外，还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下层社会的活跃人物几乎全是袍哥。在边远地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袍哥舵把子就是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太上皇，行政官员不跟地方的袍哥大爷“拿言语”，就难得“四平八稳”坐下去，在政令的推行上，如征粮、收税、募捐、维持治安，如不借重袍哥的力量，也就行不通。他们有些就是土匪，或与土匪有关系，土匪在抢劫某家之前必先通知当地袍哥首领，否则不敢行事。官府为了治安方便不得不尊重和拉拢袍哥首领。这样，即使在出了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侯少煊、熊倬云:《解放前成都市的“治安”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

案件以后要想破案，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龙头大爷答应解决就可立刻退回原物。在川西及西康雅属一带，袍哥都有枪，并且公开地武装鸦片走私，通常称为烟匪。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军阀、官僚、地主也不得不去和袍哥拉关系。[①]

①《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十六、土匪和袍哥的关系

一般说来，四川的土匪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利用袍哥组织进行抢劫活动，按照袍哥的帮规、纪律组织土匪队伍和管理土匪队伍。袍哥按其行为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混）水袍哥。清水袍哥大多是有正当职业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是比较“奉公守法，讲义知礼”的人，其中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居多，只有个别下九流分子。浑水（混）袍哥多从事不正当职业，成分比较复杂，恶霸、土匪、强盗，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都为非作歹，其中主要是职业土匪。①因此，土匪与袍哥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清水、浑水虽然是不同的袍哥，四川民俗视清水袍哥为“仁义”袍哥，视浑水袍哥为“棒老二”，袍哥自己也认为浑水为“好汉”，清水为“老坎”，两种袍哥也“因之不甚融洽”。②但是，他们经常宣称：“关了巫山峡，袍哥是一家”，在组织上并无两样。

其实，清水、浑水之间也经常转化。清水的“金带皮”袍

①《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②陈永乐：《绵阳袍哥总舵把子左汉章其人》，《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第三辑，第 58 页。

哥，即金指钱，皮有面子，这种人把钱挥霍完了，或无面子了，被浑水兄弟伙一拉，就去干抢劫、贩毒、窝赃等事，自己变成浑水袍哥。而浑水袍哥抢劫、贩毒、窝赃发了财，或拉队伍作军官，有的买田买房，在家闲居，成了地方上的士绅、工商业者、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另立公口，摇身一变为清水袍哥，不再参加土匪活动。

在袍哥清水、浑水转化过程中，清水转浑水是很严格的。“成为浑水者，必先追随‘老浑滩’跑过码头，经过长久时日，不断培养训练成能够带人抢劫，能‘提口袋’的时候，得到拜兄的信任，即可给予武器使用，并可成为土匪分棚帮手，才算是真正的浑水袍哥（职业土匪）。①成了浑水袍哥后，平时对拜兄要绝对服从，态度诚恳，倘若有一点表现不满，或不忠实，拜兄就会把给予的武器收回（这是浑水袍哥最痛心的），停止他参加抢劫活动，若再不检点，不赔罪哀求还有生命危险。

有清一代，袍哥是非法的秘密的民间组织，清水、浑水袍哥不分，只要是袍哥，朝野上下都视为“土匪”。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出版的《成都通览》，讲到袍哥时企图说明参加袍哥的人不都是“匪类”，称“流为匪类者，多假托袍哥之名。因入会之流品太杂太滥，故多流为抢劫之匪类。抢劫人者，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谓之棒客”。这在当时言论界中是罕见的。至于浑水袍哥的活动，究竟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经济抢劫活动，还是以反清兴汉的武装斗争，有时也分不清楚。在武装斗争的袍哥队伍中，土匪也参加。如辛亥武装起义的袍哥队伍同志军中，“尚夹有所收编的

① 《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印。

土匪问题”。[1]在“成都兵变”的抢劫活动中，主要巡防营中不肖士兵肆行抢劫，同志军中的土匪也继之而起，谓之“打起发”，抢了大量财物。乃至到民国初年，袍哥中的清水、浑水也还分得不明显，护国战争起来反袁的袍哥队伍中就有大量的土匪。

袍哥中的清水、浑水界限分得比较清楚，是在护国战争以后。“称杀人放火抢人的袍哥为浑水袍哥，一般的称为清水袍哥”。[2]也称“混水袍哥——即土匪（当地人称为棒老二或棒客），清水袍哥——上层阶级人物（即当地人称为绅粮），凡未加入混水袍哥者人物，称为清水袍哥”。[3]具体说来，土匪是指那些“拖棚子”、“占山头”、“打家劫舍”、“关圈拉肥”的人。这种人往往结伙成“棚”，在官府势力比较薄弱的偏僻的地方，抢劫拉肥。从护国战争以后，四川军阀各据一方，扩展实力，争夺地盘，竭力收买利用“棒老二”为己效力，许以官爵，诱以利禄，土匪队伍日益恶性膨胀。

土匪队伍中也有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参加。他们在地方上收罗因官府逮捕不能回原籍的“跑滩”的滥哥弟，暗中给予以武器，一方面给他保镖，当“刀客”；一方面掩护他们进行抢劫，自己坐地分赃。这些恶霸地主往往不动声色，得到相当多的赃物。他们暗通官府，私通消息，支使土匪无恶不作。由于收罗滥哥弟，彼此互相利用，更增加各自的势力。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好像正人君子，实际上直接间接地作恶多端。[4]

①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 506 页。
② 《四川省袍哥概况》之一，1949 年印。
③ 《四川省袍哥概况》之二，1949 年印。
④ 《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印。

浑水袍哥（职业土匪）是搞抢劫活动为生的，为了应付官府逮捕，社会舆论的谴责，更惯于使用黑话暗语进行交谈，以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率领土匪入伙叫“拖棚子”，最大的“棚子”叫“小梁山”，分往另一地方成立的股匪叫“分棚”，如同清水袍哥成立的分社、支社。土匪头子不叫“舵把子”或“社长”，而叫“老摇”，参加“棚”的土匪称“糖”，抢劫时不叫姓名，称“老大、老二、老表、伙计”。枪称“通”。鸣枪叫“生冲子”。抢牛叫“牵藤子”，抢汽车叫“滚子”或叫“兔子”，问钱有多少叫“水有多深”。拉的“肥猪”男的叫“肥猪”，女的叫“母猪”，拉小孩叫“抱童子”。拉的“肥猪”多少叫“多少张票子”或“多少张叶子”。“肥猪”住宿的房金叫“圈板钱”，伙食费叫“饴食钱”，“肥猪”脱逃了叫“翻圈”，与亲属约定洽商赎取办法叫“上盘”。窝藏、留宿土匪叫“稳子”，暗中告密叫“卖”，暗中向人点明土匪叫“点水”，官府派兵来缉捕土匪叫“水涨了”。等等。总之，从洗脸、吃饭、上路到抢劫、分赃都有黑话暗语。土匪“棚”的老摇、内外管事和“提口袋”（带人抢劫者）等人，都要熟背黑话，通用暗语，并教给新参加入伙的土匪。①

土匪组织称“棚”（或“哨棚”），有“总棚”、“分棚”、“边棚”之分。“总棚”是最大的匪棚，由数股或几十股土匪组成，土匪人数几百几千人，有枪炮几百几千支，土匪头子称“天王”、“大王”、“总老摇”。“分棚”是由“总棚”分往另一地方的匪棚，也是“总棚”下面的支棚，由十几或几十个土匪组成，有枪炮十几或几十支，分棚土匪头子称“老摇”。“边棚”多是由“分棚”在乡间成立的暂时性的匪

---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成都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藏。

棚，由几人十几人纠结而成，是职业土匪哨棚的外圈，多系农村二流子、失业人群和游民，因经济困难，生活无着，由职业土匪统率，在地方上搞小规模的、季节性的、为数不多的经济抢劫活动。从严格的标准来说，参加“边棚”的人，不能全都称为土匪，因为大多与职业土匪还有区别，是边缘性的人。

浑水袍哥（土匪）也奉行“五伦”、“八德”，严禁诲淫，有一套匪规。如若发现“棚”内弟兄，有人“参灶”（即与哥兄老弟的妻子通奸），轻则“三刀六个眼”，表示愿意改悔时，自己在腿上戳三刀，但一定要戳穿，故有六个眼（洞）；重则“自己挖坑自己埋”，不然就要被“抛”出去，即将“参灶”者弄至僻静处枪杀、刀砍或活埋。如若自己妻子与他人通奸，或者本人在抢劫时调戏强奸妇女，“棚”就公开“挂黑牌”、“放火炮”把他“吆”了，即赶出“棚”。但是，土匪中那些给“拜兄”“出热”而杀死人命、闯下大祸，或因抢劫犯案被官府缉拿追捕的人，“棚子”里不但不加责怪，反而千方百计地将这些人隐藏起来，甚至“拿言语”、“走字样”，托人说情，尽量使他们得以解脱，或者让他们到外地去“避豪”、“跑滩”。①这与清水的帮规相同。

浑水袍哥（土匪）也实行封建的家长制，要求绝对服从“老摇”。抢劫的货物，由“老摇”决定分赃、裁股的办法，一般是“线子”（即送情报和带路人）占二成，伙食零用跑堂人钱扣除以后，即以人枪数目分配，有枪的双股，无枪的一股，“老摇”往往占大半股。②这样，下面的兄弟伙，分得无几，土匪头子也是一样对兄弟伙剥削。

---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成都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藏。

②《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印。

在四川和西康的边远地区，浑水袍哥（土匪）组织所谓“烟棚”，一是自己种罂粟，制造鸦片、吗啡，或勾结外地浑水袍哥合股在边区播种制造；二是组成土匪武装，向经过的地方袍哥组织“拿言语”，由“烟棚”土匪运送，抽取非法所得的利润的比例款项。[①]

在土匪猖獗的地方，商家旅客为了保险不出事，暗中与浑水袍哥“棚子”上说“包袱”，土匪“老摇”得了钱财，便派一两个兄弟伙一路保险，遇到别路“棚子”上的土匪来抢劫，便拿出“老摇”的名片与“棚子”字样，于是得以顺利通行，美其名曰：“护商”。后来土匪正式成立“护商队”，收护商税，更增加商人的负担。

①同上。

十七、土匪活动的猖獗

四川在军阀混战时期，土匪日益增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土匪武装。李白虹在《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一文中，记述1932年的四川社会状况时说："四川的军阀战争，已延长到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给予民众们的痛苦，是重重的剥削和掠夺，是无数的死伤与流离。这种痛苦流离的结果，当然造成了无数的失业流民，除了为兵为匪和不绝地暴乱之外，再也没有出路。我们看近来全川各地（尤其川东南的边境），匪徒的啸聚，真是日盛一日，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时候，数目即在十万以上，在目前（1932年）不知又增加了许多倍"。①

在这个时期，土匪已不同于以前那样简单的拦路邀截，而是有了一套组织，内层外圈，分工负责，集体出动抢劫。据成都市华阳县黄龙场（即三道桥）的袍哥土匪头子姚树廷手下的一个土匪善成的口述：

（一）平常养有"钩钩"。找一些地痞、流氓与了解哪家哪户有贵重金银财物的人挂钩，这些"钩钩"多半住在客栈、沿江码头上和船上，他们一有情报，就来告诉我们，根据所报情况，暗中再作调查，靠实在以后，约好时间下手。

---

①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近代史资料》1962年4期，第84页。

（二）各方面接纳“点手”。“点手”对情况十分了解，比如银子钱埋在哪里？衣物放在哪里？家里有些甚么人？平时的行动如何？有几间房子？有无后门出口？房间门是甚么方向？由“点手”当场指点，生意做完以后，看情况给“点手”一些油水。如其没有出问题，事情很顺利，钱就拿多一些。如事情不顺利，赃物和钱少，就一个子不花，等以后再酬劳。假设“点手”有虚谎情事，便要暗地整死，装在麻布口袋中，扔下河。

（三）找好带路的“长二”。长二称为“带线子”，即带路的人。哪条路最近便？沿路地势如何？哪些地方是口子？哪些地方有乡团？如有乡团的地方，要怎样绕过才不出事。都由长二先弄清楚。假设长二带的路与乡团打了仗，甚至打死了兄弟伙，不但不给钱，同样还要处死他，往往押到“乱葬坟”或河边给他一刀，送他见阎王。

（四）事先准备好驼牛。根据“钩钩”、“点手”报的情况，看金银财物的多少，找几个精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带上箩筐、滑竿，抬的抬走，担的担走。

以上这些事情有了着落，准备停当，便开始行动。行动之前，有“前传后代”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不能出动抢人，所谓“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出动抢人，多半选定二十边月黑头，白天大家散在街上耍，黄昏时分，约在沟边、乱坟坝、庙子里。除“钩钩”、“点手”、“长二”、“驼牛”以外，内伙子作具体分工。哪些任尖兵？哪些“排扇子”（推门）？哪些护货？哪些堵后门？到了目的地，统由总管事提调指挥。沿途不能喊名字，只能拍掌，或用嘴作些咋咋声，联络前后。在行动前任何人不能“登台子”（在床上站起），不准犯讳、说鬼、说不吉利的话。准备好

“青水子”（用洋油即煤油浸入草纸，草纸裹成筒形，插在竹筒里），插在头巾上，以免沾手，走拢目的地大家点燃，火光烛天，如同白昼。亦有用松香合清油，浸入布筋，编在两块竹篾块上，点燃作照明之用。

走拢目的地“熛签张子”（即烧钱纸）敬神，负责排扇子的弟兄伙，三四人挤开大门，一哄而入。如其门太大、太紧，便搭五人梯，即所谓“冲围子”，另外根据点手的指点，排房间门。

如其失盗主（被抢的人）的“马子奎”（力量大），事前亦分配有固定的人对付。去的时候总要把后门堵好，因为失盗主经常警戒着的，一有狗咬、响动，总会从后门跑走。进了屋便“检渣渣”（被盖、罩子、衣服统称），专人负责，见东西就拿，点手点出金银窖的地方，有专人起运；最多半个钟头，大家传呼“下了”，即行结束。十有九次惊动了民团，左邻右舍喊“打抢人啦！”“打抢人哪！”我们始终不做声，联系倒一路走，不慌不忙的回去。当时军、团、匪、袍是一家，大家声息相通，假如遇到“鸡毛子”（指不识相的乡团），捡顺吃了就是。

东西抢到手，弄到事前找好的地方分赃。内伙子根据总舵把子的意思办事。多半在乱坟坝和庙子里分。分的当中，舵把子提几成，总管事提几成，枪提几成，子弹提几成，没有枪的就分抢来的破旧衣服和不值钱的东西，刨成堆子，一家一堆。按枪分也还要依枪的好坏来定多少，毛瑟枪、手锤子、新式步枪、双筒枪和马枪，都各有细致的规定。

东西分了下来，由舵把子命令各人秘密卖去。如果卖东西不仔细，被失盗主发现，就要找出事的人，不“毛”（杀）了也要大短（断）以后的财路，即以后不再约参加抢的人了。抢得

来的金钱，如发现有人“掐股子”（即私吞的意思），亦得暗杀投河。

除了到失盗主家中抢劫金银财物以外，还有“巴帖子”。在失盗主的大门上巴一张大红帖子，丢一封信，说“我们军人无法维持伙饷，向你暂借若干，并限期交到甚么地方，否则烧你的房子”之类的话。我们时常这样搞，要二千，至少也可以收到三百、五百。

此外还有专门去拉肥猪的手法。事前准备好滑竿、“驼车”，走拢拉到便塞住口绑在滑竿上，抬起就走。记得是 1922 年，那时姚树廷尚在，我们做了一笔抱童子的生意，敲了两万个银元。……假如占点点，拿出公口和全堂（舵把子、管事、三排）字样，可以少出钱领走。

还说一下翻了圈，肥猪跑了，就要把管圈的人处死。因为肥猪跑了，乡团就要来“清剿”，多少定有损失，在土匪看来，管圈翻圈，弄死是千该万该的。事实上翻圈的绝少，因为拉来的肥猪，必要捆起、锁起、关起，耳朵塞起，关在地洞或拌桶下面。我们土匪的手段残酷、毒辣，肥猪总是弄得眼睛瞎、耳朵聋，成了废人。

除了“拉肥猪”以外，还有“打歪子”。“打歪子”就是在河中劫船，有事前钩好的，有打碰对的。我们多半与船老板勾结，比如在成都东门外码头、中兴场的下河坝船码头，栈房里的钩钩，与船老板支起出来的钩钩勾拢，报与我们的管事，管事查明路线，摸清楚开船时间，计算好沿途行船的地点与时间，带起兄弟伙去“起货”。

记得 1923 年二、三月间，我带三十几个兄弟伙在仁寿与华阳交界的古佛洞地方打了歪子，抢得人字呢、布匹很多，还有

银子三千多两。船上派有几个兄弟伙，配合岸上的兄弟伙行动。我带三十个人在古佛洞转弯处等。船开的下水，我们放了几枪，叫船歪过来。船上的内应估着舵手靠岸，把乘客吆下船，吆到河边沙坝上排成两排，举起手，八只枪恨着，“驼牛”边搜边拿。记得那次抢了布匹、银子二十七挑。兄弟伙把岸上乘客身上的钱理麻干净，把衣服脱了，只剩一件汗小衣，然后把乘客吼上船叫船立即开走。

除了“打歪子”，还有“掸鞭子”，有些钩，有些一样是打碰对。借检查把往来客商抢了，这种办法，即所谓“掸鞭子”或称“宰根子”，区别上面所述的抢劫办法。它费事小，收效却很大。记得 1922 年，我们钩到川北帮有二十挑银子，银子是银贩挑到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的，每挑有一百斤，内中有五两、十两重的银翘宝。我们在龙泉驿山上做的这笔生意，走了约摸半个钟头，团练局撵起来，声言捉土匪，结果把当地的一个有钱的叶老头抓走，硬说他通匪，后来叶老头送了壹百两银子了事。这位团练局长亲自到我们码头上向姚大爷致意。感谢对他们的“关照”。

那些年间，川北帮如顺庆帮、遂宁帮带的丝绸、布匹和银子钱，只要经过我们那里：山泉铺、界牌、茶店子、龙泉驿场口上，都得给我们留下“买路钱”。①

从这个土匪口述的具体抢劫过程，可以得知土匪的猖獗罪恶活动。成都地区的土匪如此，其他各县可想而知。记载说：“四川各县无地无匪，劫场拉肥，已为常事，且每股势力，数百千余人者，亦颇寻常”。②

①善成口述：《我的土匪罪恶生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第 218—224 页。

②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 564 页。

有些土匪认为世界是他们土匪横行的天地，可以任意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在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匪世界”。如四川广汉当时就是著名的“匪世界”，土匪头视其实力大小，各划一片地区作为抢劫范围。除三水关“团防”实力雄厚，和土匪有相当默契，其余廿二个乡镇，都成了匪区。广汉位居川陕大道，距省会成都四十几公里，商旅往返素极频繁，1917 年以后，道路经常不通。后来土匪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在众多匪徒分乡分片抢劫之后，广汉各乡做庄家的人（包括贫、下中农）因猪牛被拉，农具粮食也被劫夺的关系，无法耕作，也无人愿意做活，有的全家搬迁外县，有的远出劳力贩贸。于是田园荒芜，在县境广大肥沃的田地里，长满乱草，很难看见几块稻麦作物。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筹收保险费的匪头，俨然就是这个地区的领主。他们抢劫的行径虽然有所减少，但对善良人民的欺侮奴役，并未停止。凡是得罪了匪徒的人，被打被杀总是常事。对匪徒们的婚丧庆吊不送礼捧场的人，都会遭到祸害。甚至像淫匪头曹杰三那样，在他盘踞的永丰、金轮、兴隆三乡，凡属年轻貌美的妇女，大半受他奸污；他并规定凡是出嫁的新娘，都要先送他家由他侮辱后才能送到男家，如果不遵照办理，新娘的父母就要遇害，新娘就要被拉。①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89—93 页。

隆昌也是有名的“匪县”。“土匪有快枪、有土枪，有马刀，打青丝套头，穿红绿马褂；有哨棚，有边棚，哨棚即较大之匪棚，边棚即较小之匪棚。三五支枪几把马刀，也算一棚，十多支枪的就是哨棚。最大的哨棚，也有四五十支枪的。匪首最著名的有黄宝书、王全之、彭耀武、蔡北平、谢荣章、曹占云等。黄宝书住东街宝华当，统率几个哨棚，其势力范围，限于城内。王全之住万寿宫，亦统率几个哨棚，其势力范围，限于城外。彼此划片抢劫，分段拉肥。乡间则多为边棚。匪棚林立，遍地是匪。土匪多系袍界二流子、农村二流子，及被迫失业的机房机匠、炭厂拖挖匠等等，尤以义、礼字袍哥最多。随后也有地主和商贾参加，地主商贾当匪，有的是想为了借此大捞一把，有的是借房子躲雨，一般则通匪者甚多。如薛翰涛有田租三百余石，竟出钱买枪，成立哨棚。当时土匪除抢劫财物外，主要是拉肥。把有钱的人拉至匪棚，拿钱去取人，动辄要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不等，故大地主大资本家多逃至成都、重庆、内江避难，亦有逃至云顶寨避难者。土匪围攻云顶寨几次，均未攻入，云顶寨派人与土匪交涉，赠送 5000 元才了事。又有送礼物至曾倬三、郑锡三家中躲避者（曾与郑系袍界有名大爷，都通匪）。又有十人逃到福音堂躲，但福音堂已丧失威信，谢荣章统率土匪将躲避在福音堂之地主完全拖出。土匪在隆昌经过两三个月抢劫拉肥之后，似乎搞头不大了，匪首黄宝书、王全之乃出面来负责维持城区治安。黄宝书每月要收保险费 3000 元，王全之每月要收保险费 2000 元，城区居民也愿意出钱，以图苟安。至于乡间农民，其痛苦更甚于城市，既要受抢劫拉肥之苦，又要受破坏生产之苦，家禽家畜，土匪随便杀，粮食小菜，土匪随便吃，农民白天出工田间，晚上露宿旷野。当时内

江人目隆昌为匪县，越过沱江者，必严格检查”。[①]

灌县一面靠岷山，一面靠袁家山、青城山，北面靠近四川的松、理、茂大山，东面直通温江、郫县、成都，可称交通走廊。“川西三杰”之一宋辅卿有三千匪徒盘踞灌县，四处拉搕抢劫。在青城山的土匪，也经常劫场拉肥。[②]“以袁旭东为首的河西土匪（袁系河西玉堂场人）、周汝卿（河西中兴场人）、张某等，各有百千余匪徒不等，其他三十、五十的小股散匪，专门从事有计划的抢劫”。[③]

在边远山区的县，长期被土匪盘踞，经常在附近各县抢劫拉肥。如安县，记载说：“五年（1916 年）后，川局纷纭，而匪风复炽，如梓柏二山之郑世发、杨敬万、朱元发以及不记姓名之余党，搂抢将及十年。东乡李浚臣，南乡之周大坍子等……扰害地方，约十余年方始诛灭”。[④]“酉阳股匪，如饶玉德、伍南清、张少卿三部稍大，每部约有枪五六百支；其次，如田绍武，有枪百余支；其次，如田百谷、张会川、枪共百余支；再其次，如宋金生、张玉清、杨大少、张昌等，约十余股，每部分约有枪三五十支不等，总计各路之匪已二千七八百人，枪千余支。年来县属西东之偏岩、柏溪、甘溪、麻旺等地，农民受其鱼肉，已成老死壮逃，十室十空之现象”。[⑤]

①吴荫秋：《1917 年隆昌兵匪交织惨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145—146 页。

②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 563 页。

③《关于成都附近及川西北匪特武装情况》1950 年印。

④民国《安县志》，卷 56，礼俗第 10 页。

⑤《四川农村崩溃实录》，华同社报道，1935 年 2 月 17 日出版。

十八、形形色色的匪头

在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匪头子。按照他们的发展轨迹，大致有几种类型：

（一）从土匪到地方官

李安邦，又名李春山，双流县柑子树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他是由棒客、刀客而爬上地方官地位的。

李安邦在童年时代，就在柑子树街上和袍哥厮混，颇受浑水袍哥的熏陶，在十二岁时就开始同一些浑水袍哥在新津、彭山一带抢劫。后被官府发现，成了追捕的对象，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被迫出外“跑滩”。

十五岁时，李安邦去到广汉，以“食客”身份追随富绅邓七公子作刀客。

李安邦在邓七公子死后由姓李的袍哥相约到金堂，即伙同金堂刀客李某等三十余人，抢劫火盆山彭解元府第，开北路抢人之端。当时北路袍哥均以刀客为雄，不事抢劫，李安邦则言传身教。

火盆山抢劫案发生以后，不仅轰动了金堂县，而且邻近县的地主士绅，无不谈虎色变。地方官也怕丢官催促衙役昼夜奔驰，八方缉拿。李安邦分得抢劫的银子，独自潜往峨眉铜河

“麻濠”（隐蔽躲藏之意）。华阳县巨匪徐披毛抢劫案很多，被捕后越狱潜逃，举家迁往铜河，以铸造毛钱（铜制小钱，是清朝发行的一种辅币，私铸也犯法要被杀头的）为生。李到铜河就住在徐家，因为都是绿林豪杰，臭味相投，慕名相交，两人遂结为异姓兄弟。

李安邦在铜河有了落脚地点，更加肆意抢劫，在崇、郫、新、灌、眉、彭、丹、青、邓、蒲、名、雅一带，打家劫舍，兼作刀客。

李安邦由于作案太多，终于在光绪末年在双流落网。双流县衙审讯，他硬不招供，于是鞭笞杖责，继以严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监禁，后又押解成都府衙监狱。自到府衙监狱，受到更严重的酷刑，他始终不供罪行，于是再升级，留待“秋审”处决。由于灌县的刁青云委托府衙差头翟炳章暗中营救，临审时打通关节，得免斩首之厄，但押还收监。辛亥革命时，双流彭泽等将弁学堂的学生，于混乱中冲入府衙，打烂府监，将李安邦放出。

李安邦出狱的当天晚上，夺得巡防军士兵一支枪，赶回双流，参加双流同志军的反清活动。李在狱中受到袍界中人的倾服，回到双流后，双流袍哥码头上，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欢迎他“开山立堂”，成立袍哥公口。李安邦于是登上双流袍哥舵把子的宝座，当时豪门巨富也都拜倒在“李大爷”的脚下。以后由李安邦出面组织保商队，在成都至嘉定这条道路上保送温江地区的麻、油到嘉定，由嘉定护送丝绸布匹返成都，明保暗索，只是巧取与抢劫方式不同而已。

李安邦还在双流开设“川南旅馆”，呼朋引类，广结交游，三山五岳的兄弟伙，清水浑水的哥弟们，川流不息，往来

频繁。无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士农工商，富者贫者，他都走得通。远近豪客，大小股匪，拉肥抢掠，正反两方，他都吃得开。这时的李安邦一呼百应，一诺千金。二十一军唐式遵的独立团团长杨鹏举的父亲杨东楼被三道桥浑水袍哥作为“肥猪”拉了，准备“这一棒要敲够”，通知要一万两银子（合大洋一万四千元）取人。后辗转委人请李安邦帮助，李立即“攒堂”(袍哥开大会仪式)，三道桥的刘建成登时承认是他们的兄弟伙干的。李安邦说:“这个人情给我”，刘即表示:“既是李大爷的人情，我们分文不要，叫失主到三道桥来取人”。可见李的势力之大。

李安邦还做鸦片烟生意。民国五、六年烟价上涨，李安邦借助西康羊仁安的地方势力，凭借袍哥义气，穿越深山老林，出入少数民族地区，往返一次获利盈万。他用做鸦片生意赚的钱，应付散财聚友，宾客盈门的浩大开支。

1923 年，李安邦与黄瞎子进行土匪战争，李取胜后，为军阀重用，于 1927 年被委任为双流县团练局长，企图以匪治匪。后刘文辉又委任李为双流县公安局长，仍兼该县团练局局长。集团练、公安两官于一身，真是嚣张一时。

1935 年 1 月，蒋介石借口堵截红军，派出“别动队”为先遣队，散布全川，企图对四川军政地方势力进行分化、拉拢，于是年 6 月在峨眉山下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名为训练军官，实际上也搜罗非军职人员，如省教育厅长、各专区专员、县长以及县团练局长等，妄图扶植自己的亲信。受训学员是指调，李安邦就是以双流县团练局长的身份被指调去受训的，无非是想利用李的袍哥土匪官僚身份，以对付四川军阀。李安邦早年曾到峨眉山区“麻濠”，而今日旧地重游，不再是逃犯，

而是“军官团”学员。有些人一方面感到迷惑，一方面也为他“前途”庆幸。可是，他入团不久，由于吃牛肉罐头，由食物中毒而死。死后开了追悼会，蒋介石亲临致祭，长长的祭文，表示他的悲哀，借此在四川收揽人心。[①]

从土匪到地方官的这种人，还有不少，如川北江油、梓潼、剑阁交界重华场（现宝成铁路小溪坝站上游十华里的一个场镇）的黄清沅也是一个典型人物。黄清沅又名黄正本、黄退庵、黄正培、黄三元、黄澄、黄中、黄本利，生于 1898 年。黄清沅的父亲黄德斋，是一名黑刀笔讼棍，长期与当地袍哥、劣绅、乡保人员往来，懂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处世手腕。他抽鸦片烟卖掉了祖传土地四十多亩，只剩下二十八亩，感到过不下去了。1913 年一个秋天的上午，他把黄清沅打扮得整整齐齐，领到靖安乡乡长、坐堂袍哥大爷敬俊卿家拜把，黄清沅磕了三个响头，算是入山了。以后，黄天天给敬大爷背枪，保护敬安全。1916 年，黄十八岁，有一次川北著名的大土匪谢宴富，人称谢司令（活动在四川边境青川、平武、剑阁、梓潼），指着黄对敬说：“这个小伙子是青龙码头（浑水袍哥）的好兄弟”。便把黄要去当拜弟，于是黄就在谢司令手下“摇线子”（探视路过有钱的客商）、“拉肥猪”（绑票）、打家劫舍、招呼应酬，胆子越来越大，二十来岁就吃得开了。1922 年，黄二十四岁，当重华场联保主任。他与几个土匪商量，“要立堂子（浑水袍哥）就要自己有枪杆子”，就计划夜袭江油团防总队，那里有好几百支枪，弄到手后可以在附近几县称雄。在一个深秋之夜，他们带领几十个弟兄，抢了江油团防总队，搞到几十支枪，打伤了代理团总欧奎。但后来专署和县

①侯少煊、邹善成：《袍哥“三开”人物李安邦》稿本。

府严加追查，黄只得求情跑到蹇家山蹇幼樵家躲藏。蹇是川北有声望的士绅、袍哥大爷，和上层人士有密切关系。经过蹇的说情，黄退枪、赔款、道歉，还“抛出去”几个弟兄伙了结，但黄却“敢吃团防局”的“名声”远扬。1925 年，黄二十七岁时，就自立堂口，称大同公总社（后来发展到四十一个分社，三千多人参加），任总社长。当年又升任梓潼县重华区副团总。他还与有“患难”之交的契友，结为金兰弟兄，称为所谓“重华七子”。这七个人，人人有枪，个个有钱，打家劫舍，奸淫横霸，无所不为。1929 年，黄清沅当上了梓潼县的清乡团长，又派兄弟伙协助收渔税、屠宰税和贩卖鸦片，当上梓潼县商会主席。1913 年蹇幼樵当梓潼县长，保举黄清沅当公安局长，后又兼国民党重华区分部书记长。1935 年，国民党当局对工农红军围追阻击，绵阳专署成立江彰梓盐青平六县联团指挥部，蹇幼樵任总司令，黄清沅任第五区指挥部司令，负责剑阁至梓潼、梓潼至江油这一带阻击红军，被红军击败退到安县，保住他的公安部队和土匪队伍。他为红军打败，被人告发，省保安处将他逮捕，他用鸦片、银元、黄金共值银元十多万元，贿赂贺国光、邓锡侯、孙震，被无罪释放，又回到重华。1937 年起，他着重扩充自己的势力，结交附近几县的大土匪、大袍哥和军政人员，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他所组织、控制的袍哥、土匪势力拥有两千多支枪（不包括公有枪支），多数是步枪，另有少数机枪、冲锋枪和手枪。先后担任梓潼县公安局长、防护团副局长，保安局长，国民党四十一军咨议员，梓潼县禁烟委员会主任，江油、梓潼、剑阁三县边界土匪集团头

子，简直成了川北的一位土皇帝。[①]

（二）从滥兵、土匪到特务

冷开泰是一个浪迹江湖，由滥兵、土匪而走上大特务的人物，袍界人士称他为“冷大王”。

冷开泰，四川仁寿县观音寺乡木泥寺村人，1889 年（光绪十五年）生。其父早年外出做生意，经营丝业，后来专作丝业经纪，替人介绍买卖，巧取渔利。冷开泰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然受不到良好教育，从小就养成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等坏习惯和坏作风。

冷开泰十余岁时，其父托人介绍到双流县簇桥镇场上王少安丝行作学徒，没有钱用，就在每大把丝中匀出一小绞，偷出卖钱使用。后被察觉追究，远逃合川县渠河嘴舅父家。其时，他舅父王某在“卡子”（当时最基层税收机构）上当卡员，除依靠舅父生活外，也帮舅父做点事情，从中又懂得勒索贪污等手段。

冷开泰在合川舅父处混过一段时期之后，又回到成都。值清兵巡防营正招练新兵，冷前去投效即被录取。在营中担任勤杂工作，当时称为勤务兵，服侍上司赵管带（管带职位相当于以后军队中的营长）。继由恩拜兄成都新巷子罗大爷“栽培”，加入袍哥当小老么，从此随时在外仗势欺人。

辛亥“成都兵变”，先由巡防军动手“打起发”，冷开泰即是倡议之人，抢当铺、商家之后，继抢藩库存银。他带头前往断锁开仓，将藩库存银七百多万两抢劫一空。抢得银两者，大多怕清查追究，或潜回原籍，或远走各地。惟冷开泰在抢银

①梓潼县政协文史组：《川北土皇帝——黄清沅》，《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

之后几月，并未潜匿，大肆挥霍，托人说合代书街灯彩铺老板之女为妻，择吉过门。后清查追究抢劫风声日紧，他才远走碧口，开始了贩鸦片、当土匪的罪恶生活。

清末民初，甘肃的碧口盛产鸦片，与四川松、理、茂（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接壤，但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土匪众多。做鸦片生意必须通过袍哥。那时在松、理、茂屯垦的部队，都是招安来的土匪，人称“匪队伍”。该部有由匪招安的营长沈立廷（绰号“沈长子”），冷找人介绍，与沈拉上了关系。另外，他又投靠通往成都的交通廊——灌县的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介屏和宋辅卿，他们给冷向各地袍哥码头“拿言语”、“出片子”，还给他枪支。冷有钱有势有枪，除自己贩运鸦片外，还组织烟帮，搞“保商”事宜。冷由此收了大批不义之财，供他狂嫖滥赌，大肆挥霍。最后把钱弄得精光，不但“无脸”见人，还得罪了刁、申、宋三位大爷，只好“跑滩”到川东重庆。

冷开泰跑到重庆，和几个老圈（土匪袍哥）混熟了，就住在江北泰山石巷子。还同龙泉驿的曾德荣、简阳的段成舟等在一起，合伙进行抢劫活动。他们商议，由彭老圈弟兄拉队伍，拉回安岳笋子场、石羊场等地抢人。冷开泰在重庆负责购买枪弹，共同分肥。同时，冷又到壁山开设“群英茶园”，作为招纳流亡匪徒的联络据点，并笼络壁山驻军，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

他们既抢劫、又贩烟。他们专贩云、贵烟土，每次达几十挑之多。沿途有袍哥掩护，又与军队通声气，故能顺利运到成都。冷开泰回到成都，挽请双流李安邦等向灌县刁、申、宋说人情。他们认为冷既跑过滩，又有办法，不但前嫌尽弃，还要培

植他。冷如逢大赦，大排筵宴请客，才正式在成都露面。

不久，彭老圈几个匪头，死的死，枪毙的枪毙，冷的后台垮了，只好另想办法。他利用曾德荣的关系，在龙泉驿操袍哥，又结识了不少土匪。1920 年，他在石经寺和一批土匪换帖拜把，其中有香泉铺的曾斐然，石盘铺的谢锡武，海螺河的鄢伯陵，芦家桥的张静如、刘寿山，三道桥的姚树廷、邹善成，中兴场的刘伟廷、王国梁，傅家坝的傅炳之，苏码头的曾吉廷，石盘铺的和尚海岸（石经寺的方丈）、圣达、圣有，贾家场的邓九成，双流的李安邦，簇桥的王绍武等二三十人。从此，成都、华阳、简阳、双流、仁寿各地的恶势力结成一片，冷开泰伙同这帮土匪到处抢人。

1920 年左右赖心辉招冷开泰为支队长，虽然只有几十条枪，但仍分成三个营，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处，并继续抢劫旅客和住户。有一次，冷开泰探得遂宁帮将护送一二十挑银锭到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就在山泉铺拦劫了这批银锭。随即把队伍拉到彭山，找驻防彭山的刘成勋部队余连长包庇，在彭山附近继续进行抢劫。后又活动招安未成，兄弟伙就散了。

1921 年，冷开泰又到重庆，住优胜旅馆，与当地土匪又当过营长的邓星垣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代表王南波同住，他们三人勾结起来，在旅馆里编赌骗钱。适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高级职员、青帮头子邱伯垣来到重庆，带有三支新式手枪。冷出高价把三支手枪买过来，转卖给彭老圈的兄弟伙“杨破老壳”。当杨被告发枪毙后，官府严拿卖枪的人，冷开泰看到“水紧”了，乘船跑上海，但在船上事泄被捕关进大牢。冷自命豪杰，承认卖枪，但没有供出邱伯垣。经多方设法营救，判

冷有期徒刑三年零两个月，送巴县监狱。后又疏通，遂以有病“保外就医”为辞，准予保释。

1922年，冷开泰与向成武、周礼堂、邓三莽子（江防第五区司令邓鹏程之子）等人结成一伙，在长寿上沱、木洞、晏家场、螺溪一带抢人。他们曾在螺溪把当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的部属旅长傅真吾押运的几百支枪和一些子弹拦劫了。不久，冷被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左翼纵队队长吕辅周（吕超的三哥）招安为支队长，向成武作营长。冷乘势把附近的张海云等土匪收罗起来，并支使他们暗中抢劫。

这时“峡口”有个匪首叫“绅粮老鄢”，掌握了许多“边棚”，声势不小，冷和他声气相通，往返密切。时川军孙震所部团长谢庶常带队“保商”，行至峡中，被土匪拉走一二十人。事后由遂宁商会会长张勉之出面交涉，托冷开泰帮忙赎人，仅成都的刘万和的赎金就是两万元，冷吃了不少甜头。

当时，刘湘在重庆设立专门治罪的“全川团防总局”，委胡荣安为总局局长，乔仲权为总局监察长。乔在十余名卫队保护下由渝去合川，行近“峡口”过不去，找冷开泰护送，冷又找老鄢，乔才平安抵达。后来老鄢受乔招安为团长。不久、潘文华、唐式遵、王陵基等部大队人马前去清乡，冷开泰等匪众才四下逃散。

冷开泰从长寿逃到重庆，适上海邱伯垣因感激他在买卖枪支案中没有牵连到自己的情分，专电邀请他去上海。抵沪时，受到邱的盛宴招待，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顾家棠、羊阿毛等都热情接见宴请。冷乘机吹嘘四川袍哥力量、军阀的威风，并炫耀他自己的声望。当时汉口“洪门”头子杨庆山也在上海，邱伯垣与之介绍，杨庆山非常赏识，邀他入“洪门”，

称为“嗨大哥”，如袍哥之称大爷一样。

冷在上海期间，利用青帮关系帮川军第三混成旅李越森部的游击司令易吉三（原是土匪）购买了一批枪弹，沿途经汉口、宜昌一带，由“洪门”护送平安抵川。他在上海认为可以“拉肥猪”，和身边的秦子均、向子材、肖进汉三个商量，物色到江西的一个财主为对象，把财主绑走。第二天事情暴露，冷等被捕，肖进汉和其他二人被立即枪毙，而冷由开“都一处”大餐馆的老板廖海澄营救获释回川。

冷回川后，就投奔驻防石柱的易吉三，易委他当副官。他嫌职务太低，就又跑到万县投32师师长唐式遵的独立旅旅长杨海清。杨与冷既是仁寿同乡，又曾一起在彭老圈那里当过土匪，因而就把冷留在旅部。当时，万县城防司令（唐式遵的独立团长）杨鹏举的父亲杨东楼被绑走。杨东楼也是唐式遵的老师。冷开泰抓住时机，请李安邦交涉，结果分文未出领回。杨为此非常感激冷，向唐式遵推荐为团长。可是不久，刘湘把杨海清的枪提了，冷转到唐另一部当营长。杨海清认为是冷出卖了他，要打死冷。冷逼得又“跑滩”到上海。

刘湘在上海购运大批枪弹，途经万县时，曾被杨森指使范绍增部化装成土匪全部抢走。此外，南京、武汉为蒋介石中央控制，不易通过。有人向刘湘说，冷开泰能办此事，潘文华、唐式遵等也赞成，冷就承办这项差事。刘湘委任他为驻汉办事处副官，后又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旋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冷在宜昌工作一段时间后，回重庆晋见刘湘，刘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处长。情报处是刘湘的特务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内的情报人员都可单独行动，每人都随身带有一方盖了关防和刘湘私

章的绸子，可凭此调动军队、逮捕人，并可向行政、税收机关支用银钱。此时，冷开泰已成为刘湘跟前的红人。

1935 年，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7 月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冷开泰随同前来成都，仍任情报处长。他除照旧做特务工作，还给刘湘出谋划策。他向刘献了一条以匪治匪的方案，诱使地方匪首“缴枪自新”，便于收集人枪，以资利用。于是就有金堂赖合山，温江杜培根、吴安民，郫县张亚光，彭县徐寿朋，安县周怀德，绵阳左汉章，成都曾发春，华阳方卿云等匪首自新，共缴出长枪约二千支左右。所有这些自新人员，全入情报处谍查组工作，由土匪转为谍查人员。后来成都市区的治安，就基本上由这些自新的匪首来负责维持，从而又有一批土匪成为特务的人。

后来冷开泰投靠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从事军统特务工作，为国民党中央搜集情报，被刘湘发觉，以胡尚武接替冷的情报工作，把冷一脚踢了出去。此后，冷开泰在军政界没有任何职务，就进行组织字号公司，从事经济方面的活动。但他对烟、匪、袍、特等方面的活动也从未停止。他庇匪拉肥，坐地分赃。如曾作过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的周瑞鳞，即在与冷开泰商量之后，指使匪徒将仁寿“武财神”黄勤生拉走，冷开泰自买自卖，佯装好人将黄赎出，利用这个人情，在组织“汉华公司”时，邀约黄勤生当大股东，又骗了一笔钱财。又如资中县的“财神”、商会会长彭积光，被巨匪帅鹏章绑票后，求庇于冷开泰，冷答应将肥猪移至成都外东赖家店窝藏，由他保险。结果是勒索彭家付出巨款后，取得一具死尸。像这残忍狠毒的事情还很多。

冷开泰虽然是当了几十年的土匪、袍哥，却没有自己的码

头。1946 年春，他刚办起“汉华公司”，就想借此成立袍哥组织“汉华社”，自任总舵把子。他邀请著名的哥老袍哥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作为主要发起人。参加的人数比其他码头都多，声势很大。不久，王蕴滋等人离去，“汉华社”活动陷于停顿。冷开泰不仅没有实现统治全川袍哥的愿望，反而遭到舆论的种种非议。为了敷衍舆论，平息公愤，国民党通令解散汉华社，冷只好退却。①

（三）从土匪到军官

军阀部队中，被招抚的土匪头子大有人在。师长杨春芳、范绍增、魏甫臣，旅长邓国璋、龚渭清、羊仁安、邹善成（善成）、石肇武、陈凤藻等等，都曾经是有名的土匪头子，其中邹善成、邓国璋、龚渭清、羊仁安是有典型性的人物。

邹善成（善成），四川华阳县石羊场人，1894 年生。他从廿岁开始嗨袍哥后当土匪，从老么嗨到大爷、总舵把子；由三个两个散匪到成群结队达百十人的股匪。

1916 年，他抱着希望将来发迹，应招入伍，从此开始了他明兵暗匪的生活。二十一岁开始抢劫，以后便经常做这个“无本经商”的买卖。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连长，连长喜欢，胆子就愈来愈大。

1919 年，他在但懋辛师长下的工兵营第二连当兵。不久，调他到军士队学习六个月，学了一些军事技术。学习完毕，他回家探亲，华阳县黄龙场（即三道桥）的袍哥土匪头子姚树廷拉他，他就不再当兵，跟姚磕头入伙，正式当匪，做小管事。从 1920 年下半年到 1923 年，邹善成在成都县、华阳县、仁寿县、简阳县、温江县、双流县、新津县、彭山县和眉山县一带

①侯少煊、熊倬云：《土匪起家的冷开泰》（稿本）。

抢劫财物，危害人民，买些枪，吃些枪，编些兄弟伙，武力愈裹愈大，成了一个气候了。姚树廷死后，那股土匪拥邹为匪首。

1923 年，吴克仇（吴敌）驻在简阳贾家场，邹善成在吴部挂有一个营长的官衔。张子重部也给他挂一个营长官衔。张子重要他打吴克仇。邹善成不去，张把他的兄弟伙围在贾家场，打死打伤一百二十余人。邹善成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退到中兴场。邹仍在吴克部挂名营长，插杆旗子，表面是军队，暗地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实际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他除与军队勾结外，还与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勾结。他们开会商定：邹善成保证在地方上不出事，谢吉武保证给邹的方便，装瞎子。

邹善成手中原来只有十几支枪，以后陆续买了一些枪，一共买了三十支。多数是向成都枪贩子买的，军队中下级军官偷出来卖的也有，守卫的兵偷出卖的也有，收荒匠那里买点零件拼合起来的这种枪也有。此外，还吃了别的部队的一些枪。邹善成在龙泉驿就与六师师长余际唐部的独立团汪海云勾结，将送成都的废枪吃了，各分得二十支。熊克武退经华阳石羊场，邹善成以每支二十元的代价收得枪一百二十支。

1924 年初，成属清乡司令彭光烈在眉山招安，由双流李安邦介绍，保证邹善成以后不出事，于是受编为彭的成属清乡司令部第一支队的营长。此后，邹善成便开始新的罪恶生活。①

1925 年邹善成率部与杨森作战，在内江被打败，后率人枪千余投奔刘文辉，编为刘文辉九师的独立团任团长。以后几年，连年参加军阀混战。1933 年，刘湘与刘文辉混战，刘文辉大败，邹善成部溃不成军，刘湘部之彭焕章收编邹为该师的第

①善成口述：《我的土匪罪恶生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

一团任团长。

1934年，邹善成利用袍哥关系，走小道，从彭焕章部逃跑，返回刘文辉部，被刘文辉委任为二十四军特务大队长。

1935年，邹善成移防康定，奉命阻止工农红军前进，布防于瓦丝沟大盆坝一带。1937年升任二十四军一三八师二团团长，驻防雅安。1945年被任为雅属第一区保安司令。后调任为康定警备司令。解放前夕，充任二十四军少将高参。1949年12月9日跟随刘文辉率部起义。①

邓国璋，四川永川县陈食乡人，1897年生。其父以卖沙罐为生，收入微薄，得病无钱请医服药而死。邓成孤儿，不学好，向别人借了二十元作本赌博，结果输光。无可奈何，乘着黑夜跑到远房姐夫邱云成处暂避（邱后来曾任邓部特科团团长）。由邱介绍，邓在梓潼乡团队当团丁。

1916年刘湘（时为周骏师旅长）率部驻永川，整编地方团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邓国璋升为班长。1920年春，刘湘师部驻合川，与熊克武采取共同行动，驱逐滇军。战争开始，刘湘部失利，残部向安岳撤退。邓国璋和班内士兵二人，趁机带走枪弹逃回陈食乡。

陈食区正周联斋，梓潼乡团总魏华轩听说邓国璋逃回带有三支步枪，他们都想买，但出价很低。东山匪首龙治轩（青峰乡人）得此消息愿出三百元大洋，邓国璋表示同意，但尚未成交，周联斋知道后大怒，扬言邓把拐带的枪支接济土匪，扰乱社会，要派丁捉拿，就地正法。邓国璋闻讯知道家乡混不下去，逃到梓潼乡魏华轩处，魏给他二十元钱，嘱其远走外地，另谋出路。

①善成口述：《自传》稿本。

1921 年，邓国璋只身逃到贵州，在桐梓县赶水乡投靠曹天全入伙当匪，担任内管事。他见曹与附近一匪首老炎由猜疑而不和，即暗中联络匪徒，采取突然袭击，把老炎的匪棚解决，人枪据为己有。曹对邓此举极为不满，由此曹、邓之间矛盾日趋恶化，曹亲率所部攻邓，为邓所败。至此，邓自立匪棚，出没于綦江、东溪之间，其中一个得力助手就是龚渭清。①

龚渭清，四川江津县蔡家岗人，1897 年生。其父龚海濂经营小饭店，龚渭清八岁至十二岁在家帮助父亲照料饭店和做杂务。十三岁开始嗨袍哥，加入“义”字旗，拜兄为刘树三、陈宝云、王云合。1917 年，二十岁时经李海庭介绍，到白沙投军，在石青阳部陈参谋长处当弁兵。半年后，下连当兵。又半年，请假返江津老家，在本乡当团丁两个月。1919 年，同他的叔父龚海庭在省溪河驾船，往来江津重庆间，是年冬，船在猫儿峡遇匪，客货蒙受损害。

1920 年，经龚义章介绍，前往川黔交界的泥坝，加入邓国璋匪部。②

邓、龚两人和另一土匪出身的李德发，效“桃园三结义”，吃过血酒，结为异姓兄弟。后来，龚、李两人都在邓国璋的麾下。邓在匪棚中本来是后起，他的势力扩展得很快，和他手下这两员健将是有直接的关系。

1922 年，杨森为了扩充势力，在綦江、赤水一带，招抚曹天全、邓国璋等股匪，委曹为旅长，邓为团长。曹同意，邓因与曹有前嫌，担心曹会借故搞掉他，未就职。当时，第三师师长邓锡侯住重庆，也派人前来招抚土匪。适重庆袍哥唐绍武亦

①邹隐樵，宋君良：《邓国璋其人》，《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②《龚渭清自传》稿本。

到綦江与袍哥土匪接洽买卖军火，力劝其接受招安。邓国璋率部开往江北，接受邓锡侯的整编，委任为第三师独立第二团团长。

1923 年春，邓国璋奉命参加邓锡侯、陈国栋与刘成勋、但懋辛的混战，在成都附近石板滩，与但懋辛部主力交战，一触即溃，官兵星散。邓国璋后向邓锡侯哭诉失败经过，邓锡侯抚慰他，同意保留他团长职务，要他设法收集人枪，委以官职。邓国璋回营后，与龚渭清等人商议，决定派李德发、龚渭清去永川东西山收编该处的五、六千溃军及枪弹。李、龚将收编回的人枪，分头设立一些边棚。他们都是惯匪，势力发展很快，李德发像有人枪三、四百，龚渭清有百人左右，手枪就有五、六十支。后来龚渭清又与周云清火并，得人枪七、八百。邓国璋部在永川陈食整编时，已拥有一千三、四百人枪，邓自称旅长，以李德发为第一团团长，龚渭清为第二团团长，电报第三师师长邓锡侯，请派员点验，分别予以任命。邓锡侯回电慰勉，并要邓国璋伺机夺取城市。11 月邓国璋率部入永川城，利用县人名义，急电邓锡侯，让其留住永川。邓复电同意并正式任命邓国璋为四川江防军第一旅旅长，李、龚二人为团长。

1924 年，北洋政府曹锟、吴佩孚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拥有十五、六万之众，于是野心勃勃，进行“统一”之战。川黔军阀在渝组织联军反杨。邓锡侯电令驻永川的邓国璋旅对大足杨森军截击，邓国璋于 1925 年攻占大足邮亭铺后，继续推进，夺取郫县、灌县、崇宁、彭县、新都五县防地，升任江防军第一师师长，并饬令驻防郫县、灌县，后又有松（潘）、理（番）、茂（汶）等地。龚渭清升任旅长，驻郫县。

龚渭清在郫县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至四十多种，如感情

捐、板门捐、烟捐、油捐、摊担捐、红灯捐、懒捐等，田赋预征到 1979 年，即强行预征五十年，真是骇人听闻！于是民怨沸腾，新场民团张云卿、太和场民团范通等，相约成立“农民自卫军”，设总指挥部于新都，掀起抗粮、抗捐的斗争，农民军将县城围困了四十八天。邓国璋、龚渭清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邓国璋被迫将龚渭清和县长调走，并达成如下协议：一、撤销征收二十万元军费的命令；二、废除苛捐杂税，五年内不预征田赋；三、对死难农民军进行抚恤；四、县政由军、政、农（实为地主）三方面协商解决；五、他县农民军回县。后来绅粮们以抗捐目的已达到，农忙季节到来为理由，解散了农民军，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结束。

1931 年春，邓国璋等在郫县太平寺受训，接到其团长杨抚权（兼松潘屯垦司令）的密信，陈报派兵“援甘”，向甘肃扩张。于是邓国璋向军长邓锡侯建议出兵占有甘肃，进而图谋宁夏、青海，囊括全疆。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邓锡侯赞同，邓国璋任二路司令，龚渭清为“援甘”第一支队长。部队出发前，江防军总司令黄隐命令龚渭清团暂去茂县开金矿。尔后龚脱离了邓国璋的节制。

邓国璋等向陇南进军，占领文县、武都，进攻天水。因部队纪律太差，指挥不灵，被甘军击败。邓锡侯、黄隐再三电催率部回四川江油中坝集中待命。“援甘”军到达中坝后，旋即由黄隐宣布邓锡侯令，以不服从命令，克扣官兵粮饷等罪，免去邓国璋职务。后经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彭诚孚从中牵线，刘文辉委邓国璋任独立十一旅旅长之职，在重庆白市驿成立旅部。

1932 年 10 月，在“二刘大战”中，刘湘部潘文华师与邓国璋旅接战，经唐绍武的劝说，邓即率部投向刘湘。后邓国璋任

灌县时，策动刘文辉宪兵司令彭诚孚倒戈，邓国璋与彭诚孚系属旧好，经派员商洽，彭遂表示反戈。彭被邓策动反戈，对刘文辉震动很大，致使全线动摇，军心涣散，败退西康。至此，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大混战宣告结束。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境内，龚渭清奉命调昭化，升为28军第7混成旅旅长，对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邓国璋也奉命率师参加与红四方面军作战。1935年红四方面军逼近江油县城，邓国璋师在江油阻击被打败，红军把江油县城团团围困。龚渭清旅奉命增援也被红军打败。龚右腿中弹负伤，锯去右腿，从此成了“龚跛子”，只得脱离战场和军队生活。后任新九师挂个副师长空名，实际上在成都做生意，投资企业。邓国璋也与唐绍武相互勾结利用，做军火生意和吗啡生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邓国璋师开赴前线抗战。但邓本人因病未赴前线，却利用该师出川之机，贩送鸦片、吗啡到汉口出售。

1941年，潘文华部师长陈兰亭到成都，和龚渭清等组织袍哥“蜀德社”，推陈为社长，龚为副社长。初仅一百多人，逐渐增多，最多时有二百多人。1949年，龚渭清跟随邓锡侯参加起义。①成都解放后，邓国璋回到永川，向公安局登记，后病死。②

羊仁安，四川清溪县（今汉源县）富林镇人。清末，四川袍哥盛行，羊仁安由张兴海张大爷栽培，嗨袍哥，不过一年由六排嗨到大爷。离富林镇不远的大渡河边，有个姓周的财主，

---

①《龚渭清自传》稿本。

②邹隐樵、宋君良：《邓国璋其人》，《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养了个童养媳视如猪狗，百般虐待，张兴海看不过，说了几句，姓周的反唇相讥。羊仁安认为拜兄遭人欺负，便号召本堂口的兄弟伙要为张报仇，找周械斗，周回信奉陪。械斗那天，羊把对方打死一人，伤数人，还烧了几间房子。姓周的买通官府抓人，羊仁安、张兴海只好“跑滩”。这时，峨眉山区有个浑水袍哥杨升南，有人枪百余，拖了几个棚子，张、羊一伙人就投奔到那里。杨认为羊仁安是条汉子，盛筵招待。羊见杨大哥很够朋友，也就落草，在峨眉金口河、皇木一带干起抢劫勾当。

清吏探知羊仁安一伙逃到峨眉山区，并已下海为匪，派出官兵配合当地团防清剿。官军人多枪好，杨升南、羊仁安败下阵来，带着十多个弟兄落荒而走。在逃跑中，杨升南被打死，张兴海不知去向。后羊仁安逃到马烈场茶馆吃茶，又被官军发现，他一头撞进了店主女儿闺房，店主女儿将他藏在床后边，逃过了追兵。此女后来嫁给羊仁安，取名“羊本玉”。她在汉源一带也大大有名，算得上是个“孙二娘”式的人物。

不久，羊仁安还是被捉住，押送清溪县由知县钟寿康审讯。他一概承担，毫不拉扯他人。袍界中人认为他不失为一条好汉，便串同县中士绅写公禀，说他年轻有为，可否赦其既往，准其戴罪立功，报效朝廷云云。这时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锐意经边，到处架设电线，严令清溪县在半月内供应三百根电杆。钟知县正为此事作难，见公禀，许羊仁安办好电杆，前罪一笔勾销。他出狱后，向全县公口“拿上服”，请兄弟伙“搭手”，不到十天，三百根电杆整整齐齐地运到县城。当时羊仁安叫“羊锡智”，钟知县给他改了个名字“羊清全”，说是全靠他办三百根电杆，保全了他这个“清官”，还希望他为保全

清溪、保全大清出力。钟知县后札委他任团练局队长，让他去训练乡勇，保卫地方。

辛亥同志军起义，滇军一营进宁雅地区，在雅安附近被罗子舟（罗八千岁）的袍哥队伍攻击，颇有损失，准备撤回云南。羊仁安拿出几千块钱，换得一、两百支枪。从此，羊仁安在富林一带办团、讲袍哥，声名渐起。这时，建昌汉军统领马寿臣到了富林，羊仁安供应无缺，马认为这是患难知己，给他送一别号“仁安”，以后他就常用这个名字。

民元，尹昌衡西征，羊仁安在征调乌拉、供应粮食上为尹出力，得到尹的接见。1914 年张毅任川边镇守使，爆发了陈步三之变，羊仁安一面帮张毅的边军旅长兼讨逆军第一支队司令陈遐龄，一面又以袍哥的身份向陈步三暗送秋波。1917 年，陈遐龄出任川边镇守使，与守宁远屯垦司令靖国军第 17 军军长张煦争夺地盘，激战于富林一带，羊仁安正式充任陈遐龄所属边防军第一支队的运输大队长。战后，被收编为营长，受边防军汉军统领陈显良统辖。不久，汉军统领撤销，羊改为边军独立营营长。1918 年在整编边军为四个步兵团时，以羊仁安为第四团团长。1920 年，陈遐龄扩充部队为四个混成旅，又将羊仁安升为第四混成旅旅长。

1924 年春，川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趁陈遐龄北上洛阳向吴佩孚求援之际，派第四师师长蓝正钲、第七混成旅旅长蓝文彬攻占雅安、泸定等地。刘成勋劝羊仁安弃陈来归，羊答复：我们袍哥供的是关二爷，讲的是仁义。姓羊的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决不掉底，卖主求荣的事不干。这一带的船家多是羊仁安的拜弟，对水性和地形熟悉，羊仁安把这些兄弟伙请来，饮以牛酒，然后载着士兵从几个渡口偷渡反攻，打得二蓝溃不成

军。蓝文彬旅见事不妙，仓皇逃遁，投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去了。

1925年春，杨森发动“统一之战”，边军支持杨森，羊仁安进驻宜宾，犍为一带。杨森败逃，羊也退回雅安。

川边镇守使撤销，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稍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所有边军均归统率。后二十三军被二十四军刘文辉吞并，边军归二十四军统率。羊仁安被编为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冷寅东下第十一旅旅长，下辖邓秀廷、蒋如珍两个团和另外两个营，仍驻西昌。

此后，发生了羊仁安、邓秀廷与蒋如珍火并，羊、邓将蒋杀死，部队由孙子文收编，蒋在盐源、盐边垄断食盐，买卖鸦片的不义之财为羊仁安所得。蒋如珍被杀，引起刘文辉不满，所以当云南的胡若愚与龙云争夺云南省主席宝座时大动干戈，刘文辉支持胡若愚，战至宁属会理一带，欲北上西昌，挤掉羊仁安。龙云尽量拉拢羊仁安，送给他一些机枪、步枪，更引起刘文辉的不满。后刘文辉以刘元璋为川康边防司令，给羊仁安一个副司令名义，毫无实权，最后他只好回老家去了。回老家后，专门讲他的袍哥，在宁、雅两属开了好几个山堂，收了无数兄弟。没有几年，那一带的袍哥舵把子几乎都是他的拜弟，掌握着很大部分社会黑势力。①

（四）从军官到匪霸

金堂的赖金廷，与上述土匪不同，被军阀招安委为营长后，又呈请辞职，回家拖棚子，当匪霸。

赖金廷字国英，1877年（光绪三年）生于金堂县红瓦店四方碑双礁子（现成都市青白江区日新乡四方大队二队）。父死

①吴剑洲、奋斋：《宁雅闻人羊仁安》，《龙门阵》1989年1期。

后，随母迁康家渡（现祥福乡）佃田为生。但赖金廷好逸恶劳，不安心务农，跟着三哥赖熙（土匪）嗨袍哥。后又跟他叔父赖开太（匪首）放过牛，暗中参加抢劫。不久投靠叔伯姐夫彭执其（匪首），从此公开抢劫。由于赖金廷胆大妄为，动辄冒险亡命，为彭所赏识，被提为管事。彭拨枪十多支给赖，成为分棚舵把子，很快发展为拥有人枪近三百的大股匪。

辛亥革命后，各地土匪日益猖獗，以金堂县来说，先后有赖金廷、赖合山、蒋炳南、解伯衡、黄子昭、苏传文等，都是拖棚带队，称霸一方的股匪，其中以赖金廷发展最快，势力最大。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相互争雄，抢夺地盘，都采用招匪成军的手段，扩充武力。1922 年川军刘斌师长派人招安彭执其，彭讨价过高未达成协议。同年军阀杨森部第六混成旅旅长乔仲权对彭招安成功，委彭当了第一团团长，赖金廷、赵华山、康绍文等分别当了营长，赖金廷营中小股匪首何锡珍、何子丰、赖昆等分别任连长，部队驻扎广汉。赖金廷被招安后，恐怕把自己的本钱弄掉，背地里将好的枪支悉数埋藏在康家渡老巢以留后路。赖上任七、八个月，匪性难改，嫌部队纪律约束，钱不够花，眷恋抢劫生涯，乃呈请将营长职务交侄儿赖绍尧继任，保住人枪，自己回老家拖棚子，重操旧业。他逐步扩展实力，抢劫范围也遍及昆河、中河、北河南北地区。

当时赖匪的各分棚经常抢劫之处有：去成都的倒碑坊，去唐家寺的蔡家庙，去新都的桂登铺，去中江的风洞子、老牛坡，去德阳的爪龙溪，去广汉的花牌坊，去简阳的云秀、新观音，去淮口的三王庙、滴水岩等地。拦路抢劫时，起初仅限于银子及行商的货物，后来不分对象，只要身上有几吊钱的过路

行人都要遭殃，甚至连读书的学生也不能幸免。

赖金廷利用四川军阀连年内战，大肆购买枪械，收买走卒，扩充力量。他先后在新都桂登铺、倒碑坊、高堵桥等处多次寻找机会，截击各军阀的溃散官兵，收缴了各种枪支四百多。后来遇上败军，就想吃掉，如在广汉连山镇附近，见某部军队从前方溃退下来，即率领匪徒拦腰截断，打了一个上午，赖匪先陷于重围，坚持到下午，各路匪来援救他，才将这支军队击溃，事后分得百多支枪。至此，赖金廷已有手枪三百余支，步枪千支以上，分棚十几个了。

往后，他又与新都、新场的匪首黄笨、肖德渊，金堂大小寺的土匪余耀山，镇子场通匪的袍哥大爷刘惠安等连成一气；又和金堂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匪首罗春山认作“老庚”（即同年生），还结为干亲家，继而又与川西、川北、川南三十余县大小匪首联盟结拜，互通声息，互相支援。从此，赖匪声势越来越大，就连金堂驻防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他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当时，杨秀春旅的团长许达权就与赖结拜为弟兄，真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赖金廷一伙在几年内终于成了啸聚金堂地区，滋扰川西一带的巨大匪帮。

赖金廷一伙匪徒抢劫掳掠，杀人放火，拉肥绑票，勒索银钱，无恶不作。一次在廖家场（现太平乡）红梁子将李景堂、李皋陵等四人绑走，家中细软抢光，关了四十二天，勒索大洋一千四百元。关押的地方，设在康家渡附近的黄家院子、刘家院子、草庙子、下河心等处，有专人管理，戒备森严。被掳人家不如数付款，决不放回，关押到死，死了领尸也要给钱。随着赖的实力的扩大，拉肥范围竟达到川西、川北、川南一带，对这些远方“肥猪”一般都要几千大洋的赎买价。

赖匪先后在云绣、三水关、唐家寺、新店子、石板滩、龙潭寺、赵家渡等场镇以及成都牛市口等处洗劫，甚至还妄图洗劫广汉、新都等县城。1922 年 2 月，赖匪在赵镇洗劫了巫家绸缎铺，当晚十点左右，店主巫云山出门不久，店员钟庭三刚关上门，先赶到的几个匪徒一脚踢开大门，乘势在钟头上砍了一刀，钟昏厥倒地，被两个匪徒拖出门外，扔在坝子里，其他数十名匪徒蜂拥而入，把店内所有财物抢劫一空。赖匪洗劫云秀场时，正值逢场天，匪徒乔装军队，全副武装，堂堂正正开进场内，公然在茶铺内插上军旗。等到登场时，一声令下宣布戒严，众匪逢人便搜，见货就抢，连红灯烟馆内烟斗中挖出的烟灰都抢走了。赖匪在抢劫中，只要遇到阻击，就杀人放火。一次赖在西河场绑票与团防遭遇，受到阻击，赖就一连烧了几个院子。1925 年，赖匪手下的头目徐宗顺（绰号徐瓜娃）率众洗劫赵镇。入夜前，先派人到城隍庙杨家茶馆放火，制造混乱，以便趁机抢劫，因被“门户练”发觉未得逞，心怀不满，半夜，徐又率匪徒前往，路经冯家柑子园，正遇“门户练”一班队丁围桌打牌，乃乘其不备，将队丁全部乱枪打死。徐匪等从清平街进场时又碰上“门户练”未能进入，盛怒之下，放火烧了廖、范两家民房。后又到篦子市一带，把薛家院子和篦子市民房点燃，顿时火光冲天，篦子市一带房屋一宵变为灰烬。第二天，驻军派兵去老牛坡追剿，匪徒尚未离去，打死了一些。同时赵镇团防和姚渡保安又合击了云绣赖匪部的一股匪徒，赖大发雷霆，立即派人去烧了赵镇所辖的菜坝。一个好端端的场镇，就成了一堆堆的瓦砾。

1925 年，杨秀春旅驻防金堂时，准备对赖金廷的老巢进行清剿。清剿前，还编出歌谣：“三岁孩童，七岁匪，八十老翁

坐地分肥”，把整个康家渡说得没有一个好人。不久，便打着“清乡保民”的招牌，沿着康家渡大路分兵进剿。赖金廷则利用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避实击虚与之周旋，在逐鹿中吃掉部分军队枪支，然后又分散逃跑。军队吃了亏，就向人民泄愤。一次借口清视线，竟下令砍光竹子树林，更有甚者，莫过于借口不让土匪立脚，丧心病狂地实行残酷的“三完四光”政策（即树子砍完、竹子砍完，坛坛罐罐打完，大小猪杀光，鸡鸭鹅兔吃光、蔬菜扯光，院子烧光），遭殃受害的全是康家渡一带的贫民百姓。所以老百姓一听说部队要清乡，就吓得背井离乡逃走一空。

杨秀春的清剿政策失败后，乃决定招安，实行以匪治匪的方针。1926 年，杨秀春委任他的团长许达全做金堂县县长。许上任后遂派营长陈洪宾与赖金廷、罗春山商谈成立“联合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联合团”的给养，由地方附加田赋来负担。赖、罗一伙，认为有利可图，于是积极筹备，协商划分防区。最后决定：城厢、绣水、姚渡、玉虹、清江等平坝地区划为一个辖区，由联合团团长张执中（未负实责）、副团长赖金廷直接管辖。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乡丘陵地区，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金廷指挥。两辖区赋税，各收各用。许达权为了进一步施展笼络手段，又与赖金廷结拜弟兄。一伙打家劫舍、荼毒生灵的匪徒，一跃而为官府的座上客，“保卫桑梓”的民团了。这是赖金廷势力的极盛时期。

这时，赖金廷能调动的人枪约七千多，经常在身边的也有一千多人，马十多匹。赖金廷有了权势后，在其管辖区内，封官设职，委派胞弟赖合山为手枪大队长，亲信赖昆山、赖淑芬

为大队长、马枪队长，而且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兵工厂，设立监狱，修建了阅兵台，俨然像一个割据的军阀。赖还委官收税，税名税额随心所欲。除田赋附加税外，尚有什么保商税、耕牛过境税、商船税等名目。田赋预征到1973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整饬“联合团”队的军容，匪徒也仿照军队装备，头戴白边军帽，身穿绿色军服，腰系弹袋，左碗右壶。赖金廷踌躇满志，择吉日于八月初一日到“联合团”走马上任。他以赖国英名义发布公告，禁止在辖区内抢劫，违者格杀勿论！竟也杀了几个闯进他辖区抢劫的小匪。但赖合山等仍暗地在外抢劫拉肥，他就睁只眼闭只眼坐地分赃。1929年，赖金廷火并罗春山后，还杀了与他结过盟的黄笨，权势更甚。

邓锡侯、杨秀春对赖金廷原有两种打算，一是招安，可以扩充军队；二是利用袍哥来维护地方秩序。但赖对邓、杨颇有戒心，不接受招安，于是乃用第二种打算，以袍哥维持治安，利用赖的声势将金堂长寿山、万年山、飞龙山的袍哥拉拢，成立“三山”总社，名为“忠义公”，由该部团长、金堂县长许达权坐堂，赖金廷稳舵。

一次，赖金廷传堂“忠义公”通山大会，城厢遍街都是赖的兄弟伙，到处鸣枪，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杨秀春叫赖制止，赖不仅不听，反而冲着杨说:“袍哥不要枪炮，难道要剪刀”？杨听后极为不满，认为赖金廷非但不能利用，已无法控制。时川西几县士绅正以不堪匪患滋扰联名向邓锡侯请愿，呼吁对赖采取措施，并指出成立“联合团”的做法，实为栽林养虎。邓乃决定“顺乎民情”，以四旅兵力，对赖金廷进行彻底清剿。邓出动第五混成旅谢德堪部扼守镇子场，第七棍成旅李树骅部控制新繁班竹园一带，第一混成旅杨秀春部及第二混成

旅陈静珊部担任主攻，将赖金廷包围于昆河地区。这时赖金廷察觉自己已被围困，打算藏枪外逃，但赖合山力主应战。最后，赖金廷也下定迎战决心。1930 年 3 月 25 日，杨秀春旅所属许达权团率师出城厢南门，经绣川桥到达姚渡，杨秀春率主力经陈家巷、瘟祖庙到达青龙桥一带，布下包围圈。杨旅的叶政营早驻龙王庙。陈静珊旅所属陈煜生团到达新都新场张家庵一带。陶楷团由广汉经三水到达狮子桥，完成第二道包围部署。赖金廷一伙也相应安排了一个内线作战方案，趁部队尚未完成部署，提前主动进攻突围。当夜，赖合山率领赖淑芬、刘春华、谢大神等二百余匪徒，出其不意奇袭了龙王场的叶政营地。首先点燃营房，然后集中火力猛冲猛打，叶营官兵从沉睡中惊起，仓皇应战，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营长叶政、连长张柱林相继阵亡，全营溃退。次日上午九时，大部队始向赖全线进攻。赖率主力首先向杨秀春部反击，杨不能抵挡，节节败退。在退却时，杨秀春险被击毙，逃入县城不敢出来。赖不失时机地将主力转向新场陈煜生团进攻，双庙子一战陈团一触即溃，直退至新都城郊福禄寺才稳住阵脚。陈静珊旅的陶楷团从狮子山推进到壁山头，听说杨、陈两线失利，亦不敢前进，只得撤回广汉。包围歼灭赖金廷匪部于昆河地区的计划遂告失败。

赖金廷击败邓锡侯的围剿后，乘胜于当夜突围，倾巢投奔德阳、罗江一带驻防的黄正贵师。路经大小寺与余跃山匪部汇合，拂晓抵达官仓。在官仓遭到驻军及团防阻击激战两小时后，继续向德阳方向逃窜。杨秀春旅许达权部于 3 月 27 日会同陈煜生团进驻康家渡赖匪老巢搜索残匪，把赖金廷的油坊、碾子、院子（还有其他的院子）放火一烧而光。杨、陈二旅主力

仍向赖匪跟踪追击，新繁李树骅旅亦挥戈向北截击。此时邓锡侯下令所属川西各路驻军阻截，并通报各友军，特别是二十九军协助围剿。二十九军第五师师长黄正贵过去与赖交往甚密，此时不敢收容掩护，也只好下令宣布戒严，并作出阻击姿态，于是赖匪就走投无路了。

赖金廷知道大势已去，欲改逃茂县，又听说该地驻军也出动迎击，旋决定经由丝瓜架、木瓜坪、红白场窜往北川。邓、杨分析敌情后，也料定赖匪必往北川一带落草，遂通令沿线驻军阻截，并在必经之道红白场部署兵力，严阵以待。赖匪抵达红白场，埋伏的部队枪声齐鸣，赖匪伤亡甚大，拟绕道距红白场约十里的桥头通过。殊知杨秀春早派钱关喜连先期赶到，进行封锁。当赖匪众进入射程立即遭到火力狙击，无法通过，再次受挫。此时赖匪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匪众大乱，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四处逃窜，赖金廷经营多年的土匪队伍就此土崩瓦解。赖本人穿越山林逃窜，与赖合山失散，身边只有七个人，躲在荆棘丛中不敢露面。几天后，才从山沟偷偷跑出来。拂晓时行至绵竹县北三十里拱星乡烧龟滩处，饥饿难受，几个匪徒正挤在一起吃汤元，突闻碉堡内团丁呼问:“干啥的”？匪徒吊儿郎当地回答:“做人的”。言毕，只听一声枪响，子弹正中赖匪太阳穴，这个危害人民几十年的巨匪当场毙命。

赖匪被击毙后，红白场逃散的溃匪，纷纷向德阳黄正贵师投奔。赖合山向黄求情，收容骨干数十人，其余统统缴械作为俘虏，换上军装，集中待命。邓、杨得知情况后，移文索人，黄不得已，乃变换手法，宣布愿回金堂者报名，不愿回家的留下当兵，当即有八十九人自愿回家，内中只有四名是康家渡的惯匪，其他的多是在赖匪逃窜时被裹胁前往的团丁或强拉去当

足伏的贫苦农民。当杨秀春派兵来时，黄便将这批人交出，押回金堂后，杨不问青红皂白，于农历四月二十八、九两天分批在金堂城西门外、南门外大批处决。这批人在押赴刑场途中大喊冤枉，死者父母痛不欲生，一场浩劫化为两家冤魂了事。邓、杨怕残匪潜回康家渡伺机东山再起，旋令团长陈相楷督办善后。陈为“教育”乡民，制定“教令”六十多条，强令背诵，不会背者则打手掌三个。同时又训练所谓挨门丁，实行联防。1931 年春，杨秀春还悍然下令拆毁有数百年历史的康家渡场镇，将材料运往城厢外北八华里处修建新镇大同村，以图绝灭祸根。可怜康家渡居民只得扶老携幼到处投亲靠友，无依靠的只有在附近搭棚子居住。老百姓编有一首歌谣，描述这场浩劫：“匪如梳，团如篦，官兵就如刀子剃”。直到四年后的 1935 年才又重建康家渡，更名为祥福乡。①

①金堂县政协：《金堂巨匪赖金廷一伙始末梗概》稿本。

十九、匪头强占土地和投资企业

民国时期的四川，土匪的抢劫活动日益猖獗，造成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耕地荒芜，地价下跌。如广汉，“在众多匪徒分乡分片抢劫之后，不但富户、中户人家无一幸免，即贫穷佃农，也在被他们挨户搜劫的行动下一同被劫。有许多地方，抢了一次又抢二次、三次，不但贵重财物被扫光，即粮食、锅碗小东小西，也被一齐运走。‘肥猪’已不择肥瘦，只要坐的瓦房，在匪徒来抢时没有逃脱的人都被拉去。以致有些‘肥猪’久关无人来取，或发觉事主实在拿不出钱，匪徒怕白垫伙食，降价至十元、八元一个也卖。就在这种情况持续之下，1920 年以后，广汉各乡做庄稼的人，（包括贫、下中农）因猪牛被拉，农具粮食也被劫夺的关系，无法耕作，也无人愿意做活，有的全家搬迁外县，有的远出劳力贩贸。而留在本乡的青壮年又大都参加当匪，以免被劫和维持生活。于是田园荒芜，在县境广大肥沃的田地里，长满了乱草，很难看见几块稻麦作物。有些田土，因多年未耕，竟致长起了树木，甚至有的树木已有碗大。劳动人民世代辛勤开拓耕垦出来的米粮产区，已回复到原始荒漠的状况。”“这时广汉的田价大大跌落。因为农民不耕田，地主无法收租，也无力缴纳田赋，于是他们就纷纷卖田，

想把粮税转嫁别人身上。出卖的多，买入的少，田价原卖一二百元一亩的，逐渐下跌得几元一亩”。[①]这种状况，其他县也有类似的，只不过没有广汉那样典型。如隆昌、荣昌、内江一带，1936 年记载说：农民“纷纷拍卖田产，去年每石租之田价由一百元降至四十余元，亦无人接受承买”。[②]四川农村地价的下跌，为军阀、官僚和土匪头子掠夺土地提供了条件。

民国时期四川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匪帮头子与军阀一道兼并土地，他们既是大土匪，又是大地主、大恶霸，有的还是大资本家。这也反映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匪帮头子的特点。

匪帮头子用于兼并土地和投资企业的钱财，大多来自抢劫和经营鸦片销售，也有的来自私设税收和敲诈勒索，都是非法所得。

川北的大土匪、大袍哥、土皇帝黄清沅，“其父留下的财产，仅薄瘦田地二十八亩，破房七间，父母兄弟姊妹九人，糊口尚有困难。但到 1948 年，黄清沅本人的私有财产（不计算兄弟分家后的财产）有：

1. 出租田地四千一百余亩，分布在梓潼、盐亭、剑阁、绵阳五个县。

2. 厂矿财产

（1）铁矿山三处：江油泗水坝一处，鸡察沟一处，青林场一处。

（2）铁锅厂两处：马角坝一处，梓潼青龙场一处。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6 辑，第 90—91 页。

②《四川没落之现状》，《四川经济月刊》第 3 卷 3 期，第 12 页。

（3）水碾水磨六座，并承包了全区四个乡水碾水磨三十二座，粉房四座。

（4）纸厂一座。

（5）裕华纱厂搭股。

3. 开“本利昌”山货铺，经营鸦片烟、皮毛、珍贵药材、大百货，甚至还搞枪支买卖。

4. 开茶楼、饭馆、旅馆各一处。

5. 霸占林木和公产

（1）假以县管公产为名霸占广林寺、少教寺、白马寺、山神庙四处庙产，有庙房三十余大间，土地百亩和林木五十多亩。

（2）裴姓家的公产房屋，梧桐树，柏树、杉树等三千多根。

（3）广林寺附近邱姓、王姓、贺姓、陈姓、胡姓山林树木，山上山下约五、六百亩。

（4）毛家沟李姓山林约一千余根。

6. 收斗行杂捐。全区牙厘金，黄清沅向县承包，一千石黄谷两三千银元，而每年平均实收万石黄谷万余银元。

7. 修楼堂馆所

（1）1933－1935 年强迫全区农民砍伐公产树木修建黄公祠。建筑面积三千五百多平方米，全部是庙堂式的，画栋雕梁建筑三十多间，房高十五米（低的十米）。

（2）黄清沅公馆（新修的家庭住宅），黄清沅全家共有一千六百多平方米，大小四十八间，房屋高敞，二楼一底。

黄清沅一家占有房屋建筑面积七千八百平方米，相当于解放时梓潼城区半个县城的建筑面积。其中大部分是敲诈勒索，

低价逼卖给黄清沅的。”①

川西崇庆所谓“元通国”的黄匪帮也占有大量的田地房产、商号、水碾，概数如下。

1. 关于田地房屋：

黄泽溥　田 764 亩，房二座，街房二五间。

黄泽恩、黄光华　田 390 亩，房一座，街房五间。

黄泽寰　田 450 亩，房一座，街房一八间。

黄光辉　田 340 亩。

黄泽霖　田 970 亩，房二座。

黄泽荣　田 500 亩，房一座。

黄泽民　田 100 亩。

2. 关于商业：

水碾 48 座，字号三，钱庄二，药铺一。

3. 关于工矿企业：

锅厂一，纸厂一、木厂一，炭厂一。

4. 关于投资：

崇庆县水电厂、火柴厂等。至于成都和各地投资未计入在内。

此外，还放高利贷、巧立名目，收苛捐杂税等等。②

金堂匪霸赖金廷、赖合山，“在辖区内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买田置地，开油房，造新屋。新屋落成之日，杨秀春、许达权等官员以及各路袍哥土匪头目等均亲临贺喜，敬送匾

①梓潼县政协文史组：《川北土皇帝——黄清沅》，《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187—189 页。

②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第 175—178 页。

额”。[①]

当时人称“冷大王”的土匪头子冷开泰，在从事抢劫的同时，就贩运鸦片出卖，大发横财。开始从宣汉南坝场运“南土烟”至成都出卖，每次数额达几十挑之多，至少也是十余挑。后来贩运鸦片到省外汉口、宜昌以及湖南等处销售。1935 年就任成都、华阳两县“土行经理”，获得以专销鸦片的特权。到 1937 年，四川省政府改变烟土购销办法，才撤销了土行。

冷开泰在土行撤销之后，就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行号，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活动。

1. 开办恒泰字号

1939 年春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元，地址设在成都北新街，冷开泰任总经理，经营业务除存放款和投机买卖外，则是贩运鸦片出卖。后因亏累甚大，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前后仅一年多就宣布结束。

2. 组织西宁公司

1940 年 5 月正式成立，公司全名叫“西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二百万元，总公司设在雅安，于成都、富林、西昌、昆明等地设办事处，冷开泰任运输部经理，经营垦荒、殖边，开发西昌、宁属地区，以发展西康的经济，运输业务除运送本公司货品外，还代客商承运货物，依靠袍哥、土匪进行。由于西宁公司人事派别复杂，内部矛盾很多，业务不断亏本，仅经营年余时间，即行解体。

3. 组织蜀和公司

1942 年组成，资本八百万元，地址在成都华兴街黄石子公馆，冷开泰自任董事长，业务范围主要是：（1）存放款，

①金堂县政协：《金堂巨匪赖金廷一伙始末梗概》稿本。

（2）代粮食部运输粮食，（3）购买川省红白糖、叶烟，运销陕西。后因冷惯于挥霍，用钱无度，公司周转不灵，到 1946 年信誉扫地而关门。

4. 组织汉华公司

1946 年春成立，资本千余万元，地址在成都西御街邹善成（即土匪头子善成）宅内。冷开泰自任理事长，邹善成任监事长（后邹与冷闹意见，不愿作监事长，由申介屏继任），业务主要是存放款。后伪法币疯狂贬值，公司的股金、存款，用复利计算偿付，每股也仅能一包香烟，汉华公司也跟即垮台。冷开泰成立的汉华社袍哥组织设在汉华公司内，这是他经营之主要事业。

此外，冷开泰还抢占有大量的土地，仅 1940 年抽恒泰字号资金在崇宁县私置田产达二百余亩。1945 年以后，在成都东胜街新建的一座新颖华丽的大公馆，当时估价为 19 亿元。①

与冷开泰合伙经营汉华公司的邹善成，据他的口述《自传》："土改前有田地三百余亩出租，及房产数十处。……合伙开办福川银行，其他银行也有股份，还和朋友开办通利企业公司等"。"历年靠做鸦片烟生意为大部经济来源。……买田的钱是当土匪时留余的和当军官贪污的一部分"。②

解放前四川有名的大袍哥、大土匪、军官龚渭清，在新津有田 40 石，新都尾河有田 114 亩，新都沙王庙有田 49 亩，在成都春熙路、暑袜中街、天星桥、青莲巷、布后街有房屋数十间，与陈登甫开办亚兴银行，与张民岩等组织茂业字号和华孚银行，与蓝光渠等组织复昌猪鬃厂，任蜀一电影院的董事长

---

①侯少煊、熊倬云：《土匪起家的冷开泰》稿本。

②善成口述：《自传》稿本。

等。[①]

上述事实说明，匪帮头子兼并土地和投资企业，具有普遍性，这是值得研究的。

① 《龚渭清自传》，稿本。

二十、土匪的火并

民国时期，土匪相互火并，寻仇报复，抢夺“防地”，大匪吃小匪，本地匪吃过路匪的争斗，也经常发生。其中许多演变成为土匪战争。

1923 年，双流柑子树场镇的李安邦，与刘家壕的黄瞎子进行“柑子树袍哥打仗”的火并事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匪战争。

双流柑子树场镇位于金马河旁，是土匪李安邦的“防地”。溯金马河上约廿里便是刘家壕，是属于袍哥舵把子黄瞎子的势力范围。黄瞎子是清水袍哥，但他的兄弟伙有些是浑水袍哥，而且慓悍亡命，如吴歪嘴、雷大马刀、张吉三、苏尔黄等都是有名在案的巨匪。

事件的起因，是吴歪嘴带领土匪在李安邦“防地”抢劫军俩刘成勋部队一个团的枪支，弄得柑子树全场大乱，商店关门，引起李安邦的不满。接着，黄瞎子又提出要在柑子树场镇成立团会（码头），李安邦知道黄瞎子是要抢夺他的“防地”，便加以拒绝。

1923 年 11 月（民国十二年十月）黄瞎子串连了十二个袍哥舵把子，号称纠集了二千多人枪，准备袭击柑子树场。李安邦

事前得知消息，也约集秦月州（绰号秦胡子）、陈吉三、吴炳文、吴小丰、骆孟阳（温江团练局长）、白绍坤（崇庆县团练局长）、岳崇仙（新津舵把子）、杨栋臣（花园场舵把子）、姚树廷（华阳县舵把子）、邹善成、陈斌武等共约四、五千人枪，并推举秦月州为总指挥，准备黄瞎子来攻打柑子树场时，直捣刘家壕黄的老巢。

起初，黄瞎子见势，抵不过李安邦，便派苏尔黄为代表，出面交涉议和，李同意罢兵。殊知黄瞎子议和是假，缓兵是真，待李人马撤退时，黄便卷土重来。黄瞎子、吴歪嘴带领土匪冲过金马河，封锁石桥，直攻李安邦住地永泉寺。李自撤退后，身边只有百人左右，在枪声四起中仓皇退逃。黄等追赶十余里，李安邦才遇军队接应，李逃脱。黄同军队接仗后，率部退至机投桥、龙爪埝一带潜伏，不久黄、吴二人下落不明，其余十一个舵把子，经骆孟阳用招安办法，于席间将他们当场击毙，并把潜伏下来的兄弟伙围歼，逃出者很少。

被击毙的十一个舵把子中，就有温江有名的舵把子张达三，这时已堕落为巨匪，有人枪数百。他的表弟李绍湘、李绍全是李家钰的军官，深恨骆孟阳不择手段、心毒手辣，将张达三等人杀死，遂萌杀骆之心。1926年邓锡侯部骑兵团团长谢德堪驻防温江，骆孟阳任温江团练局长，为谢筹饷卖力，彼此要好，谢请骆去成都游玩。骆自知为匪多年不敢去，谢有部队驻成都，拍起胸膛担保安全。骆到成都后，为李绍湘、李绍全弟兄发现。一天骆在总府街凤祥银楼门口被二李枪杀，为表兄张达三报了仇。后二李以李家钰边防军总司令名义，在骆尸体前贴了一张告示，说骆是温江巨匪，特予枪毙。谢德堪认为李家钰扫了他的面子，要派兵攻打李家钰总司令部，双方警戒了一

天，成都东面商店大半关门，好像要发生巷战似的。这便是柑子树场土匪大战的余波。[①]

1929 年金堂匪霸赖金廷与金堂另一巨匪罗春山火并的战争，也是有名的土匪战争。

赖金廷是金堂有名的匪霸，驻防金堂的旅长杨秀春也怕他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罗春山是龙王场，红瓦店、云绣乡的匪首，和赖金廷是老庚、干亲家。1925 年杨秀春实行以匪治匪，派人与赖金廷、罗春山商谈成立“联合团”维持治安，条件是不在辖区内抢劫。由赖金廷直接管辖，任副团长；龙王、日新、云绣、福洪等乡丘陵地区，由罗春山管辖，罗任大队长，归赖指挥。后核金廷与罗春山争一散兵的新式手枪，赖未夺到手，因而对罗颇有怨气。1927 年，赖金廷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抢劫，被罗所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面前挑拨罗的是非。赖开始对罗有些不满。1928 年，严茂生（罗春山的亲信）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郊外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是金堂赖金廷“联合团”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疑为赖匪所为，乃将物证交驻军杨秀春查处。杨嘱团长、金堂县长许达权转告，并有意对赖说：“上峰原打算委你当清乡司令，看来这个局面，你也难维持了！”赖听后，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又使他失去升官机会，乃决计除掉罗。

1929 年 3 月，赖金廷掌握罗春山信佛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悬幡挂榜打“罗天大醮”，请罗申文上表，表示对罗的尊敬。罗很高兴，乃亲率林二兴等十余人前往。到达康家渡后，赖金廷假意盛情接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素来很熟，

①侯少煊、邹善成：《袍哥“三开”人物李安邦》稿本。

陪罗烧鸦片烟，罗的逗伴（即贴心爪牙）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未击中要害，又拖至天井里，把余下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他的性命。后又把罗的尸体从后门拖出放在市场坝。这时，赖金廷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倒头纸”，并吩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台盒二个，装满金银斗壳、香蜡钱纸、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的尸体回到罗家。赖金廷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做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验。罗春山的老婆非但没有计较，而且以礼相待。

罗春山死后，手下庄子才、严茂生二匪首马上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续掌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为罗报仇。赖金廷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武力吃掉庄、严的实力。是年 4 月下旬，赖集中全部力量，外调一区民团，兵分九路去龙王场攻打庄、严二匪部。这天，正是安葬罗春山的日期，刚把棺材抬出大门。闻匪徒报警，庄子才立即集合兄弟伙走了。赖金廷手下管事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赶到罗家门口，对着罗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罗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背着罗的灵牌，头上顶着钱纸，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与赖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已到达牟塔寺的赖合山部拼死命进攻。哀兵必胜，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鼓作气把赖打败。赖金廷稳不住阵脚，节节溃退。许达权部队本来是佯装支持，见赖败逃，就一枪不放，从泰山庙撤向姚渡。于是赖氏兄弟的匪军，立即全线崩溃。

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量实力不如赖金廷大，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火并，

才告停息。[①]

土匪寻仇报复，争夺“防地”、土匪吃土匪的事件是成千上万，不胜枚举。例如 1932 年，“吴二大王（据说是吴佩孚的兄弟，在北方站不住脚，带领部分人枪从甘肃到四川）路过重华，先给匪帮头子黄清沅‘拿上咐’（联系），黄清沅满口欢迎，却暗地里布置了六七十人在场口民房楼上，架上机关枪，房内可以瞄准街上，街上却看不见人、枪。黄清沅等亲自到场口放鞭炮迎接，并叫他的大管事欧欣亭喊：‘请到江西馆（场内的大茶馆）吃茶、造粉子（即哥老语的吃饭）’。吴二大王的兵刚进场内，就被机枪、卡宾枪哒哒打死了七、八个，黄清沅的弟兄伙高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就这样吃掉了吴二大王一百多条枪”。[②]再如 1928 年，绵阳土匪头子左汉章（外号“左大王”）时逢何鼎成（原系安县巨匪，被冯玉祥招安任团长，任过绵阳总舵把子，外号“何天王”）的当家三爷肖烈坐一乘四人桥，带一个姓王的随从、两个脚夫和一挑银元，一挑烟土回三台县柳池井省亲祭祖。由于何鼎成的面子，沿途袍哥码头都有花红火炮迎接，烟茶酒宴招待。肖烈由安县花荄子袍哥码头派人送到绵阳新店子，新店子码头也留宴两日，殷勤招待。新店子有个外地跑滩的袍哥廖老九对肖烈说。“有个‘对洪兴’左大王，在此地耍了几个月，人很对，是否请拜兄会一会”。肖烈自认为自己的上司何鼎成是天王，天王总比大王凶，自己又是当家三爷，是要枪耍炮操出来的，根本不把左汉章放在眼里，说：“披毛长角的野仙，叫我去拜会他？不

①金堂县政协：《金堂巨匪赖金廷一伙始末梗概》稿本。

②梓潼县政协文史组：《川北土皇帝——黄清沅》，《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185 页。

去!”廖老九把此话传给左汉章，左当晚则召集他的二十多个兄弟伙“坐堂”(开会)，以肖烈侮辱他为借口，令他的死党武茂生、钟守安率二十余人，携独子火枪、大刀等武器连夜赶到松垭，在肖烈回三台的必经之地水磨河和太平山分路处埋伏，置肖烈于死地。事后，对姓王的随从则叫他回去给何鼎成传话，说肖烈被绵州东大乡左大王拿了梁子，造了忍字，何天王有枪杆，左大王有腿杆云云。何鼎成听了报告，气得七窍生烟，大叫要捉拿左汉章报仇，食肉寝皮，并赏示手下：把左汉章活的抓来，么排升大爷，要当官的升连长，打死左汉章的么排升三爷，要当官的升排长。左汉章听到这个消息，从此隐居在灌县刁青云、什邡马伯华两个巨匪处，根本不露面，所得的大洋、烟土，一股送了人情，一股分给兄弟伙，一股自用。大约过了十年，何鼎成因病死后，这桩命案也就不了了之。①

土匪的相互火并，使得人民遭殃，成为社会的灾害。如1923年广汉土匪陈裕光（绰号“陈豹牙”）、康绍文攻打新都下东区团防的事件，是有名的使人民遭受最大祸害的事件。这是广汉匪徒们与新都团防寻衅引起的。由陈裕光出名片字样到各县招请匪队，打与康绍文有仇的新都下东区团总夏德三。什邡的匪头冯老四、冯老五，彭县的匪头何吉三，安县的匪头李磨子，绵竹的匪头谭开述、廖成谷，罗江的匪头易祖德等，一方面由于袍哥互助是所谓“义气”，而主要的是为了打伙求财，都应陈豹牙的招请，率匪队来到。加上与康绍文直接有勾结的金堂匪头彭植其、赖金廷等匪部以及陈豹牙、康绍文的兄弟伙，共计四、五千人，打出陈豹牙精心拟出的“奉天命打团

①陈永乐：《绵阳袍哥总舵把子左汉章其人》，《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第三辑，第58—60页。

防”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去攻打与广汉西区邻接的新都下东区。团总夏德三没有料到匪人有这么多，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队被缴了械，夏德三弟兄被击毙，驻军张有卓（夏请来的）营也被打垮，张营长被俘。各部匪头，名义上由陈豹牙指挥，实际上当然谁也管不了谁。他们在新都下东区的蔡家庙（现在是四川化工厂址）、唐家寺及广汉连接地区的向阳场一带大抢三日，成都到广汉的交通完全断绝。这一带居民家内的财产被扫劫一空，匪徒拉“肥猪”一千余人，并拉去青年妇女五六百人。这些妇女很多后来不从而自杀或被杀。在匪徒大抢三天当中，新都到广汉的大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周围几十里的居民都跑开了，他们扶老携幼，四处逃生，个个咒骂，惨痛难言。

匪徒抢劫之后，退驻广汉北区，在什邡、德阳、绵阳三县交界的兴隆场，金辅寺一带出卖拉到的“肥猪”，有的几百元几十元一个，有的几元一个也卖，因为他们要回原来的匪窠，地距新都远，以后事主家人不容易来取，宁愿降价出售，以免多费伙食；同时他们拉的穷人也多，实在卖不起价。他们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

各路匪徒经过一个多月才退完。在这期间，广汉和新都的驻军坐视不理，不肯去追。就由彭植其、康绍文俘获的张有卓营长，也是后来由新都地方哥老首领派人交涉，向新都全县人民筹款一万八千元，才得取回！①

①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94—95页。

二十一、控制与反控制

1933年春，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四川军阀在反革命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围攻川陕苏区。先是蒋介石任命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联合杨森、刘存厚发动“三路围攻”。6月被红军粉碎，田颂尧被迫辞职，刘存厚被蒋介石“革职查办”。后由刘湘充当“剿匪”总司令，率领邓锡侯、田颂尧、罗泽州、李家钰、杨森、刘存厚“六路围攻”，结果在1934年夏也遭到惨败，田颂尧军几乎全军覆灭，罗泽州部被消灭大半，刘湘、杨森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邓锡侯部也元气大衰。刘湘陷入困境，不得不求救于国民党蒋介石。这种形势，正合蒋介石进川之意。1934年11月，刘湘去南京与蒋介石会商，最后达成“协议”：由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剿匪总司令”，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刘湘同意蒋介石组织参谋团、别动队及少数嫡系部队入川。此后，蒋介石集团势力逐步深入四川，四川军阀统治的局面逐步解体。

蒋介石设立参谋团的主要目的：一是策划、督促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围剿”红军，消灭中共四川党组织；二是插入并控制四川，统一川政，结束军阀割据。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

率参谋团抵达重庆。3 月 2 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在四川前后住了近半年。他亲自谋划与指挥围追堵截红军，但都失败了，红军仍然长驱北上。对于川政，蒋介石提出“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转移四川风气”等主张，达到“政治中央化，川军国家化”的目的。10 月，他将参谋团改组为重庆行营，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11 月 1 日正式成立。

别动队是由蒋介石组织成立的，由康泽任总队长。它是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镇压群众运动，刺探情报。同时，监视、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和组织。1935 年初，康泽亲率别动队员 2000 余人随参谋团入川，分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公秉藩，第二支队队长马希良，第三支队队长曾晴初。别动队入川后，分赴重庆、成都、自贡、泸州、乐山、万县、达县、南充、涪陵等地。从一开始，别动队就着手抓三件事：

第一、在川军各部调整、改组政工机构。军、师设政训处，团设政训主任，连设指导员。康泽以参谋团政训处长的身份，将带来的队员分别安插到各部，计数百人。别动队在川军中一方面大肆吹捧蒋介石，宣传蒋的法西斯政策；另一方面清查在川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监视川军，特别注意刘湘等人的活动。

第二，在全省保安机关中建立政工机构。四川保安机关原无政工组织，而别动队入川后，则分别在省保安处，专区保安司令部中设政训室，由康泽派员参加。时省保安处政训室正副主任由叶维、史柏英充任；各专区政训室设中校主任一人，少

校、上尉训练员一人，文书、事务若干人。别动队想方设法控制地方武装，将各县团队分别组织总队、大队或独立中队等。由于别动队员曾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故当其触角深入到地方后，使中共各级组织、工农及学生运动受到威胁和破坏。

第三、开办各种训练班，发展特务组织。别动队首先举办保甲（壮丁）干部训练班，调各县区队附以下的各级壮丁队队长、队附等集训，以专区为单位，由专区政训室主持，为期一个月。后又调训各县、市商会、工会的理事和监事，称之为特种公民训练班。再后，还集训学生等。①康泽办训练班，目的是培养反动基层骨干，以便进一步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在训练期间，尽量灌输法西斯思想毒素，使之忠实于蒋介石及‘中央’。对其中特别忠实的分子则吸收为‘忠义救国会’会员。这些人员在结业后，既担任乡（镇）保长及壮丁队各级队长，直接统治压迫人民群众，并以这些人为骨干编组保甲，训练壮丁。这样的做法，使反革命根子到处蔓延，虽然在别动队离开以后，仍然有保安处各区政训室及当地复兴社组织的反革命领导，还是可以继续起到反革命的作用”。②

别动队入川后，在各地进行活动，对于纪律不好的袍哥军队，贩卖烟毒军火的袍哥分子，利用袍哥关系进行特务活动、刺探情报的冷开泰领导的情报处，以及农村乡（镇）保长袍哥，首先成为它打击的对象。于是，发生了袍哥与别动队的明争暗斗。

别动队以查拿共产党，查禁烟毒为名，到处任意搜查，气

①王斌：《四川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09－212 页。

②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第 94 页。

焰嚣张。刘湘部宪兵司令李根固的谍查队长、重庆义字袍哥大爷李少周，原是冷开泰的情报人员，因私卖吗啡，被别动队查出实据，将其逮捕，报经“行营”处理，予以枪决。同时又将许多违法走私及嗜吸鸦片烟的人扣押关禁。

别动队在川北前线各部队防区活动时，南部县驻军李家钰部的袍哥队伍旅长陈绍堂有烟瘾，别动队员侦知，直接闯入其旅部。陈绍堂正在吸大烟，别动队员将其烟盘烟灯端走。陈旅官兵非常激动，陈绍堂也怀恨在心，派人联络地方袍哥暗杀别动队员，暗斗激烈。①

中央特务与袍哥“土特务”的斗争，更为激烈。别动队搜集刘湘及其部队的政治军事种种劣迹的情报，上报重庆行营，采取措施，给刘湘以压力。冷开泰的情报处则注重搜集别动队在各地贪赃枉法、制造纠纷、引起军队和民众反对的情报，由刘湘上报给蒋介石，后来并直接请求调走或解散别动队。别动队依靠重庆行营及中央势力，借故逮捕情报队员。情报处则依靠川军和地方袍哥的力量，伺机暗杀别动队员。彼此之间，明争暗斗，甚为激烈，终于在1935年发生了李家钰部李注东旅逮捕康泽事件。②

据记载：“1935年六、七月间，康泽到成都趾高气扬地进行罪恶活动。住在他的妻兄朱兆南黄瓦街家里，白天夜晚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住在对面的李其相部李注东旅的官兵看不顺眼，在一天晚上，乘康泽乘车归来下车的时候，围攻他的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②另一说是：“李注东旅派人在成都行刺康泽，三枪未中，仅将康泽同车的副官打死。康泽见情况于己不利，事后未敢深究”。（见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

汽车，把他的汽车司机和卫士都捕走了。康泽在他的副官易秋素的保护下，才逃到朱家躲起来。此事发生后，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湘部属李宏锟，表面敷衍康泽，承认处分李旅肇事官兵。康打电话向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告状，贺复电叫他息事宁人，不要加深误会。康原来是一个怕死的胆小鬼，当夜虽然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严加戒备，但仍觉不保险，又连夜迁往他的安岳同乡邓锡侯所部将领陈离家里去居住。这是蒋介石的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之间矛盾尖锐化表面化的事件之一”。①

县政袍哥和乡（镇）保长袍哥，是四川军阀的组织基础，刘湘决不会轻易让别动队搞垮。记载说：“1935 年二月，四川省府在重庆成立，蒋（介石）刚到重庆，就叫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向刘湘说：‘重庆行营要仿武汉行营的先例，在重庆训练四川县政人员，训练完毕后，交由省政府以县长、区长委用。当时刘湘坚持此项训练应由省府主办，并以去就力争，结果改由行营同省府合办，由刘湘主持其事，另由行营派王又庸任该所主任，以省府秘书长及各厅处长为教官，关于法律的课程，由高等审判厅长担任，三民主义的课程，由国民党书记长担任，保甲法令，由行营派程懋型专任，并由行营派复兴社分子担任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的责任。于是 1935 年的四、五月间，在重庆成立县政人员训练所，招考学生约四百人，凡国内外大学毕业、在军政机关服务一年，或高中毕业、在军政机关服务四年者，皆可报考。开办后由邓汉祥以省府秘书长的名义代表刘湘主持一切，刘湘并谆嘱邓要用全副精神来注意此

①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第 92 页。

项训练，绝对不要受训人员走‘中央’的路子，因为要利用这些人员到基层去防制‘中央’势力浸入地方。又以受训人员全部都是四川人，邓便以地方的狭隘观念来麻醉他们，一面暗示他们一定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才会有前途，并明白告诉他们，县长、区长是由省府委派，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县长、区长。一般受训人员因自身的利害关系，当然倒向省府方面”。[①]后来，别动队也不示弱，以四川省各行政区为单位，在各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室的配合下，举办保甲（壮丁）干部人员训练班，培养反动骨干，以便打击乡（镇）保长袍哥，指使喽罗与袍哥为敌。刘湘则支使情报队员和地方袍哥力量，伺机报复。“在‘西安事变’以后，刘湘实行报复，打落水狗，刘系人员到处捕捉蒋帮所培植的喽罗，弄得这些人员无处藏身，纷纷逃到重庆别动队总队部请求庇护。总队部把这些人员收容起来，编入教导队当学兵，总人数达三、四百人之多”。[②]

由于四川袍哥的力量庞大，一时对之无可奈何，别动队也不得不退让。康泽鉴于别动队与袍哥为敌，到处难行，因而也采用一些收买拉拢利用袍哥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先后投到他部下的袍哥大爷有刘伯龙、戴绍章、王会云等。但因整个袍哥组织与别动队关系极为恶劣，积怨一时难于清除，刘伯龙等投靠康泽之举，袍哥中人均对其鄙视，因而也起不了大的作

①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9－60页。

②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94页。

用”。[1]

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蒋介石派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是为了搞垮四川军阀势力，控制川康。刘湘多年来总想独霸四川，竭力防止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四川。“表面上蒋介石说扶助刘湘统一川康，实际则企图搞垮刘湘，直接掌握川康。这个时候，刘湘如芒刺在背，时感不安。刘湘虽亦阳言拥蒋，暗中则多方防制蒋的势力进入四川，蒋、刘矛盾，因之日趋尖锐化”。[2]1938 年，刘湘病死汉口后，接着国民党中央政府迁来重庆，军统中统特务来川，采取控制利用袍哥的办法，以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达到直接统治川康的目的。川康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也利用袍哥的力量，继续进行反控制的斗争。这样，川康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之而长期化和尖锐化，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刘湘死后，蒋介石认为是拿下四川的大好机会，便马上向川康地方实力派打出两张牌：一是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二是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消息传来，引起了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文辉、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没有我们的话说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计到，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们一致反对，他就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第 59 页。

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川主政”。[①]在成都，组织袍哥反对，“当夜即在全城张贴标语，并举行游行示威”。[②]军人中由彭光烈领衔，率领刘树成、周成虎等十七名旅长联名电蒋，以张群不洽舆论，请收回成命。在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坚决反对下，蒋介石不得不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王缵绪暂代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代理省主席后，即同康泽复兴社特务和军统特务骆德荣等勾结一气，被蒋介石收买。他把每天同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密商对付国民党中央的情形详报蒋，龙云在成都商谈经过王亦尽情密报，把川康地方实力派反蒋内幕通通向蒋告密。他的所作所为，又处处与川康地方实力派对立，充当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一九三九年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商定，发动他们下面的七个师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陈兰亭、谢德堪、刘元瑭、杨晒轩联名发出电报，历举王缵绪十大罪状，要蒋罢免王的省主席职务，以谢川人。他们还调了一部分军队集结在成都城郊，剑拔弩张，准备动武。刘树成师在简阳的徐正纲旅率队进驻棋盘山，邛崃部队前进到新津宝子山，刘元瑭派队由双流向簇桥前进，谢德堪师由新都进驻天回镇，向成都警戒，彭焕章（光汉）住省垣部队亦作战时戒备。刘树成出外会客，改乘大卡车，车上架机关枪，如临大敌。除袍哥军队进入成都，杨弯子的袍哥队伍也开进成都。[③]在谣言四

①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3页。

②黄应乾：《刘湘死后川局波澜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81页。

③黄应乾：《刘湘死后川局波澜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4页。

起，人心浮动，省垣局势顿形紧张。蒋介石看到这个势头，知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于是王缵绪被赶走了。但蒋介石不愿刘文辉、邓锡侯来做主席，逼得只能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二十二、共产党争取袍哥抗日

1935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直属部队抵达陕北，至此，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直属部队长征胜利结束。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号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1936 年 7 月 15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号召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宣言》指出：“我们中国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吞并中国的野蛮强盗行为是愈来愈凶狠了。他们不但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并且进而实际的统治着整个的华北，不独利用走私，破坏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增加破产失业的种种痛苦，并且采用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的制度，向华北增兵五万之多。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设施，在在都是把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把华北变成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而且正向着中国的西北、华中、华南进行强暴的侵略，

要吞并全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要变四万万同胞成为它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燃烧到我们的眉睫了，我们是处在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少数卖国贼汉奸之外，稍有血气的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莫不怒发冲冠，气愤填胸，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一拼死活的抗战！”在《宣言》中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强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迹，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自己而奋斗”。《宣言》阐述了共产党与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待遇也大同小异。最后，提出：“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困难”。并且表示“我们希望、我们要求、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宣言》高呼：“发扬哥老会过去革命的精神！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①]为了切实做好对哥老会的争取工作，1936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性质、作用、党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以及实际工作的开展，都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首先指出：“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中之一，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这些下层社会的分子，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层”。《指示》其次说明，“在哥老会代表民族利益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第 766 至 767 页。

与群众利益（如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等），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它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但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他们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中央明确指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策略的决定，主要的出发点是根据人民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的，是可以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一种群众力量。《指示》规定，“争取哥老会的策略，应该依照下列方针：（甲）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乙）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丙）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同时还规定了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对于“哥老会思想上、组织上的弱点，往往易为其中反革命野心家及军阀官僚所利用、收买”，强调“在哥老会内部应该提高对于这类反革命野心家与军阀官僚的愤恨，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特别对于那些甘受帝国主义卖国贼利用，破坏抗日战线，进攻苏区的分子，必须坚决的铲除之。这不仅是哥老会中的败类，而且是革命的罪人。但在这类斗争中，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步骤，揭破一切他们的欺骗宣传，以达到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①

在四川展开对哥老会即袍哥的争取工作，是有一个过程的。自 1930 年下半年起至 1935 年春，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和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第 768－769 页。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中共四川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 年初，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派共产党员张曙时来川开展工作，在四川发展党员，恢复一些党员关系；以后中央特科又派遣曾学圃、周俊烈、胡春圃、张晓峰、刘连波等共产党员来川进行情报和统战工作。1936 年 10 月，从北京、山东转学到四川大学的共产党员韩天石和王广义等，在川大文学院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开展救亡运动。这都为以后四川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及恢复打下了基础。①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四川的地理位置重要，是连接西南、西北的枢纽，将会成为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和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因此，1937 年冬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六人从延安到四川，重建四川省委，以加强对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展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2 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在四川真正展开对袍哥的争取工作，是 1939 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对袍哥进行争取工作，使袍哥发生了大分化，一部分袍哥投入了坚持抗日的洪流中来。

南方局对华蓥山地区的袍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董必武同志指出：要在华蓥山广泛开展反蒋的统一战线工作，哪怕是暂时的联合也要争取。他说四川的地方势力，一般都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不满，要善于争取，即使争取到他们保持中立，也有好处。有时借路过，不阻扰我们就有好处。他嘱咐对土匪队伍争取要特别小心谨慎，既不能对他们采取敌对的态度，也不能轻

①王斌：《四川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18 页。

易地相信他们。他们是容易反复无常，流氓性很重。

在华蓥山地区对袍哥的工作中，南方局决定首先是争取广安的郑启和。

郑启和在巴中割据四年后，被颜德基打败，后将部队拖回广安，1922 年接受熊克武的委任为川军十三师师长。1924 年他的部队又被邓锡侯部罗泽洲吞并，罗占领广安，他去上海作寓公。他在上海见到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于我国，公园里挂出“华人与犬不准入内”的牌子，洋行林立，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因而愤然于 1929 年离开上海，回到广安，创办实业，设立“安和纸厂”，开矿掘煤，并设有磺厂炼磺，硝厂熬硝。

1935 年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后，郑启和与四川地方势力熊克武、但懋辛等联系，待机对付蒋介石。他在广安天池打锣湾秘密设厂，制造枪支子弹，对地方事务进行干预，控制政权，惩办贪官污吏，严禁鸦片，破除迷信，禁娼禁赌，治理盗匪流氓；创办“安和中学”，提倡文化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主张抗日。对政府的征粮、征税、征丁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有所反对。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郑启和进行调查后，认为他是个失意军人，与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故退居山林，从事实业。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抗日，有民主革命思想，在广安代市镇一带，自成势力范围，社会秩序良好，严禁烟赌，惩治盗匪，竭力反对不合理的征丁、征粮、征税，得到工农群众拥护。因此，中共党组先后派人去做郑启和抗日的统战工作，从 1938 年起，中共广安县委、南充中心县委、川康特委都派同志去做过郑启和及其亲信的工作。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形势紧张，以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

件，保护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机关的隐蔽疏散，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徐冰等领导同志决定派周建南、熊扬、张兴富、江济业、李斌之、刘为瑞等同志，去郑启和处。他们通过周学庸同志联系的重庆大学何鲁教授向郑启和介绍，以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员的身份，去帮助他改良造纸、造枪、炼磺、开矿、筑路和办学。这批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他的欢迎和信任，密切了关系。他们经常对郑启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实行“三光”政策，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有亡国的危险。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更加鼓舞了他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帮助他积极组织“自卫队”，统一袍哥组织，扩充实力，坚持抗丁、抗粮、抗税的斗争。

早在 1937 年，郑启和组织有“自卫队”，设立了枪械厂，制造手枪和步枪，连同购买和征用地主的枪支，到 1939 年达一万支左右。1941 年在共产党张兴富等同志的帮助下，对部件、发蓝、炸药配制方面，有很大改进。并对武装群众、训练群众，作了不少工作。“自卫队”的人员来源，大部分是农民和山上纸厂、炭厂的工人，组织了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立中队、分队，在所辖地区约一万余人。凡是参加“自卫队”的队员都领枪支，随身携带，在地里务农或往来于山区，都不得离开武器，‘做到“亦工、亦农、亦兵”。参加“自卫队”的队员都身有七颗扣子的对襟蓝色短装，队长为九颗扣子，以示统一。由于“自卫队”的队员不当壮丁，其他地区不少青年为了避免兵役，纷纷来加入“自卫队”，郑启和都接纳安排在工厂工作。

1939 年 10 月郑启和为了巩固实力,将附近场镇纳入势力范围，便统一袍哥，组织“仁和社”，以仁字为主体，将义、礼、智各公口统一于“仁和社”内。首先在代市镇成立，逐步发展到附近场镇。参加“仁和社”的，不分界别，职业，打破了原来凡是理发、修脚、唱旦角的不能加入袍哥的严格界限。从而“仁和社”很为当时下层社会职业者拥护，纷纷踊跃参加。

郑启和在广安河东一带的影响日益扩大，而敌对势力与之斗争更为激烈，他们将郑启和的“左膀”钟子范暗杀后，节节进逼。1941 年 3 月，又联名向大竹专员公署、川康绥靖公署控告。蒋介石势力进川之后，就了解到郑启和的一些情况，意欲许以官职利益招安，想借郑的矿山作为搞特务训练之地，都被郑拒绝。郑启和说:“老子当我的山大王，蒋介石其奈我何？”蒋介石疑惑郑启和与共产党有联系，或是四川老军人熊克武的埋伏势力。由于广安不少人控告不休，视郑启和为祸患，指令四川省政府处置。1938 年 10 月四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以四个团的兵力开赴广安进剿郑启和，但未得逞。1941 年蒋介石则责成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办理，在重庆向邓锡侯面授机宜，6 月（阴历五月）作了军事部署，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派了两个师从邻水方向和广安的山区包围，邓锡侯派陈兰亭一个师从大竹方面进逼观音阁和小井沟一带，新九师杨晒轩驻渠县防守，并派该师第二旅旅长李明远率第二团和驻防广安的第三团进逼桂兴、天池，包围打锣湾一带，已经形成包围圈。邓锡侯派 95 军军长黄隐，到广安作进剿部署，设指挥部于县城后仓。同时，狡猾的邓锡侯找与郑启和有关系的但懋辛，要但去广安婉劝郑委曲求全，停止一切活动，可只身由但护送到成都，保

护郑的生命财产，并请但作证。8 月 3 日，但懋辛、肖德明（代表省政府）、黄骥（代表绥靖公署）与郑启和晤谈，郑同意离开广安去成都。待但等回到广安县城，黄隐已完成进剿部署，才知道这是阴谋。

在进剿前，以广安县的名义设立了清剿指挥部，并以广安县政府和指挥部的名义发出所谓《剿办郑匪启和告民众书》，制造了十大罪状，提出十四条口号。

郑启和在军事上也作了部署，以原“自卫队”的地区布防，设指挥部在鹅峰庵。在备战中派人到天池、代市、桂兴、观塘、护安等地砍了电线杆，提取各乡公所的电话机，并将天池场口上的碉堡烧毁。6 月 30 日（阴历六月初六）起，在天池打响第一炮，双方相持两个月，各地皆有一些小的接触。郑启和也相应发出《告广安民众书》，揭露反动政府和军队害民、扰民的罪恶，申明实为军民之间的冲突，否认自己是匪。用油印即在邻水县邮局发至广安、邻水群众和机关。

在围剿紧张的前夕，共产党员周建南毅然偕郑启和之姨侄孔繁德（载英中学学生）离开载英中学上山与张兴富、江济业同志会同郑启和等商量，研究形势和对策，都主张保存实力，尽力避免事态扩大，可本但懋辛等谈判精神和平解决。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找但懋辛等来谈判的阴谋，已为郑启和等识破。这时，郑启和还约集了营山袍哥大爷李大椿等商议，李已了解到整个山区已被包围，而县城方向较为空虚，建议如打起来，可佯攻县城，暗地带领队伍由石笱过河，走渠县，直趋营山，到大巴山区。在围堵后，郑启和打算由四方山往渠县方向撤退到达县，而守四方山的邓念平倒戈，截断了去路。禄市也有一个队长游大成倒戈了。

8月17日，黄隐下令各部全面出击围攻，以大炮密轰鹅峰庵郑的指挥部，一郑的部队在火力的压抑之下溃散。其他各地的“自卫队”也被打散，负责人跑往他地去了。郑启和见此情况，愤慨万分，气极之下，眼失明，夜间已不能行走，后被背扶下山，隐蔽在市镇所属的郑家桅子坪肖四木匠家里，在搜索紧张时，郑一人躲进稻田之中达三天之久。后被人告密，把稻田几层围困，乱放枪炮，叫喊不停。郑启和认定已不能逃出敌人的包围，慷慨饮弹殒命。这就是当时称之为有名的广安“河东事件”。

周建南同志突围安全回到广安，随即返重庆。张兴富、江济业同志被俘，经当地党的营救，由曾乃凡（中共党员）觅保释放，离开广安，返回重庆。①

“河东事件”以后，南方局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要继续反共，制造摩擦；但由于民族矛盾上升突出，要和共产党全面破裂，公开投降日本，还是不大可能。因此，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一方面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则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其他地方。

反动政府在围剿郑启和之后，对南充、岳池、广安、渠县、营山、大竹一带的袍哥密切注意。四川省政府、成都行辕（重庆行辕改为成都行辕）、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三青团屡次密电，密令地方政府严密防范，并颁布取缔哥老会的暂行条例和惩治实施办法等。四川省政府颁发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暂行条例及惩治哥老会实施办法并饬严禁公务员加入哥老会。并要

① 《郑启和》（稿本）。

公务员取具申明书和具切结，不得加入哥老会。大竹专员公署密令说：“查郑启和业经剿灭，各地哥老会组织，难免仍有异动企图，自应遵办，饬严密注意查访”。[①]但是，为时不久，国民党特务收袍哥为己用，大力提倡发展袍哥组织，川东北一带袍哥又大肆活跃起来。

由于南方局领导广大共产党员开展了对袍哥的统战工作，在川东北袍哥中有很大的影响。解放战争期间，许多袍哥大爷弃暗投明，如 1949 年 12 月范绍增在渠县率部起义，就是中共地下党和“民革”长期对他进行争取的结果。抗日战争开始，范绍增投靠蒋介石，被刘湘下令免去师长职。1937 年 11 月，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卧病汉口。范绍增在汉口侦得刘湘反蒋情报，连夜向孔祥熙、蒋介石报告，从此他与蒋家王朝关系密切。随着国民政府迁重庆，范绍增将“范庄”让出，请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居住。在孔祥熙、何应钦的帮助下，1938 年春，范绍增被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率部出川，转战于江浙一带。1942 年，他被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任八十八军军长。他见部队被蒋吃掉，一气之下返回重庆从事袍哥活动。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又到上海，混迹于十里洋场。1947 年 4 月，他在上海成立“益社”，被选为理事长。在上海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对他做了争取工作，并且通过郭春涛的接头与上海地下党有了组织的联系。他以“益社”为地盘，掩护和招待过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陈铭枢等进步人士。他借国民党政界的势力，运出解放区的棉花，再换成西药、纸张运往华北解放区，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①转引自《郑启和》（稿本）。

1949年初，眼见国民党崩溃在即的范绍增，萌动了重拉队伍，进行反蒋的念头，得到了“民革”和中共地下党的支持。①他返川以后，从当年5月起，就四处约集旧部军官和地方势力，筹商组建军队。8月，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部署西南反共军事，四处招兵买马，封官授命。范绍增通过当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旧关系，提出组织川东挺进军的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范绍增在大竹、渠县招揽旧部和袍哥，很快成立起八个纵队，后又招来庞佑玙部编为九纵队。1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范绍增为国防部直属川东挺进军总司令。11月24日，解放军二野政治部派曾伟澜（民革成员）给范送去密信，欢迎他伺机起义。大竹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关系做范的工作，县城临解特支书记王思静同志希望他设法营救关在狱中的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12月10日，范在渠县三汇镇召开总司令部、各纵队将领紧急会议，讲解了形势，宣读了起义电文：“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我率领九个纵队起义，愿为人民效力，正集结川东待命，请指示”。②12日收到了刘伯承回电，13日正式宣布起义。范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川东北立下了功劳，先后被安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五十军高参，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后调河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3月5日病逝。

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使得他们抗日救国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9年5月，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

①庞佑玙：《衔命回渝策反到范绍增率部起义》，《重庆文史资料》第32辑。

②中共大竹县委统战部史料征集室：《访杨振东同志》，见《四川统战工作史料》1986年4期。

文华家与刘文辉晤谈，给他分析了国内形势，讲述了抗日必胜和妥协必败的道理，使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1941 年 3 月，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2 年 2 月，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会见，周恩来给刘讲述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现实意义，而且强调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要他促进西南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这次会晤后，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同年 6 月，南方局派共产党员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在刘部驻地设立秘密电台，每天同延安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 1949 年雅安解放。

1939 年秋，吴玉章、林伯渠同志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途经成都时拜访了邓锡侯，向邓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希望邓积极支援抗战。邓听后深受启发，给吴、林等在生活上提供了许多方便。后来，邓在征粮支援抗战的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1940 年，国民党蓄意制造反共阴谋的成都“抢米事件”后，准备逮捕地下党员杨伯恺时，邓曾托张雪岩带信给杨，使杨得以脱险。1944 年，湘桂之役后，邓锡侯对抗战曾一度失去信心，派人去找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为邓仔细分析了当时苏德战场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光辉前景，明确指出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从而使邓又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潘文华同南方局亦早有联系，中共曾长期将电台设在潘部。

共产党还通过民主党派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工作。1944年冬，刘文辉、潘文华在成都民盟主席张澜的住所，由张澜主持填写入盟申请书，正式加入民盟，对外以同情者的面貌出现。张澜进行政治活动的经费，是刘文辉、潘文华给予长期支助的。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刘文辉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在蒋管区化名杨宗文）。经过一番筹备工作，民革川康分会于1948年9月15日正式成立。民革在川康的工作重点放在联系地方武力这一方面，指定专人，分区进行：川南地区由李宗煌负责；川西地区由王蕴滋负责；川北十余县由蹇幼樵负责。这三人都是袍哥舵把子，他们联系的武装力量也主要是袍哥队伍。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各县袍哥队伍大多倾向共产党，声势日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动。因此1949年5月发生"崇宁事变"，由民革联系的部分地方武力，由王蕴滋率领，与王陵基匪部的保安队激战于崇宁地区，历时两昼夜，卒因众寡不敌，退至雅安。在"崇宁事变"不久，李宗煌在成都被蒋帮特务逮捕。后来李宗煌被押解到重庆，几经营救无效，重庆解放前夕，竟被蒋帮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经过这两次事变，川康民革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袍哥组织受到严重的打击。后来中共中央也阻止刘文辉利用袍哥进行起义，指出："袍哥势力不能依靠"，应同人民解放军密切配合。①

此外，在四川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为了争取袍哥，参加袍哥组织，以袍哥作掩护，进行党的统战工作，如邛崃大爷王伯高，1938年从延安学习后归来，在邓和（叔才）领导的川南

①杨家桢：《刘文辉起义的思想变化》，《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总第21辑）。

“文蔚总社”下，担任“信义社”社长，大力掩护地下党员黄聘三在邛崃、大邑、蒲江三县长期开展地下工作，胡公拓、傅承筠在邛崃搞统战工作也很顺利，国民党特务察觉后亦不敢贸然下毒手。1941 年，成雅道上邛崃段的驻军在卧龙场逮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尹英。王伯高与邓叔才商量，由王伯高派专人送信给二十四军副师长兼团长毛国懋，毛得信后立即下命令：马上将尹英护送邛崃交与王伯高大爷。后来邛崃县政府、县党部、中统、军统、三青团等纷纷向川康绥靖公署、成都行辕、四川省政府密报，把王伯高的“信义社”说成是“川八路”，袍哥云集邛崃县说成是要举行“暴动”。邓叔才知道后通知王伯高于 1946 年春离开邛崃到成都，住在邓公馆，以为国民党当局不会贸然下手。殊知 1947 年 6 月 2 日凌晨，宪兵趁王在睡梦中，一拥而入将王捕走。邓叔才为此气得不食不语，病气交加，数日后逝世。①

资阳县袍哥“叙荣乐”社舵把子张维丰，拥有人枪数百，是资阳县地方实力派。1947 年 7 月，中共川西临工委留蓉工作部派人对他进行团结教育，争取张维丰弃暗投明。张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以补前过”，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同年秋末，川西工委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罗人马，组织“反共救国军”的情况，决定争取地方武装，组织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打击敌人，配合解放。这时，张维丰受命在蓉积极筹组武装，被任命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东第三支队司令员。张即通知其亲信李阳春“组织资阳独立大队，协助解放”。同时，邀请川康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领导人员前往资阳验收整编。10 月 31 日，张维丰奉命先回资阳

①吴剑洲、胡重威：《四川袍哥邓叔才》（稿本）。

准备，在成都牛市口汽车站被敌特逮捕，关押于省特委会监狱。张在狱中表现坚决，严守组织机密，做到了决心跟共产党走的诺言，并将随身的一只金戒指托人变卖，供狱中同志改善伙食。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十二桥。

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生先烈们，都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二十三、特务操纵的袍哥组织

蒋介石国民党势力入川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之后，为巩固其独裁统治，有意利用袍哥分化打击进步力量和地方势力，曾进行组织“国民自强社”和“人民动员委员会”，派遣大批政客、特务打入袍哥组织，从中进行控制和操纵。①

1932 年，军统老牌特务，“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曾参加袍哥）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身份回四川时，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龙文治，筹谋掌握袍哥组织力量，邀约当时重庆的仁字“紫云公”执事大爷余仕高、义字“永和公”执事大爷鲁海林等商量，指示他们筹备重庆袍哥的统一组织，以合法民众团体名义向市党部呈请登记备案，然后在当局领导之下，正式活动。“国民自强社”这个名称也是曾扩情、龙文治代为拟定，由余仕高、鲁海林等去约集各堂公口袍哥大爷商量通过，接着进行筹备的。

“国民自强社”筹备期间，仁字李炳云、田德胜，义字谢德三、礼字巫清平、向占云，智字罗海清、牟三和，信字范化南等人，都表示赞成。并商得陈兰亭同意，由他担任首名发起

① 《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人，余仕高、鲁海林等依次列名，共五十人。具文以组织成立合法民众团体“国民自强社”为缘由，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登记备案，旋获批准，并发给一些民众团体应遵守规则的文件。

1932年夏，重庆袍哥在机房街召开“国民自强社”成立大会，各堂公口袍哥大爷出席，当家管事兄弟伙也有一些列席，参加大会者共数百人。大会推举陈兰亭为名誉社长，余仕高为第一任社长，其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干事、各组组长等职，社址设在龙王庙街（今民权路）章华大戏院楼上，“国民自强社”牌子则挂在戏院侧门。一些袍哥兄弟高兴地说：“现在袍哥出头了，政府许我们嗨了”。

“国民自强社”的权力，照当时各堂袍哥协议规定，是重庆五堂袍哥的总社。社长余仕高是“总舵把子”，对各公口都有指挥约束的权力。但因袍哥组织素来不相统属，散漫习惯不易改变，成员又极复杂，不受约束。几年以后，余仕高病死，“国民自强社”对各公口就更无指挥约束的权力。

1938年，在余仕高老病将死之际，石青阳的儿子、仁字袍哥石孝先由外地回到重庆。石孝先，重庆人，黄埔军校三期学生，赴意大利山地兵团学习，回国后曾在某部任政训处长，靠其父石青阳的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些影响，对搞袍哥活动抱有政治野心。石孝先见“国民自强社”有法定手续，对重庆袍哥又有一定权力，便趁众人不甚重视的时机，向各方运动得任总干事。他就任后即着手改组内部，以冯什竹任到总干事，以仁字袍哥五人、义字袍哥五人、礼字袍哥三人、智信两堂各一人分任干事。唐绍武、李祝三等分任交际、总务各组组长，并拟在全城各街逐步发展分社，壮大力量。他还同时征得范绍增、陈兰亭同意，领头署名，遍请重庆各银行钱庄、各大

商号老板吃饭。在吃饭时，即席发起募捐，共募得法币二三万元，将此钱作为“国民自强社”基金，筹备开办“海丰银行”。他准备将银行所得盈利，作为活功经费，使“国民自强社”顿然活跃起来。他改组后，向外发出通电，各地帮会纷纷复电致贺。

不久，戴笠的军统局随国民政府迁渝，伸手控制帮会，见石孝先夹“国民自强社”领导重庆袍哥，虑其坐大难制，屡加警告，但石孝先自恃有奥援，竟不买戴笠的账。1939 年夏，军统局突将石孝先逮捕监禁，“国民自强社”随之解体。①

石孝先被军统扣押数月，在杨沧白营救下获释，自后乃一意主持另一袍哥公口“蓝社”。他则专门耍袍哥，政治上与中统军统高级人员关系甚深，军统方面王甘澍为其有力干部。后来“蓝社”社员约有三万余人，其中多为军警宪特分子。②

蒋介石国民党迁渝后，见重庆袍哥组织力量强大，为符合他们政治需要，决定加以控制利用。戴笠派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徐亮出面，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的青帮、洪门组织，酝酿共同组织一个团体，在军统局领导下进行活动。

几经商讨，各帮会均表示赞同，决定取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于 1941 年夏在重庆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袍哥代表有田德胜、谭备三、冯什竹、唐绍武、石孝先、何占云等，青帮代表有张树声、韦作民，洪门代表有杨虎、杨庆山、程壮等。另有各帮会骨干分子数百人到会。

大会由徐亮主持，宣布“人民动员委员会”宗旨为“联合全国帮会抗战建国”，要求会员“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总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裁”。他还说，“戴先生（指戴笠）是代表总裁领导大家的”。各帮会代表陆续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接着宣布了组织章程：委员会内设书记、常务委员、委员及办事人员。并设办事处，由书记负责主持一切会务；设指导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聘各帮会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委员会采取秘密组织方式，不挂牌子，不用委员会名义公开对外活动，而用各帮会名义进行活动。“人民委员会”办事处，在重庆戴家巷 37 号秘密设立，只有几个常驻办事员，有事临时由军统局调用。

第一任书记，军统特务蒲风鸣，原系云阳袍哥，他死后由特务金玉波（洪门）接替。1946 年金玉波随戴笠出行，因飞机失事摔死，继由特务严守兰（洪门）接替。常务委员数人，有徐亮、张树声、杜月笙、杨虎、杨庆山等。委员有田德胜、冯什竹、韦作民、唐绍武、石孝先、程壮、蒋相臣等人。指导委员、设计委员则更多。一切均由书记直接联系，指示各帮会进行活动，各帮会也直接与书记联系，不必通过会议。

该委员会发动利用各帮会大规模的公开活动，一是“献机祝寿”，为蒋介石五十六岁生日，捐献飞机十八架，编为忠义号一至十八号，以旧机十八架油漆一新，那笔款被军统用了；二是赈救湘灾，为湖南水灾募款救灾，事后亦未明确公布数字和处理湘灾赈济情况。军统局通过这个委员会，搞了许多秘密非法活动，由特务成立的公口去进行的。

其时，担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的方治系统的中统分子，也想操纵袍哥组织，故军统与中统也曾发生矛盾。

抗战结束后，军统局迁回南京，“人民动员委员会”继任书记严守三控制力亦随之减弱。军统为了继续控制和利用帮会，指示严守三向各帮会宣布，将其改名为“新中国事业建设协

会”。1947 年春，在上海召集各帮会代表成立“新中国事业建设协会”，继续执行“人民动员委员会”领导控制全国帮会的任务。四川袍哥组织，重庆方面推田德胜、邱丽生、熊山文、张君达、李汝衡、廖开孝等六人为代表，陈攸序为秘书，成都方面推李宗煌、蔡玉彬二人为代表，[①]泸州方面推郭仲宣为代表出席会议。由军统特务徐亮以飞机包接包送，在上海管吃管住，徐亮为此报销了二亿元法币开支。[②]选举向海潜（洪门）为董事长，徐亮为总干事把持会务。[③]

军统特务除以“人民动员委员会”一般地领导控制帮会外，还派出大小特务直接成立袍哥公口，其中周迅予成立的“正诚社”，在重庆、成都、泸县、江津、绵阳、雅安等地都有组织。它招引仁义礼智各堂袍哥参加，人数发展很快。“正诚社”全以军统特务为骨干，总社长周迅予，副总社长贺鳌。参加“正诚社”的袍哥，绝大多数是稽查处、警察局、侦缉队和后来刑警队系统人员，及各地与军统有关系的特务分子。[④]其次是军统下层特务分子成立的“融志社”，在重庆、成都都有组织。是由唐毅（原成都警备司令部谍查队长，后升任重庆警察局长）下面的成、渝两地滥袍哥“三凶”、“八恶”组成的公口。由“三凶”中的曾成武任社长，寇忠大、李如德任副社长。不分仁义礼智信，吸收警察局系统人员及有关系的各堂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印。

③樊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38 辑，第 223 页。

④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袍哥参加，都是军统下层特务分子。[①]成都“融志社”社长彭德贵，任成都警备司令部参谋，行动组指挥，成员为谍查科人员，办有《融志周刊》。[②]此外，还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同夏炯、廖开孝成立的洪门组织“武圣山”，很多仁义礼各堂袍哥转入，人数发展很大，执行军统局指示。[③]

中统特务分子也大抓袍哥组织，在重庆除原来拉拢利用袍哥组织仁字正伦社、义字众合社、全义社外，还新成立有刘野樵的“群义社”，卢俊卿的“大道公”。

刘野樵原系市井无赖，后当宪兵，加入中统特务组织。方治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时，令刘野樵专任拉拢联络袍哥。方见军统以“人民动员委员会”控制袍哥，决定党部自行组织一个公口，供中统指挥运用。1946 年春，刘野樵陆续拉得二十余人，在“凯歌归”餐厅成立“群义社”组织，自任社长。不久，又创办《社会时报》极力为国民党作反动宣传。1945 年冬，刘竞选市参议员，窃取农民身份，冒充农民代表当选。随后，他着手在郊区发展“群义社”组织。“群义社”分子多是一些中统特务，兵痞流氓，并有一些打手。[④]

中统特务卢俊卿，嗜好赌博，但袍界中资望既浅，恶名又著，欲在袍哥老公口发展甚为不易，若新设公口，也觉力量不济，便借“三省公”的基础发展势力，推三省公副舵把子蒋相臣为正舵把子，自己为副舵把子。1946 年春，卢俊卿趁蒋相臣经商去沪之时，用蒋相臣的名义宣传号召，筹备成立新公口“大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④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第资料》第 31 辑。

道公”，卢任社长，在各堂袍哥中自树一帜。

在重庆复兴社、三青团控制下的袍哥公口不及中统控制的多，但在工商界方面却比中统力量大。三青团头目康泽、陈介生控制下的袍哥组织有周懋植的“宗汉社”，仇秀敷的“正汉社”和高允斌的“四权公”等公口。[①]

在成都中统成立的公口有“大中社”，是中统川调室成都区区长刘国辉于1943年6月在川调室主任孙云峰指示下成立的，办有《大中周刊》、《大中新闻》。其中社员二分之一是中统特务，到1945年发展到三十二个支社，社员号称万人以上，这是成都袍哥与蒋介石特务结合的开始。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成立有“社会建设协会”，模仿袍哥、特务办法组织的政治袍哥组织，企图以各市县的党部来控制所有袍哥码头，但成立不久便烟消云散了。

成都警备司令部的“同声社”和“华成社”是由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在抗日战争后成立的，该部谍查主任徐子昌、副主任蒋浩澄主持的“同声社”，发展了三十多个分社，1947 到1948年红极一时，所有成都土匪、流氓、地痞、恶棍、滥军人，完全集中该社。该社参加特务最有名的人物有曾兆名、高金山、宋文钦、吴安民、魏赓云、李合田、包国华等。严啸虎见徐子昌、蒋浩澄的“同声社”势力日益增大，又示意银运华成立“华成社”，以乡区情报所干部为分支社负责人，并吸收成、华两县保长入社，以牵制和监视徐子昌、蒋浩澄，作严啸虎的特务。后来银运华投入周迅予军统的“正诚社”，拜周为大哥。徐子昌除加强“熙成社”袍哥组织外，并支使其兄弟伙周国钦组织“永安兴社”，黄亚光组织“群益社”，曾文华组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织“聚成社”，发展分支社数以二三百计。后来黄亚光投靠军统，周国钦投靠中统，成都的袍哥渐渐地趋于特务化了。

宪兵特高组织的“云汉公”，向绍先组织的“新靖公”，是宪兵特高为操纵袍哥而设立的外围组织。

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发展的袍哥组织，有保安部情报队特务廖仲怀领导的“建国民友社”，王钦廷领导的“普结社”，李德富领导的“东三和社”，邓德滋领导的“文武社”，陈肇武领导的“孝义社”，周烈澄领导的“云靖社”，邱明领导的“云汉社”，宗文钦领导的“同声崇仁社”，保安团长张玉波领导的“汉社”，督导王种鋆领导的“兴中社”。这些，都是由王陵基以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作为大本营扩展而成立的，都是王陵基进行反革命反人民活动的帮凶。

此外，成都的青年党成立有“蜀光社”，总社长为黄石子（该党省委）、副社长为严光熙（该党省委、新亚银行经理），参加特务活动的有该党中委刘裕昆，该党省委吕在舟、李蕴山、刘光廷、江子贤等。1946 年冬在宜宾、新都、金堂等地发展社员。社员有两百多人。除贩毒等外，他们还搜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情报。民社党成立有“正伦社”，由民社党的社会处负责人之一张联芳主持。“正伦社”原为川康绥署参议李瑞卿主持，1945 年李死，张联芳继长该社。张联芳利用他是刘湘的下级和袍哥关系，贩毒贩枪，欺压善良，为成都恶霸之一。“正伦社”中有的人是特务，如邓权斋、唐霁锟、彭仲穆、苏海泉、陈志勤、高占云、方雄飞、杨党非、陈绍虞等。1949 年张联芳入成都中央军校游干班五期受训，解放后自新，后因制造谣言被捕。①

---

①《袍哥与特务——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 年印。

军统、中统通过这些袍哥公口，搞了许多反革命活动，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如“正诚社”的罪恶活动，与军统的罪恶活动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军统局命令下，经常夜间出动逮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封闭《新华日报》馆、接收八路军办事处等。“正诚社”社长周迅予在成都并曾亲率侦缉队特务逮捕民革成都负责人周从化，押送重庆渣滓洞监禁后被杀害。“正诚社”分子，平时凭借军统势力无恶不作，危害人民。刑警处长张明选，以扰乱市场罪名逮捕华兴绸缎公司经理罗善章，被关了几天，勒索黄金三十条。解放后，少数“正诚社”分子随军统逃去台湾，大多先后就擒，依法被镇压、监禁或管制劳动改造。①“融志社”的罪恶活动，主要是执行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命令，配合军统稽查处人员，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解放以后，“三凶”、“八恶”以及“融志社”一些骨干分子纷纷伏法。“大中社”的罪恶活动，是直接由成都中统命令进行的，主要的有1946年进行反共游行，殴打华西协中学生，攻击《胜利周报》使其停刊，成都追悼闻一多、李公朴时攻击侮辱张澜，破坏1947年成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9年刘国辉曾武装“大中社”社员，参加“游击队”等等。②“武圣山”分子，在军统大特务罗国熙等指挥下，执行军统和重庆市政府指示，到处反对进步力量，打击进步人士。有时还混在群众当中，叫嚣反共口号。重庆学生展开反饥饿运动，暗中用武力对一些进步学生进行迫害。

国民党豢养的特务和袍哥分子，往往还冒充民众，制造反革命事件。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夺占总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②《袍哥与特务——成都市袍哥组织调查》，1950年印。

工会事件”、“捣毁《新华日报》社事件”，都是国民党特务操纵袍哥组织冒充群众制造出来的。其中1946年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事前陈立夫曾对王缵绪、方治有指示，方治派中统特务吴人初、刘野樵等分头负责。刘野樵以“群义社”社长名义，约同义字“众合社”舵把子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仁字大爷社会服务总队长龚曼华等，共纠集特务、袍哥、打手、流氓地痞约七八百人，准备捣乱会场。先是刘野樵等人霸占播音器，刘自称总主席；随后刘野樵吆喝打手多人围殴李公朴、郭沫若等人，李公朴、施复亮受伤甚重，郭沫若、马寅初亦被打伤，台上台下共打伤六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刘野樵所纠集的几百袍哥打手，事后据袍哥中人了解，是用金钱收买而去的。①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

二十四、袍哥组织愈来愈滥

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特务渗入袍哥组织，新设公口，利用袍哥破坏革命运动，使得袍哥组织愈来愈滥，组织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了变化。

首先、袍哥组织的封建的反动的色彩愈来愈浓，成为反革命的特务、国民党军政人员所掌握、利用和收买的社会工具，“从‘码头’、‘公口’的‘舵爷’、‘社长’的身份、职务看来，那时军政、特务与‘袍哥’融为一体，或者彼此利用，相互勾结”。[①]

其次，对参加袍哥组织的“身家清，己事明”作了新的解释，取消了一些限制和规定，废除了一些香规礼节，为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的加入大开绿灯。后来甚至有临时邀请，强拉参加的。也有对冒称堂口，假借名义者，不但不追究反而予以追认的。

第三、自由新建公口，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有政治背景或特殊势力，稍有一些人就可随意新立一个公口。许多新设公口，一般采取打破仁、义、礼、智、信五个旗号区分的办法，不分堂口，不讲班辈，吸收各堂袍哥自由参加。一个人可以参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加几个不同的公口，亦不加限制。

第四、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内部增设各种委员会，各种业务组织。改用社长、主任委员、干事、社员等名称。重庆义字总社、礼字总社都是如此。

第五、对社会下层某些行业参加袍哥仍加歧视，如对理发业同人参加各堂袍哥进行反对，结果重庆市理发人员于 1946 年 7 月 1 日罢工一天。斗争结果，仍由理发工人将原来自行成立的威字旗“全汉”等社，德字旗“忠顺”等社共十道公口，联合组织一个总社叫“海社”，但仍不能参加仁、义、礼、智、信各堂袍哥组织。[①]

第六、妇女也有了袍哥公口。重庆绝大多数女袍哥是仁、义各堂袍哥家属。据了解，重庆的大小女袍哥组织，有二百多社，人数约在万人左右。[②]

1941 年以后，重庆袍哥组织发展变化很快，礼字、义字相继成立总社，仁字曾几度酝酿统一都未能成功。

重庆礼字总社成立最早。重庆礼字袍哥历来都系“礼渝社”统一领导若干分社，其分子除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外，大部分是服务行业、码头工人、木船水手及警察特务、兵痞流氓等。[③]抗战后期，范绍增自前线返渝居住，礼字袍哥兄弟，咸相推重，请其出任领导，乃酝酿成立重庆礼字总社。礼字总社成立，范绍增任总社长，何占云、廖开孝任副总社长。下有干事会、常务会、直接领导总务、社务、考核三组，总社长下，另有财务委员会等。各分社经过整顿之后，曾有一些发展，在基层社会有

---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相当力量和影响。它有分社一百三十余个，社员约四、五万人。[①]

但范绍增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离渝赴沪，在沪另组“益社”，重庆礼字总社即由何占云等负责。1949 年春，外地撤退来渝的军统武装特务交警总队分子，大批加入礼字袍哥，企图在重庆解放以后上山打游击，继续与人民为敌。后来范绍增返回重庆，重新领导礼字总社。重庆解放和范绍增起义，礼字袍哥中大批军统、中统特务或纷纷逃散，或自首，或依法被镇压、监禁。

义字总社是由冯什竹、陈兰亭筹备成立的。1944 年春，冯什竹、陈兰亭两次约集义字公口首脑，拟以“树德社”来统一重庆义字袍哥。但遭“孝义社”舵把子杨少宣等反对，认为这个方式含有不平等意思。于是改变方式，并拉杨少宣合作，终于在 1945 年 4 月成立筹备委员会。取得军统特务金玉波同意，10 月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冯什竹、杨少宣为正、副总社长，陈兰亭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义字总社成立，卫戍总司令王缵绪亲临致贺。在杨森就任重庆市长的次日，即行拜访冯什竹、杨少宣。稽查处长罗国熙、警察局长唐毅，民政局长赵冠先等，都与冯、杨密切勾结，狼狈为奸。

义字总社成立之后，义字原来各社不动，仅须服从总社领导而已。冯什竹、杨少宣运用一些方法笼络各社首脑，保障其权利，调和内部矛盾。由于义字各社分子，绝大多数是军警特务和地方保甲人员，在中下层社会势力很大。总社把这些恶势力统一起来，势力大增，作恶也更多了。在基层政权和选举上，特别显示出力量。重庆十八个区中，义字袍哥在十六个区当选正副区长，另有十四人当选市参议员。义字总社自称掌握三张王牌：第一张是：警察局军统特务六个侦缉队的队长中，

---

① 《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占五个，仅一个是仁字袍哥；第二张是：全市十八个区的十六个正副区长是义字袍哥；第三张是：市参议会中有十四个参议员是该社的成员，而且他们拉拢了另外十二、三个参议员，结成了小集团。①

据了解，义字总社包括八十余单位，分社四百余单位，总计社员约十万人以上。重庆各区各保以及各阶层均有该社的组织，尤以市区最多。②

重庆仁字袍哥大爷企图统一全堂公口的首先是田德胜，由陈攸序等为之奔走拉拢，几经酝酿，推出田德胜、石孝先、唐绍武、杨巨卿、张永隆五人进行筹备，同时办理公口登记。因五人互不团结，田、石争为雄长，互相攻讦，唐、杨、张各有打算，都不热心，因此无法成立总社。③

仁字的组成分子，大都是士绅、大商人和银行公司经理、工厂老板、职员、特务，其领导人多为国民党的大特务，或以国民党为后台，一般知识水准、社会地位均较高，袍哥中称之为“老太爷班子”。在重庆有一百八十余个分社，社员约八万人以上，其中职业袍哥约一万余人。

仁字公口，著名的有“正伦社”、“蓝社”、“三省公”等。

“正伦社”是田德胜主持的公口。他的资历很老，野心很大。抗战前他的力量并不大，军统来渝后，开始控制袍哥时，他极力拥护，其势力才逐步膨胀。1942 年，王缵绪、杨森由前线回渝，军统示意欢迎，田德胜立即带头纠集各堂袍哥六七百

①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②《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人，盗用全市民众名义举行盛宴欢迎。杨森、王缵绪发表反共拥蒋演说，田带头鼓掌。他为了表示拥蒋，捐献飞机一架，国民党政府颁给奖章一枚，大绶带一根，他悬佩身上，打马游街，大肆招摇，道路为之阻塞不通。自此以后，田死心塌地地为蒋家王朝卖命，每逢集会，必争先发言，号召袍哥拥蒋反共。无论军统、中统、卫戍部、市政府各方面，一有策动指示，他便立即派“正伦社”的流氓地痞冒充群众参加活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一度飞渝策划垂死挣扎，田带头欢迎，极表忠诚。解放以后，在镇压反革命期中，人民政府将他依法处决。

“蓝社”是石孝先主持的公口。这是以仁字为基础，倡议打破堂口界限，吸收义、礼、智、信各堂参加成立的。袍哥的传统香规礼节仪注，都由他开始破坏。“蓝社”发展虽快，但品类极为复杂，社员约有三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军警宪特分子。他的目的主要是争取人多，虚张声势，以作在政治上进行讹诈的手段。社长石孝先，是复兴社分子，与康泽、陈介生等系黄埔军校同学。副社长潘纯瑕，是中统特务。它的政治背景则为复兴社、三青团。1945 年冬，石孝先当选市参议员，即系三青团支持出来的。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来渝，石孝先与田德胜等大卖力气，鼓动各堂袍哥热烈欢迎。重庆解放以后，他病死于家中。

“三省公”是重庆仁字袍哥老公口之一。抗日战争以后，由唐绍武继任执事大爷，蒋相臣、董泽普为副，人数约三、四百人，各阶层分子都有，其中以工商金融界较多，也有不少军警特务和地方保甲人员。组织活动比较保守，虽然也打破了过去香规礼节仪注，但还保留一部分封建形式。每年仍旧照旧例，兴办圣会、中元会、团年、团拜四次大会，举行简便仪式，吸

收人员。唐绍武是一个典型的旧袍哥大爷，专搞江湖活动，嗜好赌博，吃喝玩乐。蒋相臣一向偏重搞工商业，经营瑞华玻璃厂、瑞华公司、瑞丰烟草公司等，凭借袍哥力量来发展工商业活动。曾任江北区长，后来又任市参议员。

其他在重庆活动的仁字袍哥大爷还有方茂山（遂宁仁字袍哥大爷）、陈鼎卿（成都仁字袍哥大爷）、李岳阳（安岳仁字袍哥大爷）等。重庆仁字公口，约有六百道之多，散布各区。

重庆袍哥究竟有多少社？人数有多少？人员的成分和比例比怎样？都缺乏正确、可靠的数据。仅就 1949 年有关部门调查的数据，供大家参考。据调查，重庆袍哥有“五百余社”，① “袍哥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② “重庆各阶层袍哥数的比率（一般袍哥的分布概况）：

1. 渝市保甲人员，占百分之九十为袍哥。
2. 渝市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七十。
3. 渝市职业公会会员，占百分之八十。
4. 反动派的军警人员，占百分之五十。
5. 反动派特务人员，占百分之九十。
6. 各行庄商号‘练习生’、‘店员’占百分之二十。
7. 土匪、小偷、流氓、妓院、舞厅、茶旅馆、澡堂老板，约占百分之百”。③

重庆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有人记载说：“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更是‘码头’林立，‘公口”繁多之地。仅成都市区、郊区就举不胜举。成都有‘四门五码头’，总社名

① 《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② 《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③ 《重庆帮会调查》，1950 年印。

叫‘宣汉社’，经乔种泉、刁青云、陈俊珊等人竭力经营和扶持，由曾在滇军罗佩金部当过团长及彭县县长的王瑞堂任总社社长，执掌‘龙头’，分管四方。东门的‘汉水社’，社长王青云；西门‘清和社’，社长余海山；南门‘崇汉社’，社长卢华廷；北门‘庆福社’，即由卢怀三、周志亭分任正副社长。各霸一门，相互通气，彼此凑威，势力所及，遍于城郊。此外，以卸任‘县太爷’陈俊珊的‘协胜公’、‘聚贤文武社’，师长乔种泉的‘种福社’；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刘嘉兴的‘协进社’；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的‘合叙同’；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二十八军旅长龚渭清、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二十一军刘湘所属潘文华部军需处长并成都银行公会理事长赵丕休的‘蜀德社’；冷开泰的‘汉华社’；徐子昌的‘西城社’；蒋浩澄的‘同声社’；银运华的‘华成社’；黄亚光的‘群益社’；周国钦的‘永安社’，蔡玉斌的‘更生社’；刘国辉的‘大中社’；张联芳的‘正伦社’，彭德贵的‘蓉智社’；田泽孚、刘惠安的‘东山联合总社’，曾次钦的‘大成社’等等，真是多如牛毛。至于大街小巷‘打坐龙’的‘码头’，更难一一尽数，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成都一地的大小‘码头’以及分社、支社，就多达一千个左右”。①另据有关部门 1949 年的调查，“成都现有一千零五十余社”。②

成都的袍哥头子，也愈来愈凶狠残毒，当时有“四凶”、“五霸”、“七浑”之称。“四凶”是指冷开泰、黄瑾怀、彭焕章、邓叔才四人。“五霸”是指田泽孚、银运华、蒋浩澄、徐子昌、黄亚光五人。“七浑”是指黄云楣、周国钦、刘国辉、

①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②《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刘元珠、黄旭东、包国华、康伯陶七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使用袍哥为非作歹，贩卖鸦片枪支弹药，参加抢劫或坐地分赃，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特人员，在成都及全川称王称霸，无恶不作，是人民非常痛恨的家伙。①这批人中除解放前夕病死或参加起义者外，解放以后，皆先后就擒，依法被镇压、监禁。

从 1941 年起，在雅安也先后成立了九道公口：

（一）进同社　由二十四军团长刘述尧任社长，一个退职营长陈碧光任副社长，约有袍哥六百人。

（二）忠义社　由二十四军退职团长权光烈任社长，副社长是二十四军特务营副营长李忠孝和西康保安团团长王德全，约有袍哥一千五百人。

（三）荥宾合　由二十四军副官长陈耀伦任总社长，副总社长四人，是二十四军军部交际主任杨国治、科长沈季和、倖薪樵、雅安县参议会议长（后来的伪国大代表）高炳鑫，雅安总社约有七四四人，各分社共有四六八三人，总计五四二七人。

（四）成仁大同社　由二十四军营长安国长任社长，副社长二人，一是军部副官徐绍武，一是荥经倒底坝乡长熊继湘，约有三五七人。

（五）会仁同　由西康省保安大队长张明清任社长，军部经理处委员彭文渊任副社长，共约二百多人。

（六）群贤社　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作幕后，由其族弟刘元萼（号体忠）任社长，约一千二百人。

（七）国光社　二十四军参谋长伍培英作幕后，由其侄子二十四军军部副官伍栋梁任社长，约二百多人。

---

①《成都市袍哥团体调查报告书》，1950 年印。

（八）辛巳俱乐部　由刘文辉的侍从室主任吴定一任社长，副社长有军部副官处副处长左仲三、毛丽三，退职团长王吉三，约四百多人。

（九）会礼同　由雅安地方袍哥舵把子开木器铺的生意人李辉庭任社长，地方袍哥舵把子开碗铺生意人周玉成任副社长，约二百多人。

由上面各个公口的主持人就可看到当时的袍哥与军队的关系了。至袍哥的发展就不止是军队，也扩充到反动派的党政团参各界，甚至中小学教师、中医生等”。[①]解放战争时期，显然不能依靠这样的袍哥组织在西康进行起义。

袍哥组织在农村乡镇，愈来愈为地主官僚掌握领导权。据调查川省袍哥历史演变，“1933 年之前，袍哥主要为地痞流氓与土匪所组成。川省在内战时，绅粮地主，很多投入袍哥中，以图利用袍哥保持财产。但当时地主在袍哥中，只能供献钱财，不能掌握实权，且为袍哥领袖轻视。抗战爆发后，地主与政权进一步结合，袍哥不得不借重地主接近政权，以保障其贩毒走私等非法行为，地主官僚也乐与袍哥一同走私以获巨利，于是地主在袍哥中地位提高，地主加入者更多，便进一步掌握了袍哥的领导权”。[②]

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的兵役政策后，农民成批地加入袍哥，幻想求庇于袍哥大爷，免除服兵役。

小商小贩为便于来往贩运，也大批加入袍哥组织。

1949 年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川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百

①杨国治：《西康雅属的袍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47 辑。

②《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分之七十以上”，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①]袍哥人数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

袍哥势力的恶性膨胀，还和国民党政府搞伪选，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蒋介石伪选总统，组织猪仔国会，掀起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分不开的。为了伪选，大力扩展袍哥势力。谁能运用袍哥的势力，得到袍哥的帮助，谁在选举中定操胜算。记载说：“无论在任何的选举场合下，哥老会总是占有很大的势力，我们可以这样大胆的说一句，谁能运用哥老的势力，得到哥老会的帮助，他们选举定操胜算无疑。以哥老会为支持选举的主流，故各党派系（指反动党团）与各阶层人物，无不争先恐后的来利用哥老会，因而贿选、炮选等等精彩节目，就在四川各地排演，造成了许多明争暗斗的流血事件，且有许多不学无术的袍界领袖，抓住选举千载准逢的机会，受兄弟们的拥戴，一跃而登上国大代表或立委监委的大有其人”。[②]如重庆，1947 年选举伪国大代表，两个袍哥大爷石孝先、卢俊卿竞选争斗激烈，驱车奔走各区，以大量金钱贿赂袍哥收买选票。接着不久，普选伪立法委员，竞选人都来拉拢收买袍哥组织支持。“这段时间，社会流传：‘重庆选灾，甲于全国’。不但袍哥分子嚣张已极，有些无聊之徒，竟梦想依靠袍哥组织改组政党，以作登上政治舞台阶梯。义字总社的熊山丈、张君达等就是这样计划进行的”。[③]成都的袍哥大爷徐子昌与任过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郑州绥靖主任的孙震（德操）竞选伪国大代表，演了一场闹剧。成都市应产生的

①《四川帮会调查》，1949 年印。

②凌光甫：《四川哥老会问题之研究》（稿本）。

③唐绍武等：《解放前重庆的袍哥》，《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

“国大代表”，已由蒋介石伪中央“圈定”孙震，但徐子昌硬要竞选，和孙震一见高低。“尽管事前成都伪市政当局多方派人向徐疏通，请他退让，他都不干。徐仗持有大小袍哥和土特务，搞几十万张选票毫无问题。在四门组织了若干竞选办事处，由黄亚光、蒋浩澄、银剑泉（运华）……等吃铁吐火的人主持，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他的党羽还为他筹集伪法币两亿多元作竞选费，并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为他效劳到底。他的竞选声势越来越大，把全市都闹震动。孙震为此暗地里有点着急，输不起这个面子。而最着急的人，还是伪省主席邓锡侯，他知道孙震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如果‘中央圈选’的都出了岔子，他怎好向蒋介石交代？他的主席纱帽恐也难保。要解决这个僵局，只有向徐许上一个‘包袱’，徐才会让步。于是叫保安处刘兆梨准备一个区副司令的缺给徐子昌，同时派副官长黄瑾怀给严啸虎和几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请他们叫徐子昌让步，徐认为已经抓了‘耿面子’，才顺风转舵，卖个人情给邓锡侯，同时又赢得了孙震的谢意，于是才偃旗息鼓地退出竞选”。①其他各袍哥组织，也有类似情况，如崇宁“刘绍武系现任国大代表，袍哥出身，系出至冷门，纯以袍哥力量，而当选国大代表”。②荣县“曹徽，是大同社的龙头大爷，各乡有分社代其工作，结果他是第一国大候补人”。③可见这时的袍哥组织成为了蒋介石进行伪选的工具。

①康兆奎口述：《成都的“四大恶霸”》，《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94 页。

②《建设日报》，1948 年 12 月 26 日。利刀：《三派逐角下的崇宁》。

③《啸报》第 2 卷第 9 期，孑民：《荣县地方党派人物志》。

二十五、剿灭土匪与取缔袍哥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穷途末日的蒋介石集团，为了作垂死的挣扎，积极拼凑其残余力量，组织连结广西和陕南的所谓“西南防线”。企图利用西南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封建势力雄厚等所谓有利条件，负隅顽抗。他们妄图以四川为中心建立所谓陆上基地，苟延残喘，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保存其残余实力，退守西康、云南或逃亡国外，依附帝国主义，继续与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①

蒋介石始终把固守四川作为割据西南总体战略的关键和核心，并早已派要员进行控制和经营。1948 年 4 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指令王陵基入川，攫取四川省主席要职，排挤地方实力派，加强对川、康地区的控制。

王陵基在四川两年时间中，为了替蒋介石搜罗炮灰和增加自己的实力，就尽力扩充地方武装。四川原有十个保安团，王棱基准备扩充成二十四个到三十个团，而省参议会只同意增加

①何正文：《全歼大陆蒋军的最后一役》，《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50 页。

十个团，实际上只新成立了两个团。一个团是收编邛崃的袍哥土匪队伍七百人组成的，一个团是军统特务控制的兵工厂警卫部队编成的。1949 年初，王陵基怕共产党在川滇交界的屏山、雷波、马边、峨边等县的大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委派袍哥师长刘树成，穆瀛洲为边区正副司令，率领保巍队驻防（号称两个师，后经解放军查明，只有一个团）。王陵基认为，“他们在当地都拥有相当的恶势力和反动武装，镇压地方人民向极残暴，我重用他们来充当工具，放纵他们在当地任意捕杀人民”。①

与此同时，王陵基极力抓地方部队，成立“反共救国军”。当时四川有十六个专区、一百四十多县，专员、县长以前大多数是文人出身。王陵基为了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实行“总体战”，先后把他的一些师长、旅长派去当专员，除川东的专员以外，大都被他撤换，如达县专员李放卞、南充杨东柏、眉山王刚毅、叙府彭光汉、乐山陈荣寿等，都是军人出身。王陵基还先后换了四十多个县长，也大都由军人或特务取而代之。按照王陵基的计划，每县除成立“反共救国军”一、二个大队，还可以成立县的“民众自卫总队”。他为了暗中防范刘文辉，减少后顾之忧，除派了一个保安团扼守川康要道的洪雅外，又成立几个山防总队，先占据总岗山，作为防守西康的地方武装。“这几个山防总队只是把当地的土匪袍哥收编起来，给他们一个名义，先后由王刚毅保荐汪涛、杨某等三人为总队长。以后我又发表蹇幼樵、潘子固为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山防总队正副总队长。曾扩情曾以‘川陕甘边区

①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598 页。

绥靖公署’名义送去一批枪弹和经费，也想利用这些山防总队。我利用这些山防总队以对付西康，后来还准备用它们来实现我应变措施中‘打游击’的计划”。[①]

此外，1949 年王陵基把泸州专区交给军统，由毛人凤推荐军统大特务、“武圣山”头子罗国熙为泸州专员。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又提出以军统常宜中为该区古宋县长，张树良为古蔺县长，孔学凡为兴文县长，王陵基都表示同意。军统利用这个地区大肆招编袍哥土匪，容纳各地逃到四川的特务，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将特务、武圣山分子加以训练，意图以该地区作为“游击”根据地。王陵基还根据军统徐中齐的建议，在各县成立“反共委员会”，妄图采取统一行动。

1949 年初，国民党大部精锐部队于淮海战役覆灭后，蒋介石又指派前“行政院长”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借以协调内部，缓和矛盾，控制地方实力派，加紧营造复辟基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隶属行政院，以张群任长官，钱大钧任副长官，肖毅肃为参谋长，刘宗宽为副参谋长，控制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重庆四省一市，作为反共反人民的最后基地，而以四川为重点。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后，确定了反动的作战指导方针，展开了全面部署，其中有积极扩充、扩编各省保安团、各县警备队、自卫队，包括以袍哥、土匪、地主、恶霸为核心的反共反人民的武装组织，在军校大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分布中统、军统特务插入各单位各基层；王陵基也在四川大办游击干部训

①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595 页。

练班。[①]

根据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部署，1949 年国民党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准备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游干班主任由军校校长张耀明兼任，副主任由王旭夫担任，前后办了五期。一、二、三期限于军校教职员和校外同学，从第四期起，扩大培训范围，第五期更加扩大，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外，广泛吸收土匪、袍哥、恶霸参加。“由于冷开泰的邀约，第五期游干班受训人员身份最复杂”。[②]如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司令刘树成，郫县参议长袍哥大爷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邛崃的舵把子乔子均，新津的参议员、巨匪李元亨，崇庆的土匪李泽儒，双流的土匪、舵把子曾炳章，温江的袍哥头子朱伟勋，广汉的土匪钟焕章，金堂的袍哥头子林耀生，成都妇女协会理事长何知言等。据记载：“四川全省有名气的袍哥舵把子约二千名，都来游干班接受训练”。[③]班中特设“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兆黎，副主任委员冷开泰，设计委员有杨子超、李元亨、张联芳、左舜卿等。

受训期中，除听了一些游击战术以外，主要是听“反共”的宣传。上课时少，聚餐时多，又以烧香拜把，歃血为盟来加强勾结。曾在文庙前街王缵绪公馆及东胜街冷开泰公馆举行过几次大规模的结拜兄弟的仪式，除了受训学员外，还包括班中

①刘宗宽：《国民党在西南的战略部署及其最后覆灭》，《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546 页。

②熊倬云：《袍、匪、特、烟、骗五毒俱全的冷开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③吴剑洲：《解放初期川西土匪暴乱的前因后果点滴》（稿本）。

的负责人王旭夫、肖步鹏等人，由“正伦社”的社长张联芳主持香堂，提刀宰鸡，拈香、吃血酒，誓与解放军血战到底。并把王缵绪请来参加仪式，即席讲话，以壮声势。

游干班副主任王旭夫本来不是袍哥，因为游干班有两千人左右全是袍哥、土匪、恶霸，他们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王和部分军校将官也参加了袍哥，以便于领导这批学员进行反革命活动。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旧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共约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决定分批发给这些受训人员，以便凑合成“川康游击挺进军”。游干班推选冷开泰为游击的总联络，由冷转达游干班受训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多少人就发多少支枪。在发枪之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当头目的人的号召能力究竟如何，这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的人，竞相奔走于冷开泰门下。当时，崇庆巨匪李泽儒领得枪弹很多，1950 年以新十二军独立团团长的身份率众暴乱，为害特大。曾作刘兆黎部团长的蒋镇南，领得大批枪弹之后，通过游干班关系，在川北纠集万余人，抗拒解放军，被迫起义后，又复率众暴乱，为害尤其巨大。冷开泰等临到成都解放前夕，还坐着吉普车，到成都附近的郫县花园场、温江文家场、灌县青城山及内江、自流井、新津等地，开展串联，委了不少旅、团长，总队、支队长，多如牛毛，并与各地的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以图抗拒解放和破坏解放后的建设事业。

1949 年 8 月底，蒋介石亲临重庆，召开有西南地区军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筹划固守西南、建立反攻基地问题。10 月，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后，国民党自度华南地区难保，遂将

其“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重庆，做起了割据西南的黄粱美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和猬集于四川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军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开始的。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和一切反动势力，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于11月初进行广西战役的同时，在西南战场上发起规模巨大的进攻作战，并针对西南国民党当局的部署和企图，极其英明正确地规定了解放军主力从南面进攻，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断敌退路，先完成包围，尔后再回打，把敌人全部围歼于四川境内的作战方针。同时，指示解放军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重视政治工作，作为战斗方式的辅助。

根据上述方针和指示，解放军在兵力部署上，以第二野战军为主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组成南线作战大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下，先隐蔽集结于鄂西宜昌、湘西常德及邵阳地区，待第四野战军主力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即突然由黔东、川湘鄂边突破国民党军之防线，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康国民党军南逃道路，造成围歼敌人的有利条件。北线作战大军，由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组成，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于陕中、甘南之宝鸡、天水、岷县之线，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巴山之间，待解放军南线大军切断敌人退路后，迅速南下，进占川北及成都地区，然后两军协同，聚歼残敌。①

①何正文：《全歼大陆蒋军的最后一役》，《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1页。

11 月初，人民解放军南线大军发起全面进攻，11 月 15 日解放贵阳，将国民党的“西南防线”拦腰斩断，对宋希濂集团实施钳击。在不到二十天时间内，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即全线瓦解。宋希濂、罗广文残部分别向川南、川北地区溃逃。11 月 29 日，解放军直抵重庆长江南岸。此时，蒋介石见大势不妙，乃于 30 日晨偕“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成都，当日下午重庆解放。

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解放军南线大军进抵乐山、眉山、遂宁地区，切断了胡宗南集团撤逃康、滇的退路，形成东、南、西三面大军进逼成都。

1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北线大军，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分东、中、西三路急速南下，以形成对胡宗南集团南北钳形攻势。各部队在追击前进中，至 21 日，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将胡宗南集团等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

国民党的“西南防线”被突破后，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士气沮丧，尤其是地方势力。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于国民党军除用战斗方式、尚需兼用政治方式解决的指示，于 11 月 21 日向川、康、滇、黔诸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条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保护公共财产，维持地方秩序。①同时，命令所属部队，认真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号召下，12 月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和雅安通电起

①邵成业：《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回顾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9 页。

义，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11 日郭汝瑰在宜宾宣布起义。这些将领和部队的起义，对退集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震动很大，加剧了恐慌和动摇。蒋介石唯恐自身难保，遂于 10 日偕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临行前委派胡宗南全权指挥川康地区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军节节逼近和蒋介石逃走的局势，胡宗南自度成都难保，决定向西昌撤退。但解放军已将成都地区四面包围，并占领了邛崃、大邑一线，打乱了胡宗南的撤退计划。23 日，胡宗南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乘飞机逃跑。蒋介石、胡宗南先后逃离成都后，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21 日董宋珩、曾苏元率部在金堂起义，24 日罗广文、陈克非率部在彭县起义，25 日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6 日李振到简阳商请起义。只有胡宗南嫡部李文妄图顽抗，但在解放军猛攻下，27 日李文以下五万余人投降，成都战役结束。此役，逃集成都地区的以胡宗南集团为主体的三十余万国民党军，大部起义，余部被歼，只有少数溃散，逃往西昌地区。同时，在川南追歼战中王陵基的川南六县守备正副司令袍哥师长刘树成、穆瀛洲率保安部队起义，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在沙坪被俘。①在成都歼灭战中，成都城内的宪兵部队等亦相继起义，逃窜在成都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军，有的放下了武器，有的被歼。②解放军另一部在江安地区活捉了化装潜逃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③1950 年 3 月解放军又以强有力的部队，挺进西昌地区，至 4 月

①黄作军：《川南歼敌记》，《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66－173 页。

②邵成业：《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回顾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5 页。

③李达：《解放大西南之战》，《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40 页。

7 日结束，全歼猬集西昌之国民党残部一万余人，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支部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盘踞西昌，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四川各族人民从此获得了解放，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正当人民欢庆四川解放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时，由国民党军校办的“游干班”、王陵基办的“游干班”、军统特务办的“游干班”训练的袍哥头子、匪首、恶霸、特务，躲在阴暗的角落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发动土匪游击战争。1949 年 12 月充当蒋介石最后一名流亡的行政院长阎锡山由广州到成都，发布了:“任命唐式遵、王缵绪、刘兆黎等，分别任川南游击总司令、川西游击总司令、川北游击总指挥等职，各就当地组织民众武力，对解放军进行破坏骚扰等活动。同时任命西康‘舵把子’羊仁安，川南‘舵把子’闵锡如，分别任新编军军长，就地成军，以控制西康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最后的退路”。①蒋介石等争先恐后地逃走后，胡宗南仓皇应变收场时，“当时成都周围几十里地区袍哥舵把子和一些失意军人，乘机而起，各自封为某某司令，争相招兵买马，企图浑水摸鱼，闹得老百姓无以为生。胡宗南却认为这些力量大可利用，特于 12 月 11 日关照曾扩情同成都防卫副司令余锦源、四川保安处副处长王元辉约同唐式遵、刘兆黎等，假商业街励志社，商谈如何整编这些队伍，归唐、刘两人统一指挥。一致决定由唐、刘两人负全权整编之责”。“责成军统特务杨超群会同金堂舵把子赖合山等，在金堂一带组织游击队伍。除发给手枪二百余支和相当的子弹外，并准其在各地自由购买武器，如山

①曾扩情:《记成都解放的经过》,《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533 页。

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等等购得不少，单是步枪子弹就购得有一百万余发”。“特派王元辉去简阳县，策动当地恶霸、混号‘刘皇帝’（刘惠安）者，在简阳一带组织游击队伍。随后又派前成都警察局长刘崇朴前往协助一切，并给以步枪子弹五万发”。[①]但是东拼西凑的这些游击队伍，还来不及为胡宗南所利用，成都就和平解放了。解放以后，他们拒不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自新，反而利用解放军在成都解放后刚刚展开工作，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时候，暗中纠集袍哥、惯匪、流氓，乘机到处组织暴乱，使城乡工作受到严重威胁，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危害。如担任“游击”总联络的冷开泰，“成都解放以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暴乱。如灌县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聚众暴乱，与冷的策划有关，冷竟写信指示各县土匪、袍哥首领，说：要齐心合力，来消灭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要像瓦岗寨平隋乱那样，一齐动手；要大家出动，把川西南联络成一片，在1949年阴历除夕（1950年1月20日）那天，一齐发动暴乱等等。当时，致使各地先后暴乱的匪首计有：郫县杨子超（议长、游干班学员）、郭绍成（侦缉队长）；温江朱伟勋（袍哥头子、军统特务）；邛崃乔子均（营长、舵把子、游干班学员）；新津李元亨（参议员、巨匪、游干班学员）；双流王家场曾炳章（乡长兼大队长、土匪、舵把子、游干班学员）；华阳窑子坝张达武（袍哥头子）、张万里（乡长）、吕波登（袍哥大爷）；华阳龙滩寺陈功武（乡长、舵把子）、陈功爵（军校学生）；大邑余如海（旅长）；眉山汪杰（又名汪俊贤、旅长、议长）；新繁胡开惠（土匪）、沈德正（土匪）；

①曾扩情：《记成都解放的经过》，《回亿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37—528页。

金堂林耀生（团总、袍哥头子）；崇庆李泽儒（土匪、团长）；广汉钟焕章（钟懒王、土匪、游干班学员）；温江吴家场陈利石（乡长、舵把子）；洞子口曾次钦（乡长）。这些匪首，发动武装暴乱，有些是冷开泰直接指挥，有些是受冷开泰的影响，附和蠢动，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遭受莫大损失”。[①]又如崇庆“元通国”黄匪帮在成都和平解放后“黄泽霖（即黄鳌）匆促回崇，把原有的‘反共救国军’人马改换了‘协作军’的招牌，散发油印传单，捏称他早就做了许多响应解放的工作，要‘同共产党同掌政权’，召集其狐群狗党在县政府开所谓‘民主座谈会’推选出县局负责人，算是‘和平解放’了崇庆县。黄鳌大出布告，自称协作军司令员，黄泽荣（黄老五）是副司令员，张星枢、黄光辉、王汉光、王耀祖是第一、二、三、四纵队司令员，反动透顶的青年党头子施德全、民社党头子文云午、三青团头子张建秋都冒充民主人士，谎造他们协作解放的成绩。同时派爪牙谭杰、刘杰、张大舟率三个警察中队向崇、温一线截缴胡宗南匪溃散的枪炮武器，一面联络羊马、安阜、江原、三江和大邑一带的土匪头子，分头截缴武器。又把所有截获的武器和仓库中的存粮运往万家乡山中，作为向人民政府要求升官发财的资本和以后暴乱的物资。1950年1月，崇庆县人民政府在川西行署和温江专署领导下成立，黄匪弟兄佯装不问政治，迁到成都，却阴谋联合各县反动头子策划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一月中旬，他们派吴蜀雄带信令黄光辉待机发动，后又派其参谋长胡仁安到元通、怀远一带布置暴乱。黄光辉派代表梅建安往道明乡匪首陈楚生家与台湾派

---

①熊倬云：《袍、匪、特、烟、骗五毒俱全的冷开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15至216页。

来的特务赖彰明会谈暴乱计划”。[①]

四川袍哥头子、匪首、特务暴乱，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东南的龙潭寺、石板滩开始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同志执行任务，途经石板滩被匪特残害后牺牲。[②]这次暴乱是由“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材，伙同“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发动的。[③]匪首李干材原是重庆袍哥“三六协进社”社长，重庆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军统大特务、稽查处长周迅予收为己用，当上情报大队长，成都和平解放后，潜伏在石板滩策划暴动。[④]巫杰（乌杰）是龙潭寺的流氓“滥滚龙”，被李干材收买后率领土匪埋伏院山寺险要地带，偷袭途经解放军工作人员。暴乱发动后，巫杰率领土匪几百人占领院山寺，断绝交通，砍断电线，隔绝龙潭寺到成都的通讯，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码头仁义两堂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反共’出血”，更以武力强迫青年群众从匪，不肯从匪的被巫杰杀死了三人。

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大规模匪特暴乱后，各地袍哥头子、匪首、恶霸、特务乘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全面发动了土匪游击战争。崇庆县黄匪帮，“杀害我在各乡的征粮人员和过路的解放军战士，并抢走各乡征存粮食。纠集各乡镇匪首强迫各保出人枪三名，组成各乡‘反共救国军’大队，由各该匪

①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84页。

②王新亭：《向西南进军》，《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51页。

③吴剑洲：《解放初期川西土匪暴乱的前因后果点滴》（稿本）。

④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首任大队长指挥攻城，黄匪光辉自任攻城总指挥，周四维任副总指挥，雷家裕任西门的支队长”。①其他各地，如金堂的匪首赖华山，华阳中兴场的“舵爷”贾慎之，成都仁义场乡长刘西黎，新都唐家寺“龙头大哥”李显之，新繁县龙桥匪首胡开惠、新津匪首袁树江、李元亨，邛崃舵把子乔子均，大邑“袍哥大爷”张明清、贾炳南，温江舵把子陈吉三、戴文州，双流舵把子曾炳章，崇庆县三江口匪首李泽儒，灌县新场恶霸张治达，郫县议长杨子超，竹瓦铺舵把子龙定一、高店子乡长袁次雍、何家场“舵爷”蒋耀廷、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绵竹匪首赵祝三、汉旺场匪首谭尊五，安县“辅仁公”龙头大爷周怀德、“少莫社”大爷杨通治、花街子“舵把子”林建华，绵阳“五九社”社长李焕金、丰谷井“舵头”左保成，三台县“坐堂大爷”毛仲英，什邡县“舵主”宣静修，夹江县“社长”乡长易培楷，洪雅舵把子沈善成，彭山县观音铺“舵头”何耀武、惯匪帅奎，彭县天彭镇镇长、袍哥大爷杨子亨，邻水县匪首师长包平章，成都“忠义公”舵把子干明辉、“大中社”社长刘国辉，“同声社”大爷高金山以及青城山“上清宫”主持冯楠轩等，先后在金堂、简阳、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崃、蒲江、大邑、安县、绵竹、绵阳、三台、中江、彭县、彭山、眉山、洪雅、夹江、邻水等地进行暴乱。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

①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84至185页。

②乔曾希等：《四川袍哥的概况》（稿本）。

点围剿。[①]川西军区派来解放军约千人，2 月 7 日向巫杰猛击，打得巫匪东逃西窜，巫杰当场被击毙。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进剿。崇庆黄匪帮被我英勇无敌的解放军在城关击溃后，残匪在黄光辉策动下，窜往西山乡一带，妄图继续负隅顽抗。3 月中旬，被我解放军跟踪追击，在苟家乡老林一带，活捉了黄光辉，全部歼灭了所有参加暴乱的余匪。[②]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多次围剿和进剿。“川北军区在渠江、涪江、嘉陵江三角地带组织了围剿，并镇压了南充、射洪、中江地区的匪特暴乱。西康地区在西昌地区、总岗山地区及大渡河两岸，组织了围剿和进剿。我曾前往郫县地区，指挥部队剿匪作战。在剿匪斗争中，全体指挥员翻山越岭，攀登悬崖，踏遍深山绝谷，穿越原始森林、忍受了严寒酷热、没有油、盐、医药等困难，取得了全歼股匪的胜利”。[③]从“龙潭寺暴乱”起，至大邑县五庙山彻底剿灭为止，历时不过几月，即被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在清匪反霸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镇压了一批袍哥大首领、匪首、恶霸，特务。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

①王新亭：《向西南进军》，《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51 页。

②崇庆县政协社会工作组：《川西恶霸崇庆元通场黄匪家族》，《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第 185 页。

③王新亭：《向西南进军》，《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51 页。

大伸。如冷开泰的罪恶深重、民愤极大，1950 年将其逮捕镇压，真是大快人心。在奈庆县作恶三十年的黄匪弟兄黄泽霖、黄泽荣及其爪牙王耀祖、彭显廷、陈楚生、吴梓愚、雷少华、雷家裕、何玉屏、王少周等十八恶霸，被人民法庭提出公审，处以死刑，到会控诉观审的四万多人。黄泽溥、黄光辉也先后被镇压。在人民政权下，祟庆民众才抒发了多年来的冤仇气愤。川北土皇帝黄清沅，敢于率匪抵抗解放大军，被击退后，潜伏在南充，欲伺机潜逃香港，1951 年捕获归案，在重华公审时，万余人捶胸顿足，哭泣控诉。

1951 年 2 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的封建性和反动性后，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解放战争的胜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妥善地解决了秘密社会问题，使人民过着安宁稳定的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后　　记

中国社会史第三次研讨会，定于1990年10月在成都举行，拙著是向会议奉上的一份礼物。

本书应用了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公安厅档案馆（科）、成都市公安局档案室（科）、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料；王斌、张际发、夏钦一、赵建强、唐学锋、龙梅等同志供给了珍贵资料；研究生王新华、赵合民搜集了部分资料；郑城同志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天麻、责任编辑殷瑞渊和赵艺同志从选题到编写都给以具体的帮助；在访问过程中，乔曾希、熊倬云、吴剑洲、康兆奎等先生提供了未发表的稿本、回忆录、访问记。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　者

一九九〇年四月

封面设计：冯贵才

ISBN 7-201-00629-0/K·90
定价：3.30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　校对
2007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
1:58:47